

中阿决裂后的拉美亲阿五党文件汇集

原标题：拉美追随阿尔巴尼亚的五党反华文件汇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出版

原书说明

拉美有六个党追随阿尔巴尼亚反华，其中巴西共产党、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智利革命共产党、秘鲁马列主义共产党五家原与我有党的关系。这五个党中，除厄党在国内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外，其他都是极左的宗派小集团，在国内影响不大。但是，它们反华很凶，发表了大量反华文章，在阿的资助下，散播欧美，流毒甚广。现将这五党的反华代表作译印，供批判时参考。

一·巴西共产党

革命的团结和行动的纲领

《工人阶级报》（一九七七年六月）

拉丁美洲马列主义党的声明为本半球的革命运动打开了光明的前景，表明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多边会晤的价值。从数年前开始，这些党就曾对本大陆各国人民斗争的看法和经验进行过交流，并对地区性的问题进行过共同研究。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性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党的中央代表团制定的文件，是对拉丁美洲现状的深刻分析，正确地指出了应当执行的根本任务。它是一个真正的斗争纲领，团结的和革命行动的纲领，它反映出本半球这个地区马列主义者的成熟。在国际范围内，它也是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方针的一个贡献。

拉丁美洲各马列主义党，以及它们之中的巴西共产党，有义务亲手掌握这个斗争的纲领，并把它变成强有力的工作的工具，以便正确指引本大陆广大受剥削和受压迫的群众沿着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道路前进。

主要的敌人

《联合声明》确定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这两个超级大国正在激烈地进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并在积极地准备一次新的大战。不管反对这个或另外一个，都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摧垮其霸权主义和好战计划的阵线。在拉丁美洲，美帝国主义及其内部支柱——反动寡头势力——代表了反动派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群众的最顽固的堡垒。美国垄断集团统治着拉美各国，它们是我们各国人民的掠夺者和压迫者。虽然在这个地区过去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曾有所渗入，而且还在继续渗透，但是美国仍控制着统治机器的主要杠杆。当前，它以利润、贷款的利息、专利、技术援助、运输费用、不平等贸易和 KNOW-HOW 等方式从拉美夺取亿万美元。在它的指挥下，在差不多整个大陆建立并维持着野蛮的军事独裁政权，在它的影响下，对人民反帝运动进行粗暴的镇压。因此拉美人民把仇恨集中在它的身上，并把解放斗争的锋芒对准它。拉丁美洲任何正确的解放战略都不可以忽视这个现实。说社会帝国主义也在努力使自己在美洲站稳脚跟，这是对的。社会帝国主义企图扩大自己影响的尝试在美国的反击下都失败了，但是它们在坚持。但是，苏联当前要想和美国分庭抗礼还相差太远。因为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拉丁美洲人民也认为，社会帝国主义是危险的敌人，对它保持着警惕。

面对着笼罩世界的冲突，不能允许同这个超级大国或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结成联盟。拉美马列主义党的文件肯定说，依靠它们中的一个来反对另外一个将是一个错误。然而，有一些人却是这样行事的。修正主义者公开主张联合俄国人来抵制美国人，他们是新沙皇霸权主义政策的工具。这种方针会导致用苏联的统治来代替美国的统治，这样并不能减轻苏联的粗暴和掠夺，反而意味着完全破坏民族解放的斗争。修正主义的主张需要经常加以揭露，因为拉丁美洲广大群众在苏联还代表胜利的社会主义时敬仰它，而许多人没有看到在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在那里所发生的变化。似乎令人不能相信的是，也有那么一些人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来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其借口是后者是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除此之外，那些鼓吹这种论调的人说，美国垄断资本家处在衰落，而苏联人则处于全面上升。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衰落”不是别的，而是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腐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从苏联变成了帝国主义，它的“社会主义”也就处于解体、腐朽，因为不存在在这个进程之外的帝国主义。现实是，美帝国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材料表明，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剥削者。它在世界各地张牙舞爪。事实是，虽然它遭受许多挫折，但它的掠夺本性不变，而是相反，这是它野心勃勃的扩张尝试的证明，同时这也是它的固有的虚弱的证明。接受这样的论点就使人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即美国不在进行激烈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因为这不是一个处于衰落的势力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拉美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懂得，所谓的美国垄断集团没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它的表现是，对我们各国越来越厉害的统治过程中加紧进行剥削和压迫。和美国结成联盟，除了会把反对本大陆凶恶的剥削者的旗帜丢到修正主义分子手里以外，肯定将使马列主义党衰弱、脱离人民群众。在美苏各自为寻求统治世界而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革命者的义务就是把解放斗争进行到底，把帝国主义战争发展以至于变成解放战争。

我们国内斗争的目标

拉美马列主义党的《联合声明》不仅指出了我们要反对的外部敌人，而且也明确指出了国内的敌人。“拉美各个民族在本大陆如果不打击和打倒（美）帝国主义，就不能得到解放，如果不同时消灭支持它的国内反

动力量，它将更加富有掠夺性和侵略性。”文章正确指出“我们的人民仇恨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反动法西斯制度”，“仇恨统治许多国家，并把自己变为外国资本的走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内部的反动敌对势力。很明显，只反对外部的敌人就不能进行革命，它首先而且特别要求反对本国人民的内部的反动敌对势力。我们的国家不是老式的其外部敌人同时也是国内镇压势力的殖民地。我们的国家是由庄园主和与外国资本连结在一起的大资产阶级所构成的反动寡头势力掌握政权的依附性国家，一般这些寡头势力以武装力量为依靠，为它们的利益和垄断集团的利益效劳，反对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正当要求。这些寡头势力的战略和帝国主义的战略是相同的：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人民民主反帝运动，并首先消灭其战斗先锋队共产党人。

在这个问题上，对于这个根本目的，也出现了相反的意见。例如，修正主义实际是反对革命的，他们同反动势力结成同盟，同我们人民的刽子手相配合，对武装力量彬彬有礼，以使希望得到好感。他们抛弃阶级斗争的道路，主张在反动势力的统治的框框内进行改革，按照他们的意向，改革会一点一点在进步的社会阶层占优势。革命成了多余的事。这是一种叛变的政策，改革不会走向民族和社会解放。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落后的势力也会接受这种改革的，因为它往往为巩固其统治和削弱革命运动效劳。通过改革，不能消灭落后的和压迫的阶层，反而会改善剥削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系统。革命者并不排除利用改革，然而认为它只是反对资产阶级、庄园主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副产品。在与修正主义一端相反的另一端，同样也出现了关于国内斗争的奇谈怪论。其作者断言，面对着社会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危险，拉丁美洲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应当同反动势力联合在一起反对那些威胁。拷打和杀害爱国人士，把国家的大门向外国资本打开的盖泽尔、皮诺切特、魏地拉、班塞尔、斯特罗斯纳及其它法西斯将军们，他们不再是反帝民主潮流的敌人而成了天然盟友，因为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主张这种理论的人不看一看他们的政策的基本内容，把这些政府——即使他们称赞这些政府，而这些政府，例如直到前不久还被称作样板的秘鲁政府，并说它在建设一个独立的和进步的国家的活动称为独立的立场，其实它们从来没达到被称赞的程度。毫无疑问，这种方针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从各方面看都是机会主义的。

修正主义和新型机会主义在关于国内斗争方面各自的策略，都是要把革命运动引向失败，降群低众的觉悟水平，抛弃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两方都是背叛社会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革命者的作用就是为革命而工作，坚决为粉碎落后制度而作出贡献。如果马列主义党采取前边两种骗人的策略的任何一种，都将失去自身存在的理由。它们将变成修正主义党或老的社会民主党。作为马列主义者，意味着永远是革命者，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不倦的战士，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坚决拥护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不可调和的敌人。虽然，在斗争的这个时刻或者另一个时刻，可以暂时同非进步的阶层和保守阶层结成联盟，以便利用某些矛盾，然而马列主义党要经常保持独立，永远不能降下自己的旗帜，而且这种联盟要能加强（而不是削弱）自己的先锋队地位。

斗争的强大武器

《联合声明》的路线是革命的，同真正的无产阶级世界战略是协调一致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反对国内的反动势力，有利于各国和世界的革命。在革命者、机会主义或动摇分子之间，在那些为革命而斗争的人与背叛革命的人中间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那些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口头上讲一讲革命而在实践上又否定革命的人，其表现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相同的。

拉美马列主义党能够制定出这个《声明》，并不是没有经过努力和没有对现实进行认真考察的。它说明对革命运动的基本任务的认识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正是这样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战斗武器。

有这个武器就要用，用它来反对我们的敌人，并使我们各个党变得更加强大。《声明》不象“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某些决议，只有革命的外表，只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无任何价值的形式主义的文件。马列主义者是要说到做到，对于它们说来，《声明》不只是一定要确定总的原则，而是一个工作的工具，是应当带给群众的思想。

我们，巴西共产党人必须按照它的重要指示去工作，需要帮助党员和劳动群众领会其革命内容。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文件，而且是整个大陆的马列主义党的文件，受到全世界许多党所重视，它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它加强了拉美人民的战斗团结，它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政治路线。学习它，散发它，把它变成具体行动，这就是我们的建议。

永远高举马列主义不可战胜的旗帜

四年前,《工人阶级报》发表了《论反帝斗争》的文章。文章表达了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所谓第三世界虚伪的作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文章用对反帝统一战线的正确看法武装了巴西共产党人,指出了为争取革命及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的光明前景。

这段时间以来,生活充分证实了文章的看法。党没有跟着宣扬对附属国家的改良主义的和第三世界主义的有害的解决方针走。因此避免了党队伍中的思想混乱。

今天,当制造混乱的、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出现并企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生根时,《论反帝斗争》文章对我党就非常重要,具有巨大现实意义。尽管文章没有完全论及这个理论中所包含的所有问题,但它所阐述的论据在实质上是对着这个理论的错误论点的。

目前,“三个世界”理论是意识形态讨论的中心,要求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批判。我们正处在一个如同在六十年代那样、接受还是驳斥从根本上危及马列主义革命原则的方针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

美帝国主义的“衰落”

“三个世界”理论的信徒们抛出的最时髦的论点之一,是臆想的美帝国主义的衰落。由于它在衰落,它就能成为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和便于使第三世界得到发展的同盟者。《工人阶级报》已驳斥了这个论点,它是与和平道路相联系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和首次出现的东西。

对它的真正意义,巴西共产党人早就认识了。一九四五年,跟据白劳德主义,普列斯特斯形成了帝国主义的“牙齿被打掉了”的思想,因而认为它的本性也有了某种变化。他认为,美国已无力阻挡各国民主的前进了。就这样,他主张和平道路的机会主义方针,当时党也接受了该方针。这种观点很快就暴露出不牢固性。一九四七年,杜鲁门开始向统治世界的目标进击,巴西的不象样的民主便消失了。

后来,一九六五年,赫鲁晓夫断言帝国主义的“牙齿被打碎了”,世界力量对比将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能通过和平道路达到目的。此外,随着帝国主义的衰落,将为“没有武器和没有战争”的世界创造条件,这种方针给革命运动造成了深刻的危害,它与现实根本不相符合。

现今,披着新外衣,以同样的机会主义形式,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说美帝国主义的衰落,是企图缩小它的侵略和掠夺活动,把它说得不如它的苏联对手那么危险,为自己与美帝国主义的联合辩解。(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这种打算。最终将给各国人民带来灾难。

列宁早已说过,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处在瓦解之中的资本主义。尽管它还在发展,但做为一个制度已到了末期,进入必然的衰落。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讲帝国主义处在衰落,无论是美帝国主义,还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这个衰落指出,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已是一种客观的需要。

但是,“三个世界”理论的信徒们所说的衰落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认为,衰落的帝国主义就是已被自己的对手超过,同它以前在世界上的剥削情况来说,它的地位下降了。这样,就明目张胆地暗示它的本性和过去已不同了。它可以在反对比较强大的帝国主义斗争中起积极作用,甚至可以成为革命的后备军。然而,侵略、扩张和掠夺的本性是处在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本性。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要表现自己,直到自己的灭亡。人们知道,英、法、德、日帝国主义曾失去昔日的“烜赫”,战后美帝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也收敛了。但是英帝国主义曾面对过纳粹德国。它伙同法国,在五十年代侵略过埃及。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进行过战争。德国人和日本人露了头,准备争夺“一块有阳光的地方”。至于美帝国主义,自二次大战以来,一直是进行侵略战争的冠军。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它们统统受到了挫折,但它们并不因此就甘心失败,变得不富有进攻性,或者变成人民的朋友了。它们无一例外地极力扩张,寻求实现它们目标的新殖民主义的方式。

美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剥削者与压迫者,是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它对日本使用过原子弹以及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的恐怖中,已表明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它什么都是可以做的。主张“三个世界”理论的人们说,目前美帝处于守势,而社会帝国主义处于攻势。守势从来不能说明帝国主义的好战和掠夺本性的改变。守势常常是准备下一次侵略的方式。试问,在一中东、拉美甚至印度洋谁处于攻势?还有在葡萄牙、西班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边指挥西欧联军?很明显,是美国。尽管它与那些地区某些国家的政府之间有分歧与矛盾。判断某个国家在对世界霸权野心方面处在攻势还是守势的标准之一即看其是否进行备战。而现在美国处于军备竞赛的前列。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它总的军费开支多,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积极地完善其杀人武器。甚至今天,卡特还计划大量生产中子弹。苏联也在加强其军事工业。大力扩充舰队,增加核火箭的弹头,制造新的进攻性和破坏性的武器。

事实是,美帝国主义与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激烈地争夺世界霸权,准备新的屠杀。两家都要取得战略地位。俄国人在某些地区居于攻势,美国人则在另一些地方处于攻势。然而,他们的计划常常碰到各国人民的斗争,各国人民不断打击他们,对抗他们的统治计划,有时候迫使他们从某些已经立足的地方撤退。但是他们并不放弃邪恶的企图。

为了证明美帝的“衰落”，“三个世界”理论的信徒们提出理由说，社会帝国主义在各方面都是优势。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因此，存在着苏联超过美国的可能性。然而，用绝对的口气断言苏联现走在美国前面是令人怀疑的。应当指出”苏联的巨大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当它变成帝国主义后，它的外债增加了，吸引外国资本来以便增加生产，由于大量进口粮食，它的外贸受到极大的冲击。无可争辩的是，它要极力扩张，把它的盟国变成“卫星国”。大搞军火贸易，在国外投资以取得最大利润。但是，这种发展正是它的新制度瓦解的因素。美国在经济的基础部门，在初级产品的总额上，在财政方面和工艺技术方面明显地受益。并且在制造一个强大的武库方面也不落后。

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超过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战争的一个因素，因为那个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谋求重新瓜分世界。而这一点只有靠它的力量才做得到。毫无疑问，苏联妄图统治世界，推行侵略、霸权主义的和反革命的政策。但是，美国对社会帝国主义还占着优势。

说苏联人超过美国人，主动发动世界规模的侵略，难道它就是唯一的侵略者吗？美国现在不想称霸吗？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在维持既得地位时，同样准备进攻和击败对手。在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中，没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没有正义事业和非正义事业。两个匪帮都要侵略，他们要保卫的事业都是非正义的。在战争中，它们都将以其他手段继续其战前的扩张主义的和掠夺的政策。

不能轻视社会帝国主义强国苏联。它是个背信弃义、野蛮的敌人，是一个主要的战争挑拨者。在被它背叛了的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外衣下，它企图寻找一条统治世界人民的道路。各国人，民面临着揭露它，挫败其霸权主义计划的伟大任务。然而，与它争夺世界的对手美帝国主义的危险并不比它小，其野蛮也不亚于它。各国劳动人民大众对它同仇敌忾。各大洲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都与它展开了斗争。

加入这个或那个战争集团，同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结盟，对于无产阶级是危险的。现在，主要敌人就是两个匪帮。早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战争时，列宁就阐明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政策，维护在巴塞尔做出的反战、变战争为社会解放战争的决。那些在这种豺狼间争斗时道问哪个是侵略者，哪个比较危险的党派，都滑入了沙文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如果今天的马列主义党附合这样的谬论，即在任何斗争中，即使在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中永远有个主要敌人，工人阶级应当和这个主要敌人的对手为伍来反对它，那便将犯曾招致第二国际破产的罪恶错误。

总之，“三个世界”理论家们所宣扬的所谓的美国劣势和衰落，是为削弱受资本剥削的人们的革命觉悟，并把他们绑缚在两个侵略集团之一的战略上效劳的。同样，克里姆林宫的奴仆们所颂扬的苏联修正主义对民族解放的假援助，苏修在世界范围内表示的缓和的愿望，都是用来欺骗各国人民，使他们失去警惕性，便于苏修的统治。不管用什么借口，依靠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相信它的和平骗局，认可它们之中的一个可以和被压迫者一起帮助自己的解放，都将犯极其严重的错误，脱离阶级斗争的原则，背离革命，堕入机会主义的泥坑。

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是做为“三个世界”理论的主要内容出现的。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第三世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打败超级大国的主要基础，首先是打败被指定为主要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苏联的基础。它代表着上升的力量，它对帝国主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所包括进去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向建设一个独立进步的社会中前进。

曾在有个时期，这个第三世界，或不结盟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三个名称一个含意——似乎是团结的，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一九七二、七三年崭露头角。要求二百哩领海权被认为是坚定的反帝立场。（最近，美国、苏联、法国也实行二百海里领海权）。提高石油价格被称颂为受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解放，要求提高第三世界原料价格被说成是民族解放的一条新的道路。第三世界开始时髦起来。智利的阿连德、阿根廷的庇隆，秘鲁的贝拉斯科，古巴的菲德尔都自称是第三世界主义者。甚至盖泽尔也爱上了这个潮流。在这个时期，某些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开始赞美第三世界，并自称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原则差别。

我党从来没有接受这种离奇的划分，也没有接受这种世界反帝统一战线的拙作。一九七三年以来，这种理论前后不一，充满了机会主义的内容。《工人阶级报》的文章说：“某些思潮给反帝运动指出的第三种立场的前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是虚伪的。”

目前，主张第三世界的观念的人们不管他喜欢与否，它已遇到了危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要求的独立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想。所有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了变化，它们的政府丧失了反帝性。甚至进一步变成国际金融资本的附庸（包括变为苏联的附庸）。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基础上公布的材料来看，这些国家一九七四年的外债为八百亿美元，现在增加到了二千四百亿美元。这个沉重的负担将这些国家变成有钱大国的附庸。第三世界国家也参加了军备竞赛。它们从来没有向帝国主义供应者购买过这

么多精良的武器，使它们在技术上和军事上被捆着了手脚。军事政变和虚伪的选举把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残存的民主自由扫除干净，并建立了极反动的法西斯制度。它们的团结被打破了，某些国家产生了兼并企图，在这些地区发生了血腥的争夺。印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伊朗以及另外一些国家；以武力征服了它们的邻国或者为这个目的而进行活动。巴西把它的邻国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下，并且威胁圭亚那。秘鲁和智利都武装起来，互相威胁。危地马拉要吞并伯利兹。非洲的领土冲突在加剧。除了这些国家统治阶级值得谴责的自己的目标以外，还有帝国主义的操纵，它们企图利用这些冲突和争夺加强自己的地位。这些落后国家值得称赞的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成了依附性的发展，从属于外国资本，完全违背于这些国家的利益。

除此而外不会发生别的情形。因为所谓的第三世界，实际上都是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阶级，政府是代表这些阶级的。一般地讲，这些阶级是反动的，总是以这种方式或那一种方式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着。它们从来不想打倒帝国主义。它们是落后制度的卫道士。它们面临着困难，在革命运动的重压下，转而提出某些有利的要求。但是它们提出的解决方法，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是与发达国家即大垄断者的“谅解”、“援助”交织在一起的。正如它们自己所讲的，它们想要和帝国主义重新谈判。它们不代表无疑世界上各个角落正在发展的真正的民主反帝运动，而是相反。包括了每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的运动，却是坚决反对这些：阶级和政府的，反对民族利益的背叛者的。

因此，怎么能说这些反动势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呢？如果不是严重地滑入了机会主义邪路，怎么会认为这个与垄断者联在一起、成份复杂的集团构成了与超级大国斗争，为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堡垒呢？阿尔巴尼亚同志说得对：“象三个世界理论的信徒们所做的那样，笼统地说所谓‘第三世界’是反帝和革命斗争的主力军，而对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中的真正反帝革命力量同当权的亲帝反动的法西斯力量不作任何区别，那就意味着明目张胆地背离马列主义教导，鼓吹典型的机会主义观点，在革命队伍内制造混乱。”

要人民向第三世界靠拢，即向不发达国家的反动势力靠拢是个诱饵。这样，人民就无法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动摇压迫枷锁，打败不共戴天的敌人。

第三世界主义者狡猾地回避革命，他们不向往革命，也不为它而斗争。因为做为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客观必要的革命，是针对着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外部敌人，同时也针对着本国反动法西斯政府的。第三世界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这些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取得经济独立，因为它已取得了政治独立。这个改良主义的论点符合反动资产阶级的胃口。当他们机械地把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割裂开来的时候，他们否认革命的必要性。要人民的斗争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而这个资产阶级假装为经济独立斗争，实际上却向外资开放本国门户，与帝国主义达成奴役性质的协定。不容置疑，争取真正的政治独立是实现经济独立的根本前提。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正因为如此，需要革命，因为没有或几乎没有一个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享有真正的民族独立。它们总是在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下受帝国主义统治，受外国垄断者的压迫，保留着一种落后的农业结构。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是反人民的。一九七三年七月的《工人阶级报》文章说：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只有走革命道路才能摧毁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革命须扫除主要的进步和民族独立的各种障碍，把反动势力赶下台，让一切妥协的阶层靠边站，摧毁官僚机器，保障群众的广泛自由，建立人民军队”。文章还指出，这个任务要求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适当的社会主义前景。

说所谓的第三世界正在发展是不对的。正在上升的是真正的民主反帝运动，它几乎在所有的陆地上发展着，与这些国家反动统治阶级最野蛮的反动行为斗争着。这个运动，而不是第三世界，应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依托和同盟军，是国际无产阶级战略所依靠的一根支柱。把这个运动与反动政府混淆起来是荒唐的，将是回避阶级斗争的原则，跌入改良主义狭隘民主主义和反进步的泥坑，在世界范围内扶持处在自身最后阶段的、在总危机中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制度。

机会主义发明第二世界

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战略模式中，还出现了一个被命名为受美帝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的受害者的第二世界。它在受到俄国统治的直接威胁，它还反对美国的不断加重的压力。第二世界的成员包括欧洲、亚洲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苏联在欧洲的卫星国。共同的要求使它们接近第三世界的附属国，并还可以帮助这些国家，还可以同它们联合起反对超级大国。

实际上，这个第二世界是机会主义发明。尽管面临着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和美国的压力，西欧国家、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国，不是附庸国家。另外一个东欧集团，尽管那里存在受制于人的不满情绪，但是苏联的盟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尽管革命运动已使它们不能象以前那样统治，但依然是各国人民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它们的掠夺和好战本质没有变。同落后国家的关系上，它们实行了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它们都想接近被压迫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以此建立它们进行经济渗透和加强政治影响的必要桥梁。

第二世界援助第三世界是胡诌。例如把西德和巴西独裁政权的核协定看做是对我国人民争取真正独立的援助，就完全丧失了革命精神。这个协定对巴西根本利益危害极大，遭到广大爱国力量的反对。这个协定对

德国垄断资本家是极其有利的，是他们插手我国铀矿，特别是对德国的核武装是很有利的。而且协定也有利于巴西军政权制造核武器，以使用来威胁邻国人民，满足法西斯将军们巨大的大国野心。

目前，联邦德国是在巴西的最大投资者之一，仅次于美国。投资的目的是和美国垄断资本家的目的毫无差别——无情地剥削巴西劳动人民，从他们的劳动和自然资源中攫取巨额利润。难道德国垄断资本家在其他国家的行为与上述行为有什么区别吗？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干的。

所谓的第二世界国家不但投资，谋取原料，盘剥性质的贷款，令人苦恼的技术援助或努力维护在不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的重要地位，而且越来越露骨地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企图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影响。大家知道，联邦德国或者同美国结盟，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方面大肆活动，目的在于遏止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进程。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它对温和派进行财政支持和政治支持，目的在于阻挡左派的前进。在拉丁美洲，它企图搞个社会民主（或基督教民主）运动，以对付那里的独裁垮台后的革命力量的发展。还拥有殖民地的法国，加紧在非洲活动，企图把那些过去在它统治下的国家联合在这个宗主国周围。卖给这些国家尖端武器，并配备法国技术和助理人员。它甚至介入军事行动，比如在乍得和扎伊尔那样。英国侵略爱尔兰人民对冰岛进行战争，要把昔日的殖民地囊括到英联邦中。尽管失去了“殖民者的威严”，但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国家仍旧是垄断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来自国外资本和来自与不发达国家的平等贸易的财政收入，出卖军火的收入和高利贷收入，仍是它们国民收入的一个可观部分，或者是它们的资本主义利润收入的全部。它们是革命的敌人，是被压迫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对立面。它们之间有矛盾，它们和美帝国主义、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之间都有矛盾。但是，这是剥削者之间、同一窝内野兽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

被人渲染的这个“世界”与所谓的第三世界的联合，不是为民族解放政策服务的，而是为欧洲亚洲帝国主义与被压迫国家反动统治阶级的联合效劳的。它帮助它们恢复失去的地位，加紧正在进行的掠夺。如此有害的方针是用虚假的前景欺骗人民，在民主反帝运动中制造混乱。当然，如果可能，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矛盾，但永远不能说敌人已变成了朋友，我们与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或者说敌人愿意消灭他们自己的并且极力捍卫的制度。

决定时刻

“三个世界”理论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这两个理论提倡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一条道路通向革命（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另一条是维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一条有利于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斗争，另一条是要把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置于资产阶级的尾巴的地位；一条有助于加强各个共产党，有助于唤醒和团结广大受剥削和压迫的群众，另一条道路就是在反动派占优势的地区瓦解先进力量的政党和涣散革命运动；一条提高劳动者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斗性，另一条降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革命是工人阶级的根本目标，是当代不可抗拒的趋势。自从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无产阶级高高举起了与资产阶级战斗的独立旗帜，而不仅仅是做个形式上的声明。就在那一年，无产阶级在法国做了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尝试，一八七一年，又以英勇的、永不泯灭的巴黎公社开展了斗争。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在旧俄国取得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曾试图在匈牙利和德国取得政权。后来在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获得了胜利。由于修正主义叛变，革命倒退了。但是在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光荣地站住了脚跟，无论历史如何曲折，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因此，无产阶级到处声明自己的革命目标，从不在任何借口下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是唤醒人民，指引胜利道路的灯塔。

各个时期都曾有人企图使无产阶级脱离这条正确的道路。他们有意搞乱变革世界的思想。因此，抉择的关头到了。这种抉择将区别革命者与机会主义分子。

当前，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也处于关键时刻，尽管遇到了巨大困难，或由于接受非无产阶级的理论而迷惑地处于十字路口，但它仍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指引的航道上前进。

做结论的时刻到了，此时各个政党、每一个领导人和先锋队的成员的政治思想情况将显露出来。谁不表明立场，实际上他就是采取不彻底的、动摇的和优柔寡断的立场。在“三个世界”的理论面前，迫使每一个人不能采取中立。它确定了方向，它想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并要求各种势力的组织来实践它。应当毫不迟疑地同这个理论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帮助那些迷惑不清的诚实人们改正错误。

巴西共产党将保持她在一九六二年与修正主义决裂，维护革命理想，站到那些捍卫马列主义的人们一边时所采取的立场。反对“三个世界”理论，反对它的战略和策略，反对为维护该理论而建立假的马列主义党。四年前在“论反帝斗争”文章中或在更早时间，我们就反对放弃揭露赫鲁晓夫制定的道路的机会主义企图，我们今后将一如既往。

团结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将捍卫在原则基础上的革命运动的团结。我们欢呼公开捍卫马列主义，反对世界上正在活动的新机会主义倾向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兄弟党坚定而勇敢的立场。这是始终如一的立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立场，它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当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论和理

想的生命力及不可战胜性。马列主义终将在全世界胜利。虽然目前无产阶级革命由于修正主义叛变而遭到挫折，但是决定革命的因素正在继续大规模地发展着。人类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新的奇迹般的飞跃的一天必然到来。

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些问题

《工人阶级报》（一九七七年八月）

在我国人民民主运动的某些阶层，提出了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在当前条件下，革命进程的发展问题。这件事包括一系列原则问题，并和反对机会主义及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们想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越清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方向就越明确。

战争的性质和马列主义者的态度

确定战争的性质是确定革命运动对它的态度的首要问题。有正义的进步的战争和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各国人民为着其民族独立、社会解放或捍卫社会主义的战争属于第一类。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战争属于第二类。

在帝国主义制度下，不论是局部还是全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列宁科学地阐明了它，生活证明着它。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冲突的二十年后，我们看到第二次大战。其后又有不少战争，尽管是有限的，但并不因此就不是野蛮的、血腥的。都是帝国主义挑起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在于取得市场、原料产地、统治区和势力范围以及扼杀革命运动，企图为了垄断列强的利益而瓜分世界。

目前，新的残杀在酝酿。美苏是主要根源，疯狂的军备竞赛、对市场、原料以及对所有帝国主义均被卷入的投资地区的激烈争夺、使两个超级大国冲突的实现世界霸权的欲望，都是导致战争的因素。

这将是一场什么类型的战争？很明显，将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因为对峙者——首先是美国和苏联——追逐同样的帝国主义目标。尽管勃列日涅夫盗用列宁的名字，谈论缓和与裁军，卡特自我标榜捍卫人权，他们双方都企图在世界建立自己的霸权，奴役各国人民。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了新沙皇的扩张主义意图。一九六八年以来苏联军队驻扎在那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掌握祖国的命运。绝无理由使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只有在俄国士兵无限期驻扎下去才能得以维持。苏联武器的进攻性质。军事舰队的扩大、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极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企图。美国同样如此。它的战略毫无疑问是对付那个敌对的超级大国。它的战争活动的出发点是为它统治世界创造条件。

马列主义者对这种争夺采取立场时，要注意到它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性质，看不出它们两个侵略集团中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两家的目的都是在谋求霸权，消灭对手，把它们的统治强加给各国人民。在此意义上，正在发生的冲突的特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似。当时形成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各自为其掠夺利益争斗。列宁指出：“支持一个年轻的、有力的强盗（德国），而打击另一些老的、疲软的强盗都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做的。社会主义者应当做的是，利用强盗之间的斗争以便打倒它们。”

如果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力量决定支持处在准备武装冲突之中的美国或苏联，将会怎么样呢？将会有亿人死去，会摧毁大量的社会财富。结果必然是：如果以苏联为首的侵略集团获胜，无数国家的人民将被置于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桎梏之下，从属于打着社会主义虚伪旗号，建立奴隶制度、法西斯制度的克里姆林宫集团。然而，如果以美国为首的集团获胜，人类的大部分将受到美帝的铁蹄的蹂躏，在这场战争中，它将拼凑全世界反动派和法西斯力量，反对共产主义，尽管苏联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另一种情况是，反革命势力取胜，那么自由、民族独立、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期望将遭受巨大打击。

如同列宁在第一次世界战争中所作的那样，马列主义者反对两个集团，不管它是苏联为首还是美国为首。他们坚决反对进步人类的这两个死敌。他们不能接受依靠一个以便打击另一个的思想，因为这样干就会成为这种荒唐思想的牺牲品，必然陷入社会沙文主义。在这种性质的冲突中，各国人民的利益就在于将冲突变为反对反动派、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争取革命胜利的国内战争。列宁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战争中是这样说的：

“把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是巴黎公社经验表明和巴西莱亚的决议（一九一二年）表明的，是必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帝国主义战争条件决定的。”这是马列主义者的原则立场。

然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阶层反对这种立场。把美国看做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可能的盟友。把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国家看做可靠的同盟军。他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统一战线为例，企图搞乱人民的思想，

把他们拉到超级大国之一的一边去。众所周知，当时形成了两个集团，并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集结在反对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那个集团中去了。但是，这里并不是象现在这样有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苏联当时是一个集团的领导力量。战争的情况与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战争有不同之处。

尽管战争是由帝国主义冲突开始的，但在实质上，是纳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进行一场生死斗争。纳粹上台后，便野蛮公开地向全世界的自由与革命进攻。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说希特勒主义是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敢死队。此外，反对希特勒的集团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后形成的。人民支持苏联是要捍卫社会主义和自己的自由权力。苏联当时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堡垒。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这个集团。他们追逐的是帝国主义目标，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和他们国家人民的斗争，迫使我们举起反法西斯旗帜。即使如此，美帝极力看着苏联在对德国战争中削弱以致精疲力竭。千方百计地破坏欧洲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开辟了这条战线时，已经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帝的企图是把欧洲国家从共产主义那里“拯救出来”。在抗日战争时它支持蒋介石，同时又鼓动蒋对付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从这场苏联对胜利起决定作用的战争产生的结果是，苏联的威望提高了，革命在世界上发展了，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今天，尽管两个备战的匪帮都反对革命，但任何一个都未特别地把锋芒对着人民中国。美国包围它，目的在于要它放弃革命立场。至于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同志自己也说，它是“声东击西”，它的计划是针对着欧洲的，那是他们夺取世界霸权的出发点。现在的情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全不同，是它的发展。在实质上是与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情况相似的，尽管存在着人们都感觉到的差别。

战争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另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是对出现世界冲突前景所采取的态度。战争是紧迫的或不可避免的吗？不久前，某些左派政治阶层认为战争迫在眼前，不可避免。在他们的宣传中，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随时会用坦克打击欧洲，他们的舰队占领地中海与红海，使美国处于无法防御的地位。几月、数年过去了，预言没有兑现。今天，还是这个阶层却又说，必然有一天会发生战争。因此人民应当从现在就寻求盟友，甚至包括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中的一个当中寻找同盟者，在某种方式上放弃对国内敌人的斗争，总之，放弃一切与战争没有紧要联系的活动。这种立场是不正确的，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理论的。

备战并不意味着它立刻就要发生。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强调说，当时的两个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美国 and 英国——的方针朝着武装冲突发展，这反映了客观实际。但冲突没出现，形势发展了。十年后，美英联合起来对付希特勒德国。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在苏联支持下，准备在亚洲挑起总的冲突，它以侵犯越南为起点，最大的目标是消灭人民中国。这个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战争也没有发生。中国当时是越南革命力量的可靠后方。扩大冲突的计划破产了。尽管人们知道世界战争是个危险，但并不是说它是迫在眼前，更不是非发生不可。

如若人民以帝国主义可能的冲突为条件来开展工作和斗争，就是严重的错误。他们要把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当做主要活动。但是他们要对帝国主义的企图始终保持警惕，揭露其阴恶用心，主要的注意力应放在革命上。

战争不是脱离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当前的凶恶掠夺形势的现象。战争是争夺势力范围的结果，它是在战争贩子们实现其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出现的。美国和苏联今天在干什么？难道它们企图征服其他民族时，仅仅是为了准备世界冲突吗？事实上，两家都为剥削和压迫其他人民和国家而煞费苦心。它们将魔爪伸向四面八方，用各种手段要把弱国变为它超级大国的附属国。两家都极力扑灭革命和进步运动，搞乱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些都是实现它们奴役计划的必要条件。这方面，他们要依靠各国反动派。这样，人民怎么仅着眼于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活动呢？今天，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只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为革命而斗争，才能在战争出现时，有利地对付它。无疑，应当揭露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企图及其霸权主义目标。但是这种揭露应有利于加强斗争，有利于明确赋予群众的革命任务。

对于战争，马列主义者不是宿命论者。显然，只要存在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生活在革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时代。苏联倒退了，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事实，不能构成革命者失去无产阶级世界胜利的希望或仅把这种胜利看成极遥远日期的理由。战争可以引起革命，革命也可以制止战争。尽管革命运动由于修正主义叛变和新形式的机会主义的出现而经历着困难的形势，但实际上，有利于革命的因素在大量地聚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处境在日益恶化。失业从未这么多。危机在加深，对无产阶级的成果和自由的攻击是司空见惯的，附属国或半殖民地国家变得更加依赖他国，被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野蛮掠夺。战争威胁是又一个加深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憎恨的因素。这种条件下，可能出现大的斗争（却受到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遏止），马列主义政党可以成为强大的先锋队组织（受到修正主义的破坏和机会主义者的敌视），可能出现广泛的革命危机。各国人民都盼望着革命。如果这种趋势得到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同伙，摧毁它们或严重削弱它们，那么战争就可以避免。苏联内部是虚弱的。胜利地进行第一次

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摧毁它的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导演的闹剧将落得个可耻下场。

我们巴西共产党人懂得象巴西这样的国家革命胜利将会有多大意义。这样的胜利将沉重地打击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将极大地牵制超级大国的战争计划。为此，我们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反对国际财政资本对我国的统治，特别反对美国财政资本对我国的统治。我们将永不放弃同军人法西斯独裁的势不两立的斗争，不放弃争取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斗争。从另一方面讲，我国的内部敌人也不会在斗争中向人民民主运动让步。它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不但凶恶地攻击爱国革命力量，而且随时准备镇压我国人民的任何解放尝试。它的军队机构、训练、装备和战略主要是着眼于反人民战争，这并非什么秘密。我们很了解困难，但我们不怀疑，只要坚持革命道路，我们必将取得胜利。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义务就是引导工人阶级、农民、爱国民主人士由于战争而引起的不满以及现在的各种不满情绪，进行推翻反动的亲帝国主义政府，在巴西建立人民民主的彻底斗争。

宿命地接受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准备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用这种狭隘观点去工作就是怀疑革命的可能性，就是放弃为进行革命和争取革命胜利而斗争。这样做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在帝国主义制度下战争总是具有现实可能性。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以为宣传保卫和平就能避免它，他们错了，因为战争是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那些把战争看成绝对不可避免的人，把帝国主义看做是无敌的，它们的意图是不能违抗的，在实际上，是否认我们时代正在激化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在激化，结果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革命者以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用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他们为消灭产生略侵性的好战主义的根源而斗争，并且完全相信这个目的是能达到的。如若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取得巨大规模，战争和帝国主义将会彻底在地球上扫除干净。

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的里程碑

《工人阶级报》（一九七七年九月）

“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对国际工运和共运来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具有历史意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次代表大会后，于今年七月发表在“人民之声”上的这篇文章，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和革命的新的里程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主要领导人，革命运动的杰出典范，恩维尔·霍查同志，又一次为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胜利的斗争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共产主义队伍中流行着一些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论点和看法，这些论点和看法被说成是新的真理和长期观察的结果，但实际上却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对现代社会的阶级分析。这些论点之一就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出笼的所谓“三个世界”的理论。它毫不考虑革命运动中关于国际问题的舆论就不合时宜地问世了。

从那时起，它狡猾地就想要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中打开一条路子，但遇到了抵制。与该理论相反，阿劳“七大”和拉丁美洲马列主义党发表了“反对依靠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联合声明之后，革命机体上的恶瘤穿孔了。不早不晚，“三个世界理论”的炮制者和维护者被迫声明，他们认为那个理论仅是革命运动的一种战略，而这个战略却是没有在任何党代会上、没有经过共产党人的广泛讨论的。他们对那些不同意依靠一个超级大国论点的人大吵大嚷，说这个战略包括这一条。他们采取不进行任何协商，把某种路线强加于所有的党应当得到谴责的手段，认为不同意其立场就是冒犯了他们和攻击了他们的党。

阿劳七大以来，那个没有根据的理論的真实内容越来越清楚了。《人民之声报》的文章在弄清这个有争论的问题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文章以有力的不可辩驳的马列主义理论根据，揭示了那个完全背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制定的目标的所谓“创造性”的虚伪战略是多么有害，是多么反革命。我们，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努力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运用于我国具体条件中的巴西共产党人，应当认真研究这篇文章的内容，它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三个世界”理论的机会主义性质，而且给予那些愿意把赋予先锋队的任务推向前进的人们以宝贵知识。

“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没有华丽词藻。它开门见山地深入争议问题的中心。它一开始就指出当代一切革命战略的前提：存在两个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两种制度在较量，不管出现什么暂时性的倒退，其趋势总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自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就不是唯一的制度了。自一九三九到四五年战争以来，它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总危机。忘记这些基本的东西，就不能正确地领导无产阶级一现代社会产生的革命力量——进行自己的解放斗争。“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无视地球上这种正确

的划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否定无产阶级的重大胜利，完全不了解我们所处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时代过渡的特点。意味着暗暗地保护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借口反对超级大国之中的一个，抹煞革命前景，在激烈冲突时刻，把工人阶级同其历史使命分开。

采“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代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无知的。他们将构成社会发展辩证进程的这些矛盾置于一旁，为的是以被歪曲的政治全局为根据，以便掩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侵略与掠夺的本质，以便于掩盖他们扼杀革命的用心和实现世界霸权的企图。

《人民之声报》的文章指出，在那个理论中看不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被包括在反动势力统治地位的第三世界——也看不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仅仅为了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应当和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联合起来；也看不到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人民应和本国反动派联合，应与和苏联人有矛盾的帝国主义结为“同盟”。归根结底，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应朝革命前进，而应朝着直接有利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目标前进。以基本矛盾为基础的革命的列宁主义方针被抛弃了。这恰恰表明，“三个世界”的战略不是无产阶级的战略，而是激烈争夺原料产地、市场、势力范围和地盘，同时同其主要对手——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残酷斗争的资产阶级的战略。

“三个世界”理论的炮制者们企图为其机会主义立场辩护，说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但是，如何利用呢？尽人皆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会利用对方的矛盾。资产阶级利用对手的矛盾以便蒙骗工人阶级。它故意将它的私利和民族的总的利益相混淆，用保卫祖国来掩盖其战争和掠夺政策；把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企图把无产阶级拉到它的立场上，使它背离与资产阶级在阶级、社会、政治上相对立的独立道路。工人阶级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利用矛盾。《人民之声报》的文章指出：

“要永远根据原则，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利于革命、利于人民及自由，以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业。根据原则，利用敌人队伍中的矛盾要使革命和解放运动得到发展和加强，而不是使它削弱和缩小，要有利于不断动员群众反对敌人特别是反对主要敌人，决不允许利用矛盾在人民中造成幻想。”“三个世界”理论的辩护者提出的所谓利用敌人矛盾，实际是老牌的阶级合作、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利益、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难道无产阶级与美帝和其他垄断组织的联合，受压迫人民与附属国或半殖民地国家反动派的联合，如同那个理论的炮制者所说的有利于革命？还是相反，他们帮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扼杀革命运动，为了有利于它们的战争、压迫和掠夺政策而动员群众？显而易见，这种方针会降低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阻止群众的革命前进。恩维尔·霍查同志非常正确地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面临巨大危机的现实，我们要加强同它们的斗争，为了我们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起来闹革命的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利用敌人中间的巨大矛盾，我们应不断地揭露敌人，我们不应当在他们被迫做出有目的的让步和某些收敛，企图化险为夷而后东山再起时自满起来。”

倒霉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发明者们习惯于说，不能同时反对所有敌人，每次只应反对一个。他们认为，当前的敌人只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战略观点来看，国际无产阶级要与所有的资产阶级敌人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口号，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是那个国家的，它的力量是大还是小。同样，资产阶级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任何地方的革命，不管它在哪里发生。在帝国主义占统治地位，以及存在有封建残余的国家里，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可以吸引或者中立民族资产阶级。但是这里的资产阶级会始终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方式——以防止运动越过这个阶段向社会主义前进。同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任务，国际无产阶级可以在某个时期集中火力打击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目前，集中力量打击人民的主要敌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是要中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更不是要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支持其剥削的、新殖民主义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无产阶级放弃革命，那就将是背叛自己的事业。既不能使它遥遥无期，也不能任其自发。

要每日每时地以各种方法和手段，为使它得以实现而斗争。在反对主要敌人的斗争中，革命可以在某些国家发生，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了的。然而并不是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美、英、法就更不用说了——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如果我们的思想局限于一次打倒一个对手，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真正意义，放弃了为革命事业胜利进行广泛准备的基本任务。

社会发展是一个辩证过程。量的聚集会带来质的革命的飞跃。这个发展不是通过（比如每次一个）一般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来进行的。无产阶级提高觉悟，积蓄革命力量，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以革命暴力打破禁锢他们的剥削压迫制度。企图在苏美战争争夺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和超级大国中的一个联合时会使对抗国家的形势发生某些质的变化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结果这只能维护资本主义，大量屠杀劳动人民。此外，正在斗争的两个集团都要协调对付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办法。只有当工人阶级的敌人被以革命的方式消灭，这种消灭导致工人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结果才算是社会改造。

阿尔巴尼亚同志们的文章非常正确地指出，企图把自己说成是反帝和反社会帝国主义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破坏和削弱所谓的第三世界和所谓的第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理论”。我们战斗在附属国和半殖民地国家，我们懂得这种理论的反革命性。它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如果说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的走狗们要使革命运动服务于资产阶级并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那么“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者就是要把各个被压迫人民的最高利益从属于各自国家最落后的势力。他们，这个理论的宣扬者是“第三世界”统治制度的卫道士，即使这种制度是由最凶残的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所代表的。他们起着安抚着人民群众革命愿望的作用，借口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把人民纳入其反革命战略。他们就是这样卖力地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效劳。虽然他们喋喋不休地说，革命是不同遏制的潮流，但不去联系干革命必需完成的任务，仅仅说些脱离实际的空话而已。事实上，他们今天不希望有任何革命，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要，因为在附庸和半殖民地国家不推翻现在与帝国主义紧密联系的统治阶级，又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能进行革命。“截至目前——阿尔巴尼亚同志们的文章说——还没有一次解放斗争和民族民主反帝革命不与内敌人、与反动派、叛徒、与卖国贼和反民族的分子斗争就能发生的。”当前，被掠夺的和被剥削的人民在马列主义党领导下，为了获得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团结进步力量及大多数国家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而作出努力，同这种理论进行斗争是一项不可分割的任务。

不管其作者高兴与否，“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一种新型的修正主义。其中混杂着社会党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和封建主义性质的已成为历史上的文明的观念。它之所以是修正主义，是因为它以折中观点取代马列主义原则，蔑视革命，抛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战略，完全背离了列宁主义思想，即无产阶级是构成我们时代中心的社会力量。它在实质上与其它种类的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它们追求同样的目的：维护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建立所谓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的）、寻求与苟延残喘、分崩离析的帝国主义共处的合适方式。

在理论和实践的领域里，《人民之声报》的文章向各大陆真正的革命者和马列主义者提出伟大任务。不完成这些任务，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就不能前进。不管这些任务多么艰巨和复杂，完成它们是当前不可推托的。一旦完成了这些任务，就为胜利展现了光辉前景。“世界目前处于革命和人民民族解放事业——恩维尔·霍查同志说——不仅仅是一个愿望和一种前景，而且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的时期”。马列主义科学掌握得越多，并把它运用于各国实际中去，与机会主义不断斗争，进行坚持不懈的革命活动，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越接近自己崇高目标。

巴西共产党将尽可能地揭露各种修正主义，因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密切联系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那么它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巴西共产党代表着本国人民最大愿望，在全世界马列主义者的支持下，将投入争取巴西革命胜利的艰巨活动中去。

欧洲马列主义党声明的国际意义

《工人阶级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德国、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真正马列党十月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声明采取的坚定而鲜明的立场，不但捍卫了马列主义和一贯的革命战略，而且是反对了一切类型的机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各种流派，特别是反对了宣扬“三个世界理论”的修正主义流派。署名的五个党坚决地表示了对不可战胜马恩列斯的理论的忠诚，表示了他们执行争取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路线的决心。巴西共产党热烈欢呼坚决支持五个兄弟党的联合声明，并在无条件地忠于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同他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紧密团结。

为革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党

在当前，当现代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刻，象欧洲各党在其联合声明中那样，高高举起马列主义的光荣旗帜是极其重要和及时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在加深，阶级斗争在欧洲和全世界正在加剧。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向无产阶级和人民指出把他们从各种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道路。

当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欧洲在深刻的多方面的危机中挣扎时，马列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应站在劳动人民的轰轰烈烈的斗争前列，迫使富人为危机付出代价。但是，要实现这个革命任务，必须把这个斗争与妄图使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同遭危机结果的各种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对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政策是不能沉默的，而“三个世界理论”的宣扬者们，和修正主义者是站在一起的。

当由美国指挥的北大西洋军事侵略集团和以苏联为头的同样是侵略性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在加紧备战

时，马列主义者的义务就是揭露这些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制造者，动员人民起来制止战争的发生。只有大张旗鼓地揭露以各种方式支持反动资产阶级和超级大国的战争政策的各种机会主义，上述革命任务才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有必要揭露“三个世界”主张者的叛徒立场，他们要欧洲无产阶级和人民支持各自国家的与美国合伙的，掠夺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进行战争准备和加强北约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当欧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加强其镇压和统治工具时，马列主义者应站在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列、这个斗争是和反对美化资产阶级政权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系在一起的。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能对“三个世界”理论家们保持沉默，而要坚决斗争，揭露到底。他们与象德国的施特劳斯和葡萄牙有名的法西斯分子的佩雷斯·维洛索等超级反动派勾结。

危机、贫困、失业、备战、取消自由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无产阶级不断起来用各种方式不但反抗资本主义的这些弊病，而且反抗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个事实源于客观本身。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截然相反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摧毁，社会主义没有胜利，这两种利益就不断地冲突着。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基本目标，它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深切愿望。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必然会占领欧洲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头脑，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特别是要一个战斗的马列党做为其先锋队的必要性。只有资产阶级令人痛恨的秩序的卫道士们，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铁托分子，“欧洲共产主义者”或主张“三个世界理论”的修正主义者才宣扬与欧洲反动资产阶级妥协和配合。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立场与这些资本的奴才们的立场是针锋相对迥然不同的。联合声明说，“我们这些党的全部斗争，就是为了在我们这些国家里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必要条件，也就是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并继续革命直至实现共产主义。”

革命一白热化的问题

忠于马列主义革命精神的党，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欧洲进行斗争是令人高兴的。欧洲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摇篮。在那里，独立的工人运动，随着一八三一和一八三四年里昂起义迈出了开始的步伐。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永不过时的“共产党宣言”，奠定了劳动者国际活动的基础，制定并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欧洲是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斗争和一八七一年光荣的巴黎公社、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革命英雄主义的篇章的舞台。

那些革命传统永远铭刻在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及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的记忆里、内心里和斗争中。欧洲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诋毁和歪曲这些革命传统。他们老练而残忍地，同时又阴险地大力使用腐蚀和引诱的手段。他们特别擅长于运用被列宁称为“资产阶级工人党”来延缓其垂死的制度。当今，从葡萄牙到苏联，从挪威到意大利，在几乎整个欧洲的他们通过或在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修正主义党的帮助下进行统治。这帮资产阶级的走狗，无耻地运用没有一点革命无产阶级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词藻，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引入和平改良、阶级调和以及捍卫资产阶级民族利益的斜路上去。

然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的没落、它的总危机、周期性的危机、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阶级斗争都在继续，在激化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为革命准备着地盘。有人对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提出疑问。贝林格、卡里略、马歇、库尼亚尔之流二十多年前在接受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时候背叛了马列主义和革命。但是在最近，“三个世界理论”的追随者也走上了同一条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绥靖道路，他们抛弃了革命，滑向了修正主义。他们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运动必须暂时停留在整顿队伍、积蓄力量的阶段。即使真是这样，这也不是战略问题，而仅是策略的、暂时的问题。什么时候重整无产阶级队伍和积蓄力量要求放弃马列主义路线，把争取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放在一边，采取完全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配合的立场？恰恰相反：真正的重组无产阶级队伍和以革命方式而不是以改良主义方式积蓄力量要求一条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要求和工人群众一起，开展马列主义先锋队的战斗活动，要求和一切力量一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三个世界理论”的宣扬者们进一步展开其投降主义立场，说欧洲暂时没有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进而得出荒谬结论，即欧洲的劳动者应当和他们各自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以及所谓“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从事共同事业。更严重的是，他们是在整个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欧洲处于阶级斗争加剧，并走向社会和政治动荡的过程中讲这些话的。旧秩序在明显地腐烂着，资产阶级正日益难于象过去那样进行统治了，受压迫的群众的不满和要求变革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劳动人民在斗争。革命的客观条件在迅速成熟，欧洲一个马列主义党的联合声明说得对：“今天世界形势是复杂的，但总的来讲，有利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各个大陆由于动摇剥削和压迫的旧世界基础的革命高涨而在沸腾着，在世界范围内，革命和社会主义处在议事日程上了。”

鉴于这种事实，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正确指出的，革命事业决不仅是一种愿望和一种前景，而是一个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问题的中心在于把革命的主观条件发展到有利的客观现实所要求的程度。问题中心还在于，如列宁所讲的，通过革命党的实践，证明它们具备充分的觉悟、充分的组织性，和被剥削群众的充分联系，有决心和巧妙的手段来利用危机加速革命胜利的能力。为此，正如欧洲共产党联合声明所指出的欧洲和世界马列主义运动必须要清除一切机会主义渣滓，在与五花八门的现代修正主义——苏联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和“三个世界”的——势不两立的斗争中，在各国发展和加强自己的队伍。在理论、政治、组织方面要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斗争到底，捍卫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学说，国际共运必将懂得以革命方式回答生活对我们的挑战，必将揭露并孤立那些妄图使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伟大事业服从这个或那个大国利益或野心的人们。必将把革命在各个国家在全世界引向胜利。

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欧洲马列主义党以及拉美党的联合声明着重提出了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国际主义关系、团结合作、他们的多边会晤以及集体交流经验和意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主张“三个世界理论”的人们反对这种关系，特别反对多边会晤和联合声明。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些关系发展了并带来积极效果：它使真正的马列党交流经验，使它们平等地共同处理有关相互利益的问题，讨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的根本问题。

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各种流派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的严重危害。加强了国际共运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求 阶级斗争的深入，革命力量的聚集，无产阶级占据革命领导，力量岗位的必要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迫切性，只能突出“共产党宣言”中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能强调为马克思一八六四年严重警告的现实意义：“过去的经验教导我们，忘记各国劳动人民之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关系和应当鼓励他们义在争取自身解放斗争中相互支持，那么各自孤立的努力的共同失败就是惩罚。”在这些教导指引下，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解散后仅四年，以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一些欧洲共产党于一九四七年在一次会议上成立了情报局。这次会议的决议说：“会议指出，参加此次会议的党之间缺乏联系，是当前形势下的严重缺陷。经验证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相互不通气是不对的，是有害的。各党相互交流经验、自动协调行动现在尤其必要，因为战后的世界形势和共产党之间缺少交往，会给工人阶级造成损失。”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使人们比较容易地了解了铁托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并能在国际共运中揭露它。情报局在苏共二十大后解散了。但这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寻求在真正马列主义政党之间联系和配合的合适方式了。各党之间的多边会晤和联合声明，指出了在国际共运中加强关系的道路。

这是符合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需要的唯一作法。任何相反的态度就意味着滑到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就是以沙文主义的观点代替无产阶级的观点，公开反对各国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这种利益融成一个最高目标：推翻资本主义的枷锁。因此，正是无产阶级是打倒另一种国际力量——资本的力量——的斗争中的一种国际力量。国际主义，国际声援、各国劳动人民的统一行动，是争取会主义斗争成功的需要和必要条件。各国劳动者不搞声援斗争，就无法战胜国际资本主义，无法建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由于它的本质，决定了它的经常性，的、必不可少的任务就是促进劳动者之间的国际团结和合作，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经常高于个别的、狭隘的民族利益。工人阶级各支部队之间关系的国际主义基础，在于需要行动的一致性，协调自己的活动，互相支持相互帮助。

“三个世界”的思想家站在完全相反，丧失一切原则的立场上，竭尽全力破坏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团结。他们搞阴谋，推行分裂政策，正如联合声明正确指出的：“怀着把‘三个世界理论’和其他机会主义观念强加于人的目的，他们企图对马列主义兄弟党施加压力，分化他们，在它们中组织派别。在一系列国家里，他们支持与已经存在的共产党对着干的机会主义集团和挑衅者，鼓动成立另外的集团。仅仅由于兄弟党不接受其机会主义路线，就断绝了与他们的关系，与此同时，却把上述那些完全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和挑衅集团称之为‘共产党’，只是因为这些集团机械地重复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这种政策和实践不能不遭到强烈谴责，因为它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以国际主义精神，以极大的同情心捍卫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看到了那些真正的马列主义党在那些老的共产主义集团抛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变成荒谬理论的信徒，反动资产阶级奴才的国家里为重建革命党而做出的努力。不可否认，在这些国家真正的马列主义党的重建，将是总结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的沉痛教训的结果，而它将永远永远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理论、与反对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在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实践在马列主义政党活动中不可估量的意义时，我们同意签署联合声明的欧洲党的以下意见：对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声援是压倒一切的义务。今天恩维尔霍查的故乡是欧洲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明亮灯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捍卫马列主义纯洁性英勇坚定而彻底的伟大典范。将

队伍团结在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周围、保护它免受于帝国主义和各种修正主义的攻击，是所有共产党人的不可推卸的职责。

巴西共产党和欧洲兄弟党一样相信，不管困难再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发展壮大，因为它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吸取着不可战胜的力量。巴西共产党坚持始终不渝的马列主义立场，决心为共同事业的胜利作出贡献，永远不用原则做交易或取消反对无产阶级叛徒的斗争。

团结和加强工人运动——首要任务（摘译）

《工人阶级报》一九七八年一月

资产阶级经常在各地力图破坏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其队伍，并使它脱离真正的轨道。对于他们来说，再也没有比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政党的存在，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更危险的了。

与资产阶级利益相联系的各种机会主义为共同的目的而积极活动。苏联修正主义者促使以前的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组织。三个世界理论的炮制者们同样竭力阉割工人运动的阶级性。他们都企图保住并发展具有反无产阶级性质的修正主义党或所谓的反修的党。

当前，根据对真正无产阶级运动所持态度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行为和自诩为共产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者的行为。赞成还是反对暴力革命？赞成还是反对真正马列主义组织的存在和团结？赞成还是反对受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的一个战略？对于这些问题都要求做出正确的回答。

捍卫工人运动的团结，在每个国家和在全世界都是首要任务。这种捍卫同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争取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它与揭露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及其欺世惑众的论点和根据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不可取消的原则

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规律，揭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制定了后来被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彻底的革命者发展的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从那时起，工人阶级在统一领导下，为共同的目的行动一致的必要性就变得明显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都为自己的私利尔虞我诈，与它们相反，无产阶级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力量，它的利益只能在争取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共同斗争中才能得到。

但是，要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团结起来，工人阶级首先要锻造出自己的政党，革命的党而不是改良的或阶级合作的党，这种党要能够把劳动者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赋予其阶级斗争的彻底性，保证使其有坚定的同盟者，能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总之，能作为工人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决斗的参谋部而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主张要有这种党。基本步骤是制定纲领和出阶级目标。他们于一八四八年写出了至今仍照耀着被剥削者的社会解放道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明确地确定了组织的思想原则和实现团结的基本前提。指明了一个党只有当她接受、执行和捍卫反资本主义的、从根本来说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时，才能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允许在党的纲领和行动中，存在其它观念，如果这种观念会改变其阶级性质的话。当德国社会党的领袖们要把资产阶级观点私自列入哥达纲领中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且警告说：如果这些观点占了上风，将解散该党。这就说明了党组织思想意识纯洁的重要性。

列宁也曾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为统一世界工人运动而不懈地工作。他曾创立了胜利地领导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不仅仅主张只要一个工人阶级的党，而且认为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不能呆在同一个党内。在一九一二年的布拉格会议上，列宁彻底地同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决裂了，他们属于钻进俄国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流派。他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表示了极大的兴奋：“我们终于把取消主义的污秽清除了，使党和党中央恢复了生气，愿你和我们共同（为此决定）而高兴。”

由于第二国际破产以及从属于它的许多老党变成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列宁主张创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另一个世界性的机构。这个机构，即一九一九年建立的共产国际，在它的纲领中说道：“共产国际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胜利斗争，决定了每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团结的、经过斗争锻炼的、有纪律的、集中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它的章程规定：“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堕落，各国出现了不少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拥护俄国革命的集团和小组织。列宁从未鼓励过这种分散性。相反，列宁规劝它们统一起来。对于英国革命者，列宁在批评了他们的“左”

的错误立场后指出：“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斯大林认为共产主义队伍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指出，党的统一是不允许派系存在的。他说：“共产国际的成员不能接受自由主义也不能接受派系自由。”《列宁主义基础》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所主张的这些原则是不可废弃的。这些原则构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基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观点来看，在一个国家里存在一个以上的工人阶级的党是不正确的。这种存在将导致政治和思想分散，它将使革命事业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成为不可能。在一个国家中只能有一个党、在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工人运动，这个党和运动从它的思想、纲领、活动方式、国际主义表现和对革命的忠诚，都应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

叛徒和分裂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反对这些不朽的原则。当他们采取了在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机会主义路线时，严重打击了第三共产国际时形成的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为工人党变为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组织开辟了道路。许多国家的工人贵族十分欢迎他们的荒谬论点。

机会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只有少数党免受其害，对付了修正主义祸害。这个叛徒集团分裂了无产阶级运动，在许多地方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十分露骨的为处于解体的资本主义效劳。

但是，苏联机会主义的某些特点和老机会主义不尽相同。它就直接和社会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大国目反标效劳。自从与真正的马列主义运动决裂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叛徒们竭力发展从属于它们的国际修正主义运动——即它们扩张主义政策的工具。苏修与其同伙共同开会，抛出由所谓的共产党签名的共同声明，企图将它的同伙纳入自己霸权主义圈子，并且攻击真正的革命政党。

修正主义之间的团结是行不通的。只有有共同利益的才能有团结，叛徒内部不可能有团结。每个修正主义的党，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党，都捍卫本国资产阶级在与其他国家垄断者斗争中的利益。苏联是一个追求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在国际范围内必然要同其它资产阶级集团发生冲突。因此，在苏联和其他修党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分歧。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就是这种分歧的表现。为着得到资本家主人的欢心和信任，欧洲的和日本的修正主义党对苏联政策进行过批评，表示独立于莫斯科。日本党和西班牙党在这些批评中是突出的批评有时候甚至是严厉的。今天，只有那些资产阶级比较弱的不太发达国家的修党，以及依附于苏联的一些卫星国，如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修党，作为克里姆林宫集团走狗，才不好意思公开出来批评苏联。许多这样的党作为社会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在行动。

虽然苏联领导人耍阴谋，施加压力，但离心倾向在发展。为了支撑门面、遏制“独立”倾向发展，苏修忍气吞声假装接受卡里略的严厉攻击，他们对这些修党迅速加入各自国家资产阶级联盟感到担忧，对这些党的所谓意识形态偏向提出批评。苏修自己早就无耻地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丢掉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现在反过来批评自己在欧洲和亚洲的同伙的同样立场。它知道形式上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可以作为假面具来欺骗工人阶级，可以保持那些党从属于苏联的纽带，这些批评是为了动员这些党的基层支持它。

由于“独立”倾向的发展，苏联人着手组织另一些听命于他们的修党。为此，它依靠至今还能有欺骗性的人、老机会主义分子和莫斯科集团的无耻的代理人。这种事实在各国不断发生。在俄国革命六十周年之际，背叛俄国革命的人虚伪地纪念她，作为特邀者，瑞典两个修党都参加了纪念会。比较老的那个党抗议自己同类的出席，这个党曾倾向于“欧洲共产主义”。苏共的头领们在幕后鼓动成立另一个“忠于苏联和国际主义”的党。在西班牙差不多也是如此，李斯特从苏联回到那里，把自己打扮成卡里略的反对者和一个新的运动的组织者：西班牙工人共产党。他批评卡里略在西班牙君主政体和美帝国主义面前的奴才相，似乎他自己不是俄国新资产阶级的低三下四的工具。在英国，修党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文件。该党的另一派程莫斯科的许可下，立刻声明要另建立一个同样是修正主义的组织，只是忠于莫斯科而已。希腊和芬兰也是如此。在日本、六十年代苏联人支持一个修正主义分裂派，因此与修正主义多数者发生了冲突。后来放弃公开支持这个分裂派，以便同比日本某些垄断政治团体还右的所谓日本共产党修好。

这样，苏联叛徒们在分裂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操纵各修正主义党的同时，在拒绝完全支持苏联的自称为共产主义，而实为机会主义的地方成立傀儡组织，其目的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搞一个现其帝国主义阴谋和反革命战略的运动。各个亲苏的党是“合作主义”政权的胚胎，是第五纵队，在军事侵略中将发挥今天那些党在东欧为维持俄国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修正主义及苏联的傀儡在工人阶级中愈来愈臭。工人阶级终将对社会主义的叛徒、俄国、欧洲、亚洲及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走狗给予坚决的回击。

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也是分裂主义者

“三个世界”理论的炮制者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推行着一种错误的方针。尽管他们说自己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是马列主义者，而在实际上，他们作为分裂主义者和顽固的民族主义者行事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苏联叛变后，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世界无产阶级努力重组自己的队伍。早在六十年代初，由毫不迟疑地与修正主义决裂的人们和统一起来的马列主义团体组成的新党相继出现。它们的独立诞生是各自的国家和全世界革命成熟的标志。它们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冒险倾向的战火中得到锤炼。这种马列主义运动的加强，当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辉煌胜利。

然而，渐渐使人感到一种分裂行动，即今天宣扬三个世界理论的人的行动。他们曾在支持各国马列主义者的同时，令人奇怪地支持被从新党里开除出去的分裂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冒险分子。他们收容这些人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小组和派系的产生。他们散布荒谬的反列宁主义的论点，譬如，几个党同时存在不是什么坏事，可以统统予以承认，恰当地对待它们，也就是主要支持已成立的党，其次支持分裂的小组。他们和马列主义者的意见相反转而断言他们过去就支持各种集团，因为谁能判断哪些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正象这些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唯有实践才将表明谁个是谁个不是革命的。他们还说，只有得到本国人民承认的才算是马列主义组织。

“三个世界”理论家们用以承认各国的集团、派别和不同党派的根据是荒谬的，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提出的原则。作为马列主义党的条件决不是任何人可随意滥用的一个一般的称号，也不能单靠发表个流于形式的声明。许多人自诩为马列主义者，然而只不过是一个大机会主义者。但是，判断和确定一个无产阶级党的标准是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重新出现时，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中，制定了明确的标准。时至今日，这个标准在本质上仍是有价值的。一个政党的无产阶级面貌要由它对马列主义的忠诚，由它的阶级路线、反对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领导权的革命行动、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帝国主义集团，以及反对世界上的反动派、在实践中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证明。凡是具备上述特点党存在的地方，成立其他党和小组就无任何理由。不管他们把自己说得如何马列主义，这些新的小组和党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的小集团。毫无疑问，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承认是确定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但不能机械地运用它。如果我们机械地运用，就会得出布尔什维克党，马列主义组织的典范只是在十月革命后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荒谬结论，因为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它仅获得百分之十三的票数。难道当时获得百分之八十七票数，就是为工人阶级所承认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吗？布尔什维克党是在长期斗争中，由于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比其他政治团体的立场显得正确，才被群众广泛承认的。

在最近几年中，特别是发表了“三个世界”理论后，其作者加紧了分裂活动。当他们的机会主义方针遭到理所当然的抵制时，就开始对各马列主义党施加各种压力，与此同时，鼓动拥护三个世界战略的派别和新党问世。他们对哥伦比亚、阿根廷、乌拉圭、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在日本、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就是这样干的。这些党一般都是由被开除出共产党队伍的人、阴谋家和最臭的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尽管其中也有不了解工人运动性质被蒙骗的人们。这些小党的活动往往超出挑衅的界限。它们是反革命的，是攻击马列主义者的工具。在“三个世界”理论作者们颇有声势的支持下，借口反对苏联危险，它们与各国政治舞台上最臭的人结合在一起，甚至包括人人皆知的法西斯分子、刽子手和拷打革命者的人。

这样，“三个世界”理论的作者们表明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而在世界范围内，是支持有利于他们机会主义论点的假马列主义运动的人。他们依靠的是反革命的帮派，依靠的是充满了最无耻的机会主义的党，依靠的是那些尽管有学习马列主义良好愿望但并未掌握马列主义的组织。尽管这个运动的组织机构与他们的政策不相吻合（它会在自己资产阶级同盟军中造成不信任），他们还是认为该运动是他们推行联合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方针的战略需要。

尽管苏修和“三个世界”理论的炮制者们之间有差别，但他们在工人运动方面的活动是相吻合的。两方都不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热烈捍卫的真正的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双方都企图使无产阶级背离自己基本的革命目标。双方都力图建立和扶持服务于他们反革命战略的非法的和机会主义的组织

捍卫无产阶级团结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虚伪的“三个世界”理论，反对分裂无产阶级队伍的机会主义，是根本性的斗争，它要求加强各国和全世界马列主义者的战斗团结。这个团结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是革命前进的条件。

尽管存在苏修和三个世界（理论）的宣扬者们的旨在摧毁或者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的进攻，尽管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严厉镇压，但是许多国家的马列主义党已经懂得抵制它，并懂得捍卫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尽管他们之间的许多党经验还不丰富，但是它们代表着未来，它们很快就能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坚定的战斗先锋队，列宁主义原则的忠实捍卫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是这方面的伟大榜样。

当前，资本主义面临最严重的危机，受剥削和受压迫的群众要求大的变革，马列主义队伍的发展是这

种形势的需要。如果在某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建立或重建起来。如果知道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的必要性，而却承认修正主义叛变或严重偏离马列主义原则，不努力高举党的旗帜，就是一种机会主义。党不会自发出现，先进分子和想使党发挥作用的人们应当主动去建立它。当党出现了，而比还不太成熟时，它会犯错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马列主义者的兄弟般的帮助，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它作为先锋队组织，就会前进，会巩固。

无产阶级为使自己变得强大和不可战胜，在任何地方都要统一行动。它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首先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在世界任何地方对资产阶级的每次打击都削弱着资产阶级的势力，加强着劳动人民的力量。反之，在没有受到马列主义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抵抗的地方，资产阶级就加强了他们危害革命的阵地。因此，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在各个国家和全世界开展活动，采取统一的马列主义的革命的世界战略。该战略的实现要靠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实际要求的各种策略

毫无疑问，困难是很大的。不能低估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过去以及现在对无产阶级运动带来的巨大损失。同样不能忽视反动派给我们的打击，过去以及现在反动派夺去了许多有经验的革命者的宝贵生命。但是客观条件是有利的。无产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保存了高举马列主义光荣旗帜的基本核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可以以大而稳步伐前进的。

我们巴西共产党人要努力捍卫工人运动的团结，巩固巴西共产党的队伍。我们只要同普列斯特斯修正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各种表现，同在我国建立所谓的马列主义党，但又失败了两次“三个世界”理论的追随者们的尝试斗争，我们就能不断地完成那些任务。巴西需要一个有力的、联系群众的、团结的、有纪律的、有警惕性的，能完成其革命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已取得的成绩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知识分子中间和其他阶层中增加党的核心，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正错谋和缺点。这样，我们就会具备更好的条件去执行旨在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更大贡献的革命路线。

三个世界理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的翻版

G·丰特斯

(一)

《工人阶级报》（一九七八年三月）

去年年底，三个世界理论的炮制者们的御用机关报刊发表了长篇文章，它为各地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谴责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寻找根据。

这篇大肆传播的文章，不仅企图十分广泛地宣扬其炮制者的思想，而且同样地企图反驳无数马列政党所发表的见解。巴西共产党是明确公开地采取反对三个世界方针的立场的组织之一。为了捍卫党的观点，感到有义务回击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观点，以便澄清党员思想并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

这里，我们将针对该机关报所提出的第一部分中的问题集中谈一下。我们将在不久，再来评论其它部分。

一、新的机会主义的革命理论

在第一章中，文章作者竭力解释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原因，并为奇异的新理论的出笼而辩护。它回避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问题进行分析，不分时间地点地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录，并且偷偷地把他们自己炮制的丑恶形象的起源加在这些人头上。为了迷惑读者，作者颠倒基本问题，即制定了另外一种反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把它说成是当今阶级斗争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焦点。企图使人相信，关键在于是否承认形势的可变性的原则和对客观现实的检验。

马列主义者从未把现实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正是由于现实在不断地变化，所以策略也要根据情况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社会基本矛盾加剧的产物。每时每刻观察现实，这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内外力量的部局，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对我们的策略进行调整。在现代巴西我们说在反独裁的斗争中，突出表现为三种势力：人民力量、妥协势力和反动的法西斯势力。但是：我们的政策方针不是从这个事实出发，而是从在我国建立了一个反人民、反民族的政体的形势出发”从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精神状况出发的。

但是，这并不是承认或否认世界范围的变化或对每时每刻的现实观察，尽管这种观察具有各种取决于实践者的观念的形式。中心问题是出现了另外一种所谓科学的革命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曾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它符合于非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符合于革

命从根本上来说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问题的时期。为了取得和保卫胜利，革命应该同时在几个国家内发生。

后来，在另一种历史形势下，列宁捍卫了同样的原则，联系帝国主义时代和垄断统治，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具有充分根据的革命理论。这条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在最后阶段所引起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上产生的。列宁揭示了发达国家中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制度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各国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控制原料基地、市场和势力范围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断加剧并要求解决——他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列宁对现实的这个深刻而辩证的解释，指出对待革命的一种新方式。这个解释，已经不能分别以这些或那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以这个或那个先进国家存在和不存在客观条件、从某一个国家的孤立发展的结果为出发点来检验。革命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成为所有被全部占领的国家的的问题，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表现在帝国主义经济整体之中，这是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固有的矛盾发展的结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革命总是在帝国主义阵线的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上出现的。列宁主义的理论把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革命斗争结成唯一的整体。这一严格科学的和由生活所验证的理论，为全世界被压迫劳动者和人民打开了广阔的前景。共产党人就是依靠它来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分析具体形势、革命进程的发展和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只要历史时代不变，这一理论继续完全有效。

但是，机会主义者以种种借口，总想抛弃和取替这一理论。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一种新的革命理论。说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新的有利的力量对比，他制定出一条与列宁主义相反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无产阶级将以和平的方法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将在两种制度中，通过和平竞赛来取得胜利，事情将在和平共处的范围内，在没有战争、没有军队的世界中发展。这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理论。

现在，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重新炮制了一种关于革命的“新的”理论。他们与赫鲁晓夫一样说存在着一种有利的国际力量的对比：“各国人民的力量正在日益发展，革命因素正在不断增加”。然而，他们又在该文章的另一段中显得悲观：“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苏联的背叛在工人运动内部和世界反帝革命斗争的队伍中引起了分裂，产生了暂时的困难”。他们的理论用一堆没有逻辑的公式和一种典型的修正主义的“出路”代替了列宁科学学说。按照这一理论，无产阶级并不处于当今时代的中心，阶级斗争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谓的第三世界成了历史的动力。革命已经不是如同列宁所说的，在整个帝国主义制度中，客观条件成熟的产物，而是民族斗争的结果，把这一斗争看作是包括落后国家的反动势力在内并由它们领导的运动。当前民族问题——他们是这样歪曲的一是“阶级斗争的关键问题”，“是无产阶级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它已经不是世界规模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战斗行动的结果，而是各国家冲突的结果。不象列宁所说的那样这个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式下产生的，在这里“各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总之，革命的产生是“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的无原则团结，加上“第一世界”的一半（美国）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结果。这种理论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制度，而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是以消灭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为目的，而唯一是要消除其作者所说的那个主要敌人。这种理论不会导致被压迫或附属国家取得解放，而是会加强帝国主义统治和这些国家的反动领导阶级。

应当指出，这种理论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在一段时间内，这个理论炮制者们主张这种理论，即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尽管后来形式上承认了当今时代还是列宁所确定的时代，但实际上，“他们固守原来的观念”。他们反对给工人运动赋予革命的性质，阉割真理，企图免使这一运动走向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的方向。

承认还是否认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是实质问题。如何看待政治局势、它的发展和给劳动者和人民指出方向，一切考虑都来自这里。

二、对经典著作的歪曲

三个世界官方报刊的作者们为了维护一种新的理论，在大量地引用了马列主义的原著时，偏离了各种政治力量和主要敌人的地位问题。在此问题上，他们粗暴地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歪曲无产阶级导师们的思想，把它运用于不适当的形势中和不恰当的事情上。

他们说：“划分为三个世界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对欧洲政治力量的划分，同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世界的划分，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国家的划分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虚伪的。

实际上与什么一致呢？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划分政治势力与另一个时期的划分，与当前的划分有什么关系呢？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旧大陆的各种势力的部署时，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当时，帝国主义是不存在的。许多欧洲国家的民族统一刚刚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刚刚迈出第一步。一些国家的劳动者还在进行反

对自己的敌人的敌人的斗争。建立在俄国专制制度上的沙皇帝国代表着欧洲封建主义最富于侵略性的残余。

这与今天的形势有什么可相比拟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观察当时的政治背景时，注重于基本问题，着眼于革命、工人运动的独立发展和当时政治进程中真正民主的方面。那是另外一个历史时代。

列宁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分析战后各种政治力量的地位的。苏维埃共和国刚刚诞生；帝国主义已经用武力实现了一次新的世界瓜分，战胜国从可怕的混战中得到了好处；凡尔赛条约使一个如此发达的国家如德国置于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社会民主党人给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带来的不满蔓延到欧洲和东方。在这种评价的之后几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俄国成为「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凡尔赛条约涉及的德国死灰复燃，希特勒主义统治了德国，并把它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中。战后，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国进行了革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和反动派的统治，殖民主义制度土崩瓦解。后来，苏联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地位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后一段时期的政治形势与当今世界情况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然而，有关这个问题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好象没有注意到发生的变化。他们在谈到列宁在一九二二年所描绘的景况之后，愚蠢地叫嚷：“在世界政治力量划分的问题上，简直象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说的！”历史的类比主义永远是不合适的抄袭。把过去的形势机械地照搬于现在，这只能铸成大错，一般地暴露了理论思想的贫乏和逃避现实。

但是，错误还不仅仅在于照搬，而且还歪曲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分析的思想。三个世界理论的御用机关报的作者抽出一段列宁的讲话，全面阉割他对事件的见解，并把他们蹩脚的论据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任何阅读过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人，立刻可以看到

为列宁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所作的复杂而全面的评价。正如新修正主义者所称，列宁分析的不仅是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而且还从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经济关系出发，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所有情况。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怎样加剧的，他说：“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高度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革命风暴的根源。”他在观察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为一方与帝国主义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时，最后指出：“这就是大战后世界的轮廓：十二亿五千万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他还指明了比任何交战国得利都多的美国与其它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的矛盾；指明了战胜国与“最先进、最有教养、最文明、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德国之间的矛盾；同样强调了“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为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而“进行激烈的争吵”中所引起的对抗。他同样地分析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他谈到“使工人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了”的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国内的食品价格的猛涨。他说：“（英国）银行利润率是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股票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百，一小撮人的财富增长令人无法相信，穷奢极欲，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贫困则日益加剧”。他还附带地强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新生的矛盾：“俄国这个虚弱的、破烂的，受到打击的国家，却抗击了所有的国家，抗击了统治世界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并且取得了胜利。”

概括说来，这就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面分析。怎么能把这一整套复杂、富有教益和策略指导作用的评价，缩小为一句孤立的词句，来无知地断言说列宁除了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以外，什么也没有讲呢？此外，列宁没有局限于对世界全貌的观察。他提出了恰如其分的结论；即不是“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以及“第一世界”的一半反对第一世界的另一半的结论，这是违背新修正主义者的兴趣的。不，作为真正的革命家，他得出了唯一正确的结论，他说：“我们正面临着正在成熟的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群众的生活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况，他们表示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剥削者和压迫者之间争夺的加剧使他们虚弱下来）”（原文如此）。列宁进一步从多方面深刻谈到当时的革命危机，即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指出了先锋战士们的任务。他说：“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强调说，“为了准备条件，我们正在召开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列宁在战后表现了多么惊人的革命辨别力！

中国三个世界理论家们说，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的伟大领导者把俄国划在殖民地国家一起，这种说法简直是愚蠢的。这个官方的报纸的编辑写道：“他（列宁）把社会主义的俄国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放在一类里。”列宁在谈到战后世界经济形势时，把俄国和殖民地的形势做一比较。这一比较也涉及到有关战争债务的问题（他附带谈到他的看法，说这些债务与记载在破纸上的价值是相等的）。难道已从帝国主义和沙皇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从政治和社会观点上来说业已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能勾：够属于殖民地范畴吗？列宁分别地估计了这个国家的形势。他在一九一八年八月给美国工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撕毁了帝国主义的肮脏条约，打破了帝国主义的锁链，因为我们不惜最大牺牲去争取自由，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虽然遭到帝国主义者的摧残和掠夺，但仍然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他在东方人民组织的报告中说：“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值得讲一

讲的是，列宁把俄国放在先锋队的地位同时放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上，它应当把人民革命运动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与新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包括在所谓第三世界的反动派一个口袋里是格格不入的。

这就是列宁的立场，是上述文章的炮制者歪曲了的立场，他们把这些立场缩小为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讲话内容没有联系一句话。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指示没有为三个世界理论家的背叛的、机会主义派别论据效劳和帮忙。

斯大林的语录也没有迎合他们的愿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后，斯大林也象列宁所作的那样，说世界不可避免地分成了两个阵营。这种划分不仅反映了暂时的现象，而且也反映了永久的现象，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对立，他说，这种划分，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斯大林从未做过别的划分，从未混淆这个基本问题。因为对在世界范围内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正在争夺和经常变化的力量进行估价是一回事，这个事实影响着无产阶级的策略，而两种截然对立的世界的存在是另一回事，它指导着工人阶级的战略立场。

他们提出一九四二年曾出现过两个对立的阵营——意德和英苏美，并企图以此找到各国人民、反对派和帝国主义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共同呼号的理论依据。但是，形势是不同的，类比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斯大林在当时的情况下估价了整个局势，有益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他说：“在希特勒德国强加于各国人民的战争中，出现了各种力量的根本分界。”这种分界不是人为产生的，而是实际产生的，它展现出一种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占居突出地位的矛盾现实。这里，苏联的（它在战争承受着主要压力）领导作用没有消失，世界革命运动也没有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不是象美国和其它垄断资产阶级国家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样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歪曲斯大林的思想，给他加上了民族运动“应当包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而不管这些力量的阶级成份和政治观点如何”的思想。这种厚颜无耻是一目了然的。首先，在上述的材料（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不只是谈到侵略，而且还谈到帝国主义的压迫；第二，斯大林说：无产阶级将不支持内韦的民族运动——“只支持那些要削弱和打败帝国主义而不是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第三，斯大林认为，民族运动的性质不能由他们所参与的社会地位来估价，而应由他们的革命性质和坚定无疑地反帝性来估价。因此，斯大林批评托洛茨基分子，批评他们否认支持殖民地国家反帝的革命战争的用处。在歪曲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时，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企图把错误的观念强加于人，把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说成是彻底革命的和反帝的运动，把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立场、受帝国主义摆布，甚至以此为基点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领导的解放斗争的阶级和政府的立场说成是进步的。

在引用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人们不甚领会三个世界主义者想用她证实什么东西。

在此书中，斯大林谈到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如何结束战争。斯大林思想的歪曲者们似乎想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的，但可以放在一边；革命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唯一要遵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斯大林含蓄地谈到这两个问题。他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还说为了结束战争，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因此，他指出：那么“如果各国人民把这个任务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把它进行到底”，和平将是可以维持的。

文章开头不久所引用的经典著作是被歪曲和置于现实之外的，其目的在于迷惑心不在焉的读者。可见对世界凭空划分的解释，只不过是一种诡辩。

三、三个世界理论骗人的根据

拿来的虚弱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的成份，有待得到各种检验。这是以对国际政治情况的肤浅的、图表式的看法为基础的，是主观的、脱离实际的，从这里产生的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毫无任何联系的划分。按照这篇文章，这种所谓理论所辩护的前提如下：当今世界 险突出表现为两种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 地和附属国民族的矛盾，有三种相互冲突的力量：最强国家的力量、第二类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和被压迫民族的力量；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并且也没有重新建立这种阵营的必要；帝国主义阵营也已不存在了，它的成员国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已宣告独立；工人运动中引起了 某种严重程度的分裂；美帝国主义已不是头号敌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分化（哪些分化？）、大改组（哪些改组？）。所有就是这些。

这些前提是虚伪的。发展中的矛盾和斗争中的政治力量的图景要比他们说的更加广泛和复杂，并且不能说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的说法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正如列宁和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阵营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就存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完整的阵营的出现而得

到加强。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背叛了革命。但是，只要存在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即使只有一个这样国家的存在，就将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从另外一方面讲，作为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个制度帝国主义阵营继续存在，不管谁是对立面。这两个阵营的斗争是长期的，它关系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关系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和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问题。否认这两个阵营的存在就是在分析世界形势时，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种决定因素。暗示美帝国主义只在一段时期内是各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它现在还是如此。美国与修正主义苏联一道都是进步人类的主要敌人。以苏联是最危险的敌人作为借口，把美国放在次要地位上，这是明显地回避和低估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者的越来越富有的侵略性和掠夺性。毫无疑问，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宣告了自己的独立，但是，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它们的大部分还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殖民压迫的形式被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取代了。而且，如果由于修正主义者的背叛而引起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属实的话，那么，不能从中推断出这一运动没有代表性，要知道它还蕴藏有巨大的革命潜力，而这正是促使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第二国际的破产也引起了分裂，但是这没有阻止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马列主义指引的无产阶级进行一场改变世界面貌的革命。

政治形势的实质性成份从那些前提中消失了。对国际形势的整个进程中的四种基本矛盾的观察在哪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的深化在哪里？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在哪里？大垄断集团对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剥削的激化在哪里？苏美之间和帝国主义狼群之间为市场和原材料的疯狂争夺又在哪里？哪里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行动在哪里？大部分落后国家的领导阶级的反革命甚至法西斯的立场在哪里？各种类型的修正主义的手法和引导劳动者和人民进行革命的马列主义者的大无畏的斗争又在哪里？

一个真正科学的方针不能不阐述世界形势所有这些方面，总其革命内容。但是对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来说，用只言片句另加一些否定，以及一点不合时宜的语录就想确定国际斗争的方向，并给他们认为与现代形势相一致的政治势力的集团下个定义，这就足够了。

但是，说明一下这种理论的出笼是有意义的。在辩论性文章 的作者把世界全貌描绘成唯心主义的畸形的图景后，他们象迷了路的行人一样提问：“出路在哪里？”他们回答到：出路“就是要对世界的政治力量进行一次新的划分（……），以便建立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一种新的世界战略”。这一划分的完美成果就是三个世界的理论！第一（世界）由两霸组成；第二（世界）由“剥削被压迫民族而又遭受超级大国的控制和欺负”不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其余的国家组成第三（世界）。然而，他们这样的分割就包含着新的划分和再划分。“第三”世界为了对抗美苏霸权主义要团结“第二”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中，一个是最危险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团结“第一”（世界）的一部分又是允许的。

谈到政治力量，但是这种分割是对各民族和国家集团的分割，它掩盖了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并起着腐蚀革命力量的作用。

这些根据是骗人的，也是可笑的。正象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理论不是对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进行科学观察的结果，也不是革命经验的总结。象它的炮制者所说的，它是为了形成国际无产阶级的战略，必须进行一次新的力量分割而产生的。这是一种任意论的结论，一种完全武断的分类。为什么不划分成四个、五个、十个世界，而只有三个世界呢？在此种划分中，没有社会主义世界的出现；所谓第三世界包括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反帝和亲帝的力量；“第二”世界是把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和苏联奴役的国家收集在一起。事实上，这种人为的划分是为了支持以某些国家的民族利益为中心的、而不是以革命和社会主义利益为中心的斗争计划。这种计划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体制。难道它可以用作革命的无产阶级战略的基础吗？肯定不行。

四、无原则的联盟

三个世界理论的卫道士混淆战略与策略的问题、长久与暂时的因素和革命原则与机会主义概念，极尽颠倒和诡辩之能事，指责他们的马列主义反对者是宗派主义托洛茨基分子和“关门主义分子”，说这些人只看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说反那些人拒绝无产阶级与其它潮流搞联盟。同时，装扮成广泛利用可能性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信徒。

但是大家都知道，马列主义者认为在世界发展中，基本的主要的斗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我们处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期，而决不能万进行图表式的推理。在战略和策略上，他们一直主张按照各种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适当的联盟和妥协。他们要经常善于利用各国和世界上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内部冲突和战争，把它们看作是革命间接的后备力量。他们坚信，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应当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中，巩固联系群众，甚至有些人是动摇的和不坚决的。

但是，他们从不忽视这一点，即存在着同盟军和所谓的“同盟军”，存在着妥协和所谓的“妥协”。只有那些有助于巩固无产阶级地位，有助于削弱自己的敌人的联盟是有用的。只有那些容易使敌人瓦解，有利于工

人阶级的活动的妥协才是允许的。

马列主义者从来不对在各个地方同民主和进步潮流共同前进，以便孤立和打倒反动派和法西斯提出过怀疑。为了唤醒和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他们不害怕同自由人士和改良主义者取得协议。只要机会恰当，他们为了保障最大的行动和组织自由，从来不拒绝同各个革命势力达成谅解。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同那些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军备竞赛和把危机转嫁到无产阶级肩上的一切人士站在一起。发展国家的工人革命运动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团结是列宁主义的一个原则。然而，列宁曾拒绝与落后国家反动的亲帝国主义、损害解放斗争的力量搞阶级合作或联盟。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了公式：“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要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三「命群众的、与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团结”。还强调说：“世界帝国主义将在各国(……)内的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反攻与几千万至今尚在历史之外的人的革命反攻结合起来的时候而崩溃。”可那么是谁在攻击这些原则，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所捍卫的种种联盟和妥协呢？是三个世界的辩护士们。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隐藏着企图让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好战分子和反对战争的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的机会主义的罪恶方针，这种联合的目的，总的说来是瓦解革命运动和保障资本主义的生存。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的翻版，是使用颠倒和诡辞术，企图把它灌输到革命队伍中的新修正主义分子的骗人的东西。它就是来帮助深深陷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它的作者们扮成帝国主义和反动政策最活跃的卫道士。列宁曾说过：“属于机会主义倾向的工人运动的战士是比资产阶级本身还好的卫道士。”三个世界主义者，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起垄断资本主义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宣传的，是帝国主义代表人物害怕彻底暴露自己，不敢大肆宣传的东西。他们比社会民主党的老狐狸还要右，他们和卡特、史密斯、德斯坦、西班牙的和伊朗的国王、沙特阿拉伯的酋长、皮诺切特、魏地拉、盖泽尔、萨达特、蒙博托、苏哈托之流站在同一个泥浆和鲜血的战壕里。

但是，他们的结果不会比第二国际的可耻叛徒们更好些，也不会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之流那种社会主义声名狼籍的叛徒好多少。历史是不会宽恕那些背叛了每个时代的崇高理想的人的。

(二)

《工人阶级报》一九七八年四月

在《工人阶级报》三月份一期上，发表了篇幅很大的材料，批驳了去年年底出现在三个世界理论炮制者们的官方报纸上的文章。本篇继续对“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有关章节进行批判性的评价。最后一章我们下次再说。

三个世界理论的炮制者们在这一部分中，企图收集荒谬绝伦、毫无连贯性的论据，为集中力量只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与美国超级大国的联盟体系而辩解。他们把所谓第三世界为轴心，把它看作当前解放斗争的主力军。他们一如既往，他们乞灵于诡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虚伪解释的依据。

(一) 最为危险和不太危险的理论

该文章的编辑们在阐述他们对两个超级大国的见解时，似乎不偏不倚地把攻击的锋芒对准争夺世界霸权的美国 and 苏联。引用事实，列举有关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好战性和掠夺性的材料，企图以此来诱使读者相信：他们在反映认清现实，在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然而，即刻暴露出他们的偏心。

三个世界理论的论据中心是确定两个超级大国哪个最为危险，哪个不太危险。他们两种重量标准两种尺寸，得出结论说，尽管美国是强大的掠夺者和好战国家，然而苏联是最坏的。他们说：“不能把两个超级大国等量齐观”，“等量齐观”就是“淆乱反霸斗争中的主要目标”。这就暴露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的假装的敌人。

他们在拿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做比较时，美化了美国。一会儿说，处于攻势的苏联“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断言美国只限于“保护即得的利益”（与此同时，人们知道这个国家不仅仅在保护既得的利益，而且还企图向外扩张）；一会儿借口苏联的战争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强调美国只支付百分之六（但是美元的总额要比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的百分之十二高得多）；一会儿指出苏联国家垄断经济达到高度集中，宣扬美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一会儿宣称莫斯科的扩张侵略政策是新近的和有欺骗性，说美国的这一政策由于是老牌的和众所周知的，但不会造成更大危害。总而言之，进步人类最疯狂的敌人之一、同社会帝国主义一样富有侵略性和掠夺性的美国，不应该摆在首位。

新修正主义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他们采用相比较的标准也可以用于相反的意义。苏方将

轻而易举地列举其它。如此之多的材料和事实，来证明最坏的是美国。但是，他们有系统地所做事完全是为了欺骗群众。

三个世界主义者的片面性论据具有明显的不连贯性。如果说。美国现在只“保护既得的利益”，那么说它争夺世界霸权就是虚伪的。它将安分守己，争夺霸权只是它的竞争者的问题。如果说美帝国主义处于守势，那么就不能说它是战争积极的准备者、军备竞赛的疯狂推动者。它只图自卫。不幸的是，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是这样想的。这里所指的不连贯性就是他们主张联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本身连贯性。因此，他们维护美国占主要成分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美安全条约。因此，他们还同样反对拉丁美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声明中的论断：世界人民不应该依靠一个超级大国去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

在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中，站在某个竞争者一方来寻求谁最危险和谁不太危险的方法，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总要出现有相对自我招架的现象。被剥削：受压迫一方必须要以相应的方法确定其政治态度！否则，它们将永远处于资本主义战争抉择的铁钳的威逼下，将在决定哪个金融资本家统治世界的战争冲突中充当炮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漏沙文主义。这种方法被第二国际的叛徒们采用过，他们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战火爆发后，由于巴塞尔的国际主义决定，坚持给两个相互争夺的匪帮究竟哪个是最有害的问题下定义。结果除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当时的各个社民党都采取了本国资产阶级的观点，使战壕这一边和另一边的劳动人民互相残杀达四年之久，为自己的目的压迫者效了劳。从这种性质的一次冲突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盼到的是更大的痛苦。在打算掠夺我们的两个匪帮之间的争夺中，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双方都是最坏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利用他们的矛盾，彻底消灭他们。

两个超级大国同出一辙，它们在征服他人的意图上没有根本的区别。毫无疑问，苏联为统治世界而武装自己。美国也不甘于落后。在世界上，它们魔爪没有伸到的地方是极少的。一个与另一个超极大国夺争着世界霸权。它们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斗争的基本目标。

无产阶级在制定其防御可能爆发战争的方针时，不应限于只注意某个竞争者最危险或不太危险、最富有或有较少侵略性，哪个最老或哪个最新。首先要象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深入地研究孕育着的战争的性质。三个世界的文章作者恰恰忽视了这一根本问题，他们站在第二国际叛徒们一样的立场上。历史在重演特别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旨在为沙文主义辩护而被歪曲了的语录中就是这样。

（二）一个原则问题

对正在准备的可能发生的战争采取什么立场？战争又有什么性质？正确地回答这个原则问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指导路线。

战争一贯是交战国每天所执行的政策的产物。按照这种政策——不是进步的和解放的政策就是帝国主义的和压迫的政策——冲突的本质就是如此。如果斗争的双方是帝国主义者世界人民的压迫者和掠夺者的话，这种态度的实施——战争，则具有反动的帝国主义性质。如果相反，一方贯彻执行进步和解放的方针，那么进行的战争将是正义的，并会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美国和苏联及其同盟者所准备的战争形式隶属于第一种类型。

但是，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认为，正在准备着的战争也是一场民族的和进步的战争。他们断言：“反抗超级大国大规模侵略、奴役和屠杀的民族战争，在今天的欧洲不仅仍然是可能和可以设想的，而且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就这样他们以祖国被侵略的借口，把欧洲垄断资本、新殖民主义、劳动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一种战争说成是革命的！这种战争无疑地将得到美国的支持和直接的参与。

按照他们的判断，我们好象处于资产阶级是一个先进的阶级的时代，（资产阶级）是进步的主要动力，欧洲历史进程的客观内容是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他们的证据是与考茨基式的社会沙文主义如出一辙的。在这篇正在讨论的文章中，新修正主义者们引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来支持他们的异端邪说。说恩格斯曾于一八九一年告诫要“保卫祖国”，说列宁也维护这一思想，把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战争看作是进步的。人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如果不是没有阅读过列宁（的著作），就是故意曲解列宁的思想。一九一五年七、八月间，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弗·依·列宁愤怒地驳斥虚伪地引证恩格斯的话，回击了当时的机会主义分子。写道：“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援引一八九一年恩格斯关于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时德国社会党人应当保卫祖国的声明；最后，那些想调和国际沙文主义并使之合法化的考茨基类型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则援引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斥责战争，可是从一八五四年 一八五五年到一八七一年——一八七六年

一八七七年，每当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那方。”列宁断然反驳说：“这一切引证完全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接着说：“谁现在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举尹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学玳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垂死时代、针对社会主义时代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

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今天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时代欧洲的民族战争只是响吞并或民族性受压迫的小国的战争，即这些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战争。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中，列宁把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斗争看作这次战争唯一的民族成分。列宁还说，只要战争“与欧洲大战有关，与英国、俄国等的贪婪目标和利益有联系”，社会党人就不能支持它。

战争根据发生的历史时代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资本主义还是进步的时期，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欧洲战争是一回事，有民族战争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变成落后的、帝国主义的力量、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成为历史进程的推进成分时所发生的战争是另一回事；当时，欧洲资产阶级挑起的战争一点也不是民族性的，而是非正义的。可怕的是，新修正主义者把“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不发达国家”，只要“受到侵略，战争就是正义的、具有了民族性的、无产阶级就要支持它的思想强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上。这就是社会沙文主义的观点——与研究战争的性质，研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相反，而受到与各国资产阶级利益绝然不可分割的冲突的外貌的蒙蔽。这就放弃了革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成与自己的刽子手的合作。

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以及卷入这场战争的所谓第二世界国家，对它们来说，正在准备的战争没有民族意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在美国或苏联保护下成立的有欧洲多数国家参加的、富有侵略性的工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以及美国与日本联盟的日美安全条约足以证实这一点。这些都是以世界冲突为宗旨的军事妥协，而世界冲突的目的就是镇压革命运动、在战胜国间把世界瓜分成势力范围、扩大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对全世界人民的统治。

这篇文章作者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同所谓第二世界的虚构的联盟的证据是最恶劣的欺诈。他们为了给这一证据辩解，就对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轻描淡写，掩盖其掠夺和压迫！企图，以它们将受到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而姑息原馐它们。众所周知，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是新殖民主义活动猖獗的压迫国家。欧洲和日本的金融资本日增长。它们在一些落后国家占据首位，而在另外许多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在世界各地攫取的超额利润远远超过前些时期的水平。不少此类压迫国家直接或间接发动战争行动，在不发达国家扶植反动政权，以保障其帝国主义地位。然而，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喋喋不休地宣称欧洲和亚洲资本主义大国列强“已经不能再成为控制和压迫第三世界的主要力量”，它们只能“作出让步”，“在反霸斗争严守中立”。他们从站在象博托一边，他们荒谬地欢迎法国参与扎伊尔内战。他们反对苏联的军备竞赛，却主张在欧洲和日本的搞军备竞赛。宣称，古老大陆的安全受到威胁，认为“西欧国家不得不加强自身的防务，协调相互间的关系，维持和加强从经济上、政治上到防务上的联合”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种防务关系和联合有着明显的帝国主义特性。他们对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是这样说的。实质上，这种立场同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仆从——欧洲共产主义者和日本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没有多少区别。

毫无疑问，现在的美苏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如同二十年代英国和美国互相抗衡的形势一样。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都不意味着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变成了无进攻能力的国家，成为工人阶级的盟友，或者失去了它们的侵略性和贪婪性。它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不会不去扩大其势力和统治范围。它们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受害者”。它们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与苏联和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内部，及其与日本等国的矛盾，都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性质。

东西南北的劳动人民站在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某一方都是一种犯罪。无产阶级作为处于当代中心的、先进的社会力量，不能不坚决反对这样的战争，一旦战争爆发，就要把它变成解放战争，取得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

(三)所谓主力军——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

为了反对一个超级大国和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可能爆发，该文章的作者谈到了所谓第三世界。露骨地宣扬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机会主义观点，否认当前形势下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这篇文章的编辑们问道：“第三世界国家是否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呢？”围绕着这一问题，他们施展了错综复杂的欺骗阴谋。列举一系列事实，把成功的革命和夭折的革命、一般的民主运动，甚至值得怀疑的反帝内容的行动混为一谈，以便断言所谓第三世界的这些胜利“代表着改变(!)世界革命进程的**巨大动力**”。从这种推测出发，企图解释这一力量是怎么出现的。在解释中，单单删去了当今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工人阶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使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深入化，并程度不小地决定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他们不把这一运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而看作自发发展和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的孤立产物。

究竟什么是第三世界？按新修正主义的观点，第三世界就是掌握国家领导权、指挥所谓的反帝斗争的落

后国家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它们的附属物。他们无论怎样宣扬所谓发展中的国家和人民，其目的决不是宣扬受这些统治阶级残酷压榨的人民斗争，而是宣扬与国际金融资本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资产阶级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制度遭到沉重的打击，其陈旧形式崩溃了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宣告独立，组成民族国家。但这一地区又怎样呢？原来其大部分国家的政权落在本国反动派、庄园主和资产阶级的手中，正如一百五十多年前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一样。帝国主义感觉到无产阶级在战后取得的、严重影响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胜利的冲击，在各种情况下，与黑暗势力协商搞民族独立，以便消除革命压力。它千方百计地施谋用计，来避免革命，尤其是最彻底的社会力量所领导的革命。这样取得的独立并没有取消帝国主义的剥削，也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很多地方压迫的枷锁比以前更重了——双重的枷锁，外国的和本国统治阶级用铁与火来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原文有误，实际是在1920年7月召开的——译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因此，他建议把这些运动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资产阶级的运动做出明确的区分。

如果不犯严重错误的话，是不能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求独立的资产阶级运动与这些国家人民群众的真正反帝革命运动混同起来。一个是要与压迫者达成协议；另一个则是要与旧制度彻底决裂。把两种运动纳入同一种类型，显然是荒谬的。说这些国家的反动势力（即“第三世界”，事实上基本是由它们组成的）是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更是荒谬绝伦。伊朗国王、沙特阿拉伯国王、摩洛哥国王、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尼日利亚、扎伊尔领导人和拉丁美洲军事独裁者，他们与真正的反帝斗争有什么关系？

上述文章的作者企图伪造客观，断言，在这些国家中“有革命力量，进步力量和各种类型的中间派，也有少数反动派，甚至还有少数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是，他们隐瞒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哪一派占统治地位。在大多数场合下，恰恰是少数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占统治地位。新修正主义者为此种统治辩护说，只要有阶级存在，它就是这样。但是这种事实并不影响所谓第三世界“作为反帝反霸斗争主力军”的作用。

这是纯粹足欺人之谈。反帝斗争的主力军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首的、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民主反帝革命运动的国际无产阶级。这才是世界反帝斗争唯一真正的彻底的运动。只有这支正确指导下的力量，才能完成对付和打败金融资本的权威及其战争和统治世界的计划的历史使命。帝国主义的这种失败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大国列强反对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反革命堡垒和支柱——落后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垮台。

主力军的理论从根本上隐瞒了革命和当代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假使落后国家主要战斗力是人民阶层组成的，那么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每个不发达国家，反帝斗争的领导权应落在最终要消灭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肩上。应该强调，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在谈论无产阶级时，只局限在帝国主义国家，好象被压迫国家没有工人阶级似的。诚然，事实上，当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代表着一支庞大而富有战斗力的队伍。在巴西如果我们连他们的家属一起考虑的话，那就会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智利的居民中则占大多数；在阿根廷、墨西哥，一般说来在拉丁美洲，其数目是可观的。同样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突尼斯、埃及，总而言之，在整个老的殖民地、附属国世界亦是如此。这些无产阶级已经成立了或正在筹建自己的共产党。它们具有斗争的重要经验，开展工会运动，靠拢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阶层，主张搞真正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新修正主义者掩盖无产阶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甚至更落后阶层的领导。他们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即使取得过胜利、打击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然而没有条件成为领导力量。“由于苏联统治集团的背叛，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一般地说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人革命运动暂时不得不处于重整队伍和积蓄力量的阶段”，说“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越是积极地发挥反帝反霸主力军的作用，他们对发达国家工人运动的支持和推动，就越加显得重要”。这是反革命的论据。

暂时的失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个作用是历史的必然性。在不同场合下背叛社会主义和革命的人，就是要把作为革命斗争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置于斗争之外。但是他们总是一错再错。无论工人阶级遭到多么沉重的打击，它还是找到了保持先锋队立场和完成其使命的方式。比如，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就是这样，不久以后，就重建了共产国际，敲响了第二国际领导人背叛计划的丧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背信弃义之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亦是如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并没有被砍倒。无产阶级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先锋队的位置。这是因为它当代最杰出的革命力量，最重要的是，它是不可取代的革命领导者，它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现在新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指出的任务是“很好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斗争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全力支持和援助各国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毫无疑问，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结合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是现时的要求。但是，无产阶级要一面学习一面与自己的敌人斗，以反对国际上共同敌人的实际行动支持各国人民。在任事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准备世界革命、引导和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这一基本任务”

新修正主义者们在混淆无产阶级领导权与“组成什么指挥别人的中心”，以便“对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发号施令”时，表现得无知或具有歹心。资产阶级的顶礼膜拜无耻到了极点！人们都晓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施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正确执行，在于它的先进的行动，在于加强和发展工农联盟、把广泛的人民阶层团结在进步革命的旗帜下的一贯努力。共产党的存在和壮大都是重要的。在适当的时候，不排除建立类似第三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先锋队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不是向各国人民“发号施令”——这是一种诽谤，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引导和协调各国的革命行动以便取得社会主义胜利。

拥护资产阶级领导的三个世界的文章作者们说，已经获得独立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将成为“较长的历史时期中的反帝斗争的主力军”。这就表明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这些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种“漫长的历史时期”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他们在上述文章所宣扬的正是资产阶级的要求、是赤裸裸的改良主义。它一开头就宣扬了帝国主义已消失的观念。他们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要掠夺剥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取代别人，只要把其生存来源剥夺并消灭掉就可以了。他们说：“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已经动摇了并且最后摧毁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这个理论出现于五十年代初，当时一些右派分子想把一种思想强加于人，即帝国主义只要没有战争就不能生存，所以进行争取和平和旨在避免战争爆发的努力，就可以消灭帝国主义了。这种理论曾遭到斯大林的批驳。显而易见，帝国主义体系不是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或者通过“剥夺”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幻想就可以被摧毁的。列宁曾经说过：“在经济和国际上的所有关系中，金融资本是如此强大、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以致能够使政治上得到彻底独立的国家屈服，实际上已经屈服。”、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要有压迫和被压迫国家、强国和弱国、剥削国家和被剥削国家。要推翻帝国主义必须要进行革命。但是，新修正主义者向“第三世界”国家指出的不是要进行革命，而是“保障其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活动”的斗争。在改良主义的幻想中，他们甚至宣称：

“第三世界争取同第二世界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仍将是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斗争”。好象不用消灭“第二世界”的帝国主义，在漫长历程中与它建立跟金融资本的垄断本质格格不入的平等互利关系是可能的。

改良主义也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一个武器。今天顺便可以提一下，只要看一看西德与社会民主党国际携手并肩，只要注意到在美国的允许下，大规模进行加强落后国家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发展工作，尤其是在革命斗争规模最大的国家就够了。它们的代表人物同被压迫国家人民民主行动的杰出的领袖们接触，即使他们采取激进立场，但终究是要被拉到改良主义一方的。打着同样的旗号，他们干涉出现革命危机的国家，企图为政治天平上改良主义的一方加法码。帝国主义在反人民的斗争中，企图把最残酷的镇压同有利于不改良反动政权本质的骗人把戏结合起来。它就这样来反对成熟起来的革命，竭力阻挠无产阶级获得政治方向，在解放斗争中夺取领导权。

×××

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在该文章的某些部分中所阐明的思想，为其政治思想方针——机会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方针下了很好的定义。他们不揭露未来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相反地宣传沙文主义，宣扬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要同自己的刽子手一起，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不主张工人阶级领导，反而主张资产阶级领导；不主张革命斗争，反而主张改良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摆出来的问题，他们的观点证明，他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多么远，向新老机会主义观点靠得多么近。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帮助无产阶级的敌人，为使劳动群众迷失方向、偏离革命道路而效劳。但是，这种思想是不会得逞的，会遭到历史的谴责，遭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过去的谴责，遭到社会斗争不可避免的高潮的谴责，尽管这一斗争会遭到暂时的后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战胜的，革命终将在各地取得胜利。

和赫鲁晓夫之流的手段一模一样

巴西共产党致恩维尔·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工人阶级报》（一九七八年七月）

亲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亲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民用和军事援助，停止一系列重要工程的建设、召回在阿工作的全体中国专家的敌视性的、单方面的和蛮横的行为，在巴西共产主义者当中，而且无疑在巴西全体劳动者当中引起了极大愤慨。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怀着革命的忧虑注视着中国领导人对启视真正捍卫社会主义和革命力量采取的行动，注视着他们对致力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派的马列主义者所采取的强加于人的蛮横态度。与此同时，他们同铁托式的机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拥抱，热烈地、象接待老朋友一样接待甚至遭到本国人民唾弃的尼克松式的人物。现在，他们的丑行已达高峰，在经济上打击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由于她坚定的原则性、斗争性和革命的光明磊落而受到钦佩和尊重的社会主义国家，企图破坏她的经济和国防。这是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无理攻击，从这种反革命的内容来说，也是针对争取自己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各国人民的。

中国领导人这样的行为，只不过是重复了苏修曾经用来攻击阿尔巴尼亚和中国那样的令人痛恨的立场，苏修曾用同样的手段企图堵住中阿对他们背叛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嘴巴。这种事实，当时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及其集团多么严重地背弃了社会主义道路。难道这一切不也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现在的立场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何在？他们口头上自称是马列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而实际上他们按大国行事，要求受援者无条件服从他们的民族主义路线和政策。

事实胜于虚伪的说教。在中国中断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工程，不给军事物资的同时，中国飞机频繁地飞往扎伊尔，把军火武器带给扎伊尔人民的刽子手，帝国主义的走狗蒙博托。这个专制者迫不及待地接待了肩负着给他一切援助的中国教官和技术人员。令人痛心的是，全世界的反动派、法西斯、杀害革命者与爱国者的凶手、工人阶级的死敌现在都享有中国的慷慨援助，而这种援助却不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盖泽尔、魏地拉、皮诺切特，我们只举这三个典型的拉美人民的刽子手就行了，他们都受到中国政府的垂青。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夸奖他们，和他们进行实惠的贸易。很明显，中国领导人支持的对象和朋友不再是革命人民和忠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政府了。现今，他们的盟友是另外一些人。是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反动统治者，亚洲、欧洲的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垄断者。借口反对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和所有的压迫者、剥削者融为一体了。当它这样作的时候，它就厌弃它新朋友的敌人。

受压迫受掠夺的人民。但是，他们将象苏联人一样，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应有回答，劳动群众一贯严厉谴责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在处理同小国关系时大国意识会导致大老爷行为。老沙皇曾是这样干的，现在勃列日涅夫及其集团也是这样干的。美、英、德、法和日本帝国主义过去现在都是这样干的。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也是这样干的，而他们负责着智慧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利益及前途。中国领导人象赫鲁晓夫那样气势汹汹，想使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屈服。但他们完全想错了。阿尔巴尼亚人走着社会主义道路，一个勇敢的、真正的马列主义党领导着他们。这赋予他们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无限的信心。他们已战胜了最恶劣的境况。阿尔巴尼亚的疆域小，它捍卫的思想，它树立的榜样和坚持的事业使它变得巨大。它将充分调动自己的一切人力物力，将得到全世界一切受剥削、受压迫者的同情与支持，在新社会的建设中取得良好成就。

一修正主义的宿敌——巴西共产党人为同光荣的阿尔巴尼亚，无产阶级及其科学理论的无畏保卫者，为和经过考验的马列主义者、工人阶级反对垂死资本主义斗争的真正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站在一起感到幸福。在虚伪的朋友、反动派的盟友的罪恶攻击”企图破坏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巴西共产党人向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及其先锋党表示国际主义的声援。他们认为，这一立场反映着巴西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深情厚意，他们坚信，任何压力、讹诈或封锁都不能削弱一个决心建设自己未来的民族的意志。

机会主义者必将过去，革命必将继续。在阿尔巴尼亚和全世界共产主义必将最终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请接受我们最热烈的，兄弟般的致意。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同中国共产党分歧的历史概要

《工人阶级》（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已成为巴西共产党的传统。修正主义，这种老机会主义倾向不时在工人运动中出现。自从一九六二年二月重组以来，党没有停止过对国内外各种修正主义的斗争。

党的重组就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战火中进行的，五十年代后半期这种机会主义在党内居统治地位，并导

致党的分裂。十六年来，马列主义者揭露了为巴西资产阶级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和普列斯特斯集团的论点。

早在一九六三年，巴西共产党在题为《致赫鲁晓夫的公开信》的文件中，就划清了俄国革命的叛徒和马列主义间的界线。指明了苏共二十大主要结论的反革命性质。一九六八、六九年，揭露了苏联变成了企图统治世界的社会帝国主义超极大国。

从一九四八年起，巴西马列主义者对铁托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意识斗争。后来，普列斯特斯及其追从者在苏联修正主义者后边亦步亦趋，为铁托“平了反”，肯定了他对马列主义的所谓贡献。然而在六十年代初，巴西共产党重新采取了反对铁托主义的立场。铁托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铁托主义旨在破坏和消灭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

巴西共产党对古巴革命滑入修正主义泥坑也没有沉默。党全面地揭露了“游击中心主义”理论的内容，指出它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是与被证明了的列宁式革命行动不兼容的。后来，党指出卡斯特罗主义与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论点和政策沆瀣一气，后者在推行其霸权主义战略的各个方面有利于前者。

当前，巴西共产党对毛主义的三个世界的反革命理论、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道路进行着系统的斗争。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比较详细地阐明巴西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原则分歧。

这种反对修正主义立场的延续反映了巴西共产党自重组以来政治思想路线的一贯性，它基于马列主义的革命路线，而马列主义是唯一引导无产阶级获得全面真正解放的理论。

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由来已久

目前对毛主义的积极斗争在劳动者和党的朋友中间引起一系列疑问：和中共的分歧是早就有的还是现在产生的？如果早就有，具体表现在哪里？毛主义的荒谬论点对巴西共产党的路线有无影响？党怎样解释对毛泽东的赞颂？党为什么早先没有揭露毛泽东思想？即使是少数人提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应搞清楚的。此外，弄清这些问题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巴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列主义方向。

巴西共产党应在文件材料的基础上，广泛地表明自己过去和当前的政治行为。党勇于讲真话，勇于承认行动中的错误是会增强其团结并取得群众信任的。

与中共的分歧由来已久。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一九六三年两党重建关系时就有了分歧。是年年初的第一次会晤中，首次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在同我党代表团谈话中说，共产党内有三派：左、中、右。他以中国为例证明他的话。他说：“中共（当时）有党员一千七百万，五百万是右派，五百万左派，七百万居中。这没什么危险，因为左派与中间派联合起来就成为多数，右派就被削弱或孤立了。”由阿马索纳斯和林肯奥斯特同志组成的我党代表团回国后讲了毛泽东这种看法。中央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展开了辩论。大多数人赞成这种起源于统一战线思想的党内各种倾向和路线共存的论点。这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在辩论具体问题时，虽然允许在党的队伍中出现那种性质（三派）的分裂，但只能是暂时的，围绕着某个特定问题的；而不允许这种分裂持续，否则会损害党的团结。

一九六七年，中国人大肆散布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新阶段的观点。他们改变了毛的名字的写法，使之适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种提法得到某些马列党的赞同。巴西共中央认为应把这件事搞清楚。认为，尽管当时毛泽东思想受到我们马列主义者的崇敬，但不是工人阶级理论的一个新阶段。因此，在一个仅有一票反对的决议中，中央重申，巴西共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这就明显地限制了当时被称为是对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的创造性发展的毛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党中央的一个代表团一九六七年在北京听了一些中国领导人，如政治局委员康生关于毛对马列主义贡献的赘述。大概他们想拐弯抹角地说服我们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们说，毛泽东在确定辩证法时超过了马、恩、列、斯。他们说，马、恩、列认为辩证规律是三条，斯大林认为是四条，毛泽东做出天才的结论，认为只有一条——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代表团回国后，这种说法同样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认为，这种对毛的说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是不切实的夸张，毛所写的东西，最多是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辩证思想通俗化而不是关于哲学问题的创见。

我们也不同意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的呼吁书中的说法。他在那个公布于全世界的呼吁中说“由奴役和贩卖黑人兴盛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必将随着黑人的解放而灭亡。”后来，他又在同样内容的呼吁书中重申了这种观点。“说和重复”，问题就是如此斩钉截铁地表述出来的。我们党的领导表示了与此相反的意见。我们认为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尽管殖民主义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期，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伴随着垄断而形成，产生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它将来不是随着黑人或任何种族的解放，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被摧毁，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灭亡。

我们反对中国领导对罗马尼亚现在的党和政权的看法。人们公开说罗马尼亚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我党过去（和现在）认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以前是、现在仍然是修正主义党，那里的政权早就

不是社会主义的了。罗马尼亚是东欧第一个非常排场地接待当时美帝国主义的总代表尼克松的国家，想要得到尼克松的“保护”和财政“援助”。虽然罗出于民族主义立场，曾在某种程度上抵制过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但它从未放弃在重大问题上与后者的联合，它是经互会和华约的成员。

我们也向中国领导表示了我们对于他们对缅甸统治者态度所持的立场。这些统治者当时正残酷地打击武装的革命者、冷酷地屠杀缅甸共产党员和领导人。中国人支持两方面：朋友和敌人。他们向敌人提供信贷和现代化工厂的成套设备。我们那时认为，这样的支持是无法解释的。它体现着“实用主义”，是对反动势力的政治和物质支援。我们把意见告诉了周恩来，他认为我们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说革命成功后，上述工厂就会为人民造福。如果这样去推断巴西，那么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在那里的投资就是合理的，这将从政治上解除革命运动的武装。在这种罕见的推理法中，辩证法走向反面。不是革命的同盟者与为推翻压迫者而斗争的人们共同奋斗，从各方面去打击压迫者，而是他们应鼓励和支持掠夺者，因为这种鼓励和援助终将有利于受压迫者。

我们也不同意在一个国家内承认和支持一个以外的无产阶级党。每个国家仅只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基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不可分离的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的列宁主义原则。在一个国家内创建几个党会损害工人队伍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分裂和分散他们的力量。但是，中国领导不仅支持被他们统一称为列宁主义的各个党，而且还鼓动新党的出现，甚至包括叛徒组成的小集团。接待并支持宗派主义分子和曾可耻地投降了警察等方面的分子。

我们认为，中国不邀请外国人参加其党代会的决定是不对的，是民族主义的。中共“九大”之际毛里西奥·格拉波依斯同志正在中国。只是当他临走时才被通知说那些天举行了会议。诚然，马列主义党有的代表大会可以不邀请别人参加，但国际主义惯例是邀请兄弟党参加执政党的高级会议。中国人不但决定禁止这种参加，并且把它上升到理论，企图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其他党内。如果不是为了掩盖其虚弱和错误，这种没有根据的决定是无法解释的。在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的代表大会上，要展开辩论和就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采取立场。同时，大会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体现，它不但要向会议所在国的劳动人民作汇报，而且还要向全世界劳动人民汇报。

我们同中国领导在关于第三世界和中国置于这些国家集团之中的问题上的分歧，是早就产生的。我们一直不同意脱离这些国家阶级力量分析的这种笼统划分，我们更不同意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说法。在我党的所有文件中，当涉及到中国人用的这种划分时，我们一贯写着一“被称为”、“所谓的”、“假定的”第三世界，以表明我们的分歧。

我们反对中国邀请尼克松正式访华。为了解释邀请，据称，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去的。但是中国人背叛了以前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也是打着白旗接待他的。事实是，这次访问是中国方向的转折点，它向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美国靠拢了。早先，毛泽东就令人不能接受地向一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表示，希望他同白宫探讨这个会晤的可能性。巴西共产党认为，对于当时双手沾满捍卫祖国独立和统一的越南人民鲜血的、美国垄断者最猖狂的、嗜血成性的代理人之一的邀请是不适时的，尼克松被赶下台后，为了突出这种友谊，维持与他达成的协议，中国政府邀请他再次访华。访问期间给予他不寻常的款待，毛也露面了。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版的《工人阶级》再次发表了对这个帝国主义倒霉的仆人的看法：“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尼克松不再是美国总统了。”“……他的身份已暴露无遗：堕落者、营私舞弊的、弄虚作假的家伙，偷税家、头号骗子。他还是杀人犯和战犯。百万人民一眼就能看到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的道德面貌”。“这个狡诈的政客绕治了美国六年。”

我们还抨击了中国对屠杀智利人民的刽子手，皮诺切特政府的行为。尽管中国领导人说这仅仅是国家方面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支持独裁，但这二者是难以分开的。事实上，中国代表们鉴于智利积极的方面——反对苏联，属于第三世界，就支持智利武装力量的屠杀和暴虐政权。美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对手，拉丁美洲人民从不同意这种支持。在《工人阶级》一九七三年十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说：“站在智利人民一边的巴西人民最强烈地谴责美国走狗发动的不但伤害了智利而且伤害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军事政变，并谴责巴西法西斯将军对它的支持。抗议大肆屠杀爱国民主人士。反对对政治避难者的无耻迫害。”还说：“皮诺切特、利玻尼亚之流按照华盛顿的计划，扮演了金融资本反对本国人民的不光彩的宪兵作用。自从中国人开始谈论归功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起，巴西共就采取了反对这个后来毛在世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战略的机会主义倾向的鲜明立场。中共全面背叛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中国修正主义开始完全形成了。

我们特别谴责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巴西内部问题的立场。巴西共决定公开反对与联邦德国签订的、损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核协定后，中国人数次、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赞同该协定，赞颂它的签订者。由美国筹划的、对于种族主义的南非占有重要意义的南大西洋公约，中国人也是这样干的。

我们向中国人表示了我们不同意他们同巴西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外交关系刚正式建立，我们就向各党、各组织发出了通告，表示不赞成。我们说：“中国政府把中巴外交关系的建立置于非常‘广阔’的政治画面

上。中国的公报说，这不仅是国家关系，而且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似乎独裁政权也代表着巴西人民）。中国同志赞扬独裁政府，赋予它本身不具备的反帝、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中国领导人声明（在正式承认时）：‘中国欣赏巴西在国际会议上的立场。赞赏巴西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捍卫领海的斗争，等等’。还说：‘中国和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应在反帝、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这种欣赏与我党的见解是不兼容的。法西斯军人独裁本质是反民族、反人民、效劳于美帝、外国资本和本国反动派的政权。我们认为以下提法也是不对的：‘做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巴西，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霸权主义和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的共同任务。’毫无疑问——我们强调说——法西斯军人们的巴西并不面临这样的任务，而是相反的任务。”在这个通告中，我们强调，在独裁政权以前的时期，我党在自己政治行动纲领中主张巴西同所有民主国家特别是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在法西斯军人制度下，我们认为建立这种关系是不适时的，特别是建立的方式。

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我们同中国领导的分歧就不赘述了。我们同他们的原则分歧是早就存在的，并不是在毛泽东死后或华国锋、邓小平等铁杆机会主义者登上中国党和国家的关键位置后才产生的。

在上述问题上，巴西共采取了谨慎的，关起门来或领导对领导讨论的态度。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则通过在《工人阶级》上发表的文章和文件采取了公开的立场。一九七〇年四月，我们发表了阿马索纳斯和格拉波依斯同志撰写的《列宁主义思想的现实性》，文章的目的是反对中国人用毛泽东思想取代列宁主义的企图。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说：“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缅怀这位远见卓识的革命思想家，强调他著作的伟大和他理论的现实意义。”我们就是这样回答了中共“九大”通过的关于对我们时代下的定义，这是关系到工人阶级制定战略的非常重大的事情。（中共“十大”明确说明这个结论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人们都知道，中共“九大”把关于当今时代的列宁主义结论置之在一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做了脱离任何科学根据的新划分。这个划分旨在维持广为传播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在上面的文章里我们写道：“我们处在新的时代，今天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论证了人民在这个人类历史阶段斗争的主要问题。”我们强调说：“尽管人类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但出现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加剧了，革命获得了新的规模。要根据马列主义说明这些现象，要解决革命问题就要正确认识各地目前的实际状况，忠于革命原则。机械地运用别国人民的经验不会取得革命胜利。”我们想用这篇文章从政治思想上武装党，不使党被毛主义的荒谬论点所干扰。后来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未做任何自我批评，说当今时代仍是列宁讲的时代。从而从表面上改正了“九大”的错误。

一九七一年一月，我们发表了《虚伪的解决》的文章，当时，中国象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开始说秘鲁将军们在建设独立的国家，他们的立场是彻底反帝的。改良主义得势了。他们还大肆赞颂智利的阿连德和玻利维亚的托雷斯。中国人象苏联人一样竭力逢迎拉美军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说：“许诺改革的秘鲁和其他国家的将军们，口头上自称反帝、捍卫民族主权、执行进步政策；实际上继续联合美国保护国内反动派的利益。”并说：“修正主义分子的改良政策和无保留地支持所谓民族主义将军们就是放弃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斗争。采取这种立场的人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服从于‘民族主义’的军人们。他们希望后者逐步解决国内的严重问题。他们抛弃了革命思想，变成将军和资产阶级政客们的合作者和助手。”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百海里和蛊惑》一文问世。在文章中，我们公开回答了中国关于那些采纳二百海里领海提法的反动和卖国政府的反帝性质的论点。我们说：“巴西军人把领海权延伸到二百海里的目的逐渐地越来越明显了。那些这样提出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实施无耻、公开的卖国政策的将军们怎么会海上捍卫巴西的利益？他们连陆地上的财富都不保护，怎么能去保护海上的？因此，巴西军人的立场不过是明显的蛊惑宣传，不过是企图掩盖他们对我国人民利益的真正背叛。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们写了《门面上的反帝》一文又回到同样的题目上。随着梅迪西关于二百海里的指令，巴西将军们以民族主义的面貌出现了。我们写道：“在这些蛊惑立场面前国内外（外，是我们在此暗指中国）某些政治阶层认为，这些立场具有反帝性质，表现了对美国垄断者的抵制。要人们认识法西斯军政府的这种立场会孤立人类最残暴的敌人。”我们说：“这是非常错误的见解，它对巴西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危害极大。”还说：“认为梅迪西及其同伙的措施是反帝的，是可怜的错误，把假反帝看成真反帝。”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还驳斥了中国人借以解释所谓三个世界和人民与本国反动派联合的论据。关于国内和世界反帝阵线，我们指出：“应极明确地确定真反帝还是假反帝，真反修还是假反修。”我们还说：“把出于自身利益而与美国垄断资本家密切联系的反动势力视为盟友，对其假反帝立场抱有幻想是荒唐的。真正的反帝就是坚决反对外国统治，揭露美国资本的渗透和阴谋，强烈谴责华盛顿的战争政策，动摇帝国主义的压迫枷锁，同争取人民自由和切身要求的民主运动合为一体。”我们接着说：“反帝阵线……应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靠山……瞬息中止对美帝统治的基本支持者——反动派的斗争都是没有意义的。一切削弱这个斗争和掩盖独裁反民族反人民的言行都是有害的，都应遭到有力的抨击。”

一九七三年六月,我们发表了《关于反帝斗争》,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同中国人的争论又进了一步。我们对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修正主义论点提出异议,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三个世界理论。我们写道:“现在散布着一种思想,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衰弱的帝国主义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因而它的地盘小了,剥削少了。人民正在逐步通过和平方式摆脱外国统治和建立自由独立的新生活。有人举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例子借以证明资产阶级甚至庄园主能够从始至终地领导民族解放运动。有人说,在这种力量(地主、资产阶级)领导下,联合在一个独立集团中的弱国将得到充分发展,将坚决反对垄断列强。根据这种推理,社会制度的不同、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统统消失了。”我们强调指出:“把真正的民主反帝运动同依附的、半殖民地国家政府由于出自某些与垄断资本家不同立场而采取的政策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在某些问题上可以等同,但不是法则。如果认为这是个法则,就会放弃革命思想,统一阵线广泛到包括极反动的势力就失去本身特点的地步。”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还驳斥了中国人关于革命道路、革命领导力量和反帝斗争前途的谬论。我们说:“某些流派关于反帝运动的第三种前途的立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荒唐的。”“反帝运动的真正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

一九七六年二月,在《捍卫南大西洋的诱饵》一文中,我们间接地指责了中国领导把“南大西洋条约”当作积极的东西加以鼓励的行为。我们指出:“巴西民族不应参与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侵略计划。苏美是反对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强盗战争的制造者,它们的策略不同,但战略目标都是一个——主宰世界。区别它们谁更危险,更富有掠夺性是困难的。它们的凶残、野心勃勃和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半斤八两,不差上下的。联合正是对我们掠夺最大的那一个去打击另一个,是一场灾难。巴西没有理由加入这个性质特别反动的同盟和参与损害民族主权,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沉重负担的流血冒险。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民流血仅仅是为了便帝国主义之间的一个达到霸权和掠夺目的。因此,人民应该用革命对付战争。”

人们看到,中国现领导背信弃义,公然藐视拉丁美洲马列主义政党,把拉美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联合声明中包括的,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是完全错误的论点说成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加进去的。正如在以上文章所见到的,自一九七六年二月以来,巴西共就用这种表达方式强调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必要性。

一九七七年以来,我们在《工人阶级》上发表了一系列广为传播的揭露中国修正主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我加深了对中共反革命战略——三个世界理论的真正含义和“中共同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及世界反动派结盟政策的基础的了解。

虚伪与含糊

巴西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特别是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间,有许多积极的方面,是有益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对修正主义的大辩论以及中国党在六十年代末所持的一些政治见解帮助了我党。我们在巴西广泛传播了中国那时的材料。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领导的一些奇怪行为和言论的含糊、虚伪。他们说赞成拉美马列主义党之间的友好关系,但却在暗中使劲,制止这些党在智利出版一个宣传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经验的大陆性杂志。他们正式表示支持我党,在同我党中央代表团接触中,表现得很友好。但在背地里企图在巴西建立另一个党,把“人民行动”变成我党的竞争组织。我党反对这种企图,同中国人宣传的“完全新型的党”的论点进行了严肃的斗争。这样,我们帮助“人民行动”朝着马列主义和加入巴西共的方向发展。恰恰是中国人企图在我国建立所谓马列主义第三阶段毛主义的党所依据的论点成了“人民行动”队伍分裂的原因。因为“人民行动”的某些领导人说:“巴西共产党虽然是马列主义党,但不是‘完全新型的党’”。中国领导还选择了名为“红色派”的宗派主义分子,这是一个被我党开除的冒险分子组成的集团,中国人帮助、鼓动他们。但是其目的没得逞,巴西共的斗争挫败了反党企图。

中国人反复说支持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但是在持续几乎三年的阿拉瓜亚游击抵抗斗争中,无论是北京电台还是中国报纸没有对这个引起全世界深刻同情的斗争予以政治声援。

他们庄严声称,在同马列主义组织的关系中反对老子党和儿子党。但在实践中,他们的行为是:他们不同意多党会议或区域性会议,干涉阻止这类会议的召开。反对这些党的国际会晤和联合声明,因为他们想当老子党,要世界共产党家庭无条件地遵循其路线。

他们之所以害怕这类会议是因为,在这些会议中会出现反对他们路线的意见。他们这样干就背离了真正的革命方向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神圣原则。

直到最近,一九七六年底,中国领导向我们通报他们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分歧时说,他们愿意通过党的渠道,在高级讨论中解决这些分歧。但是,他们在几年中一直拒绝阿尔巴尼亚同志一再提出的派遣高级代表团前往中国讨论解决这些分歧的建议。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前后不一致的态度。中国领导说不停止同苏联的争论。毛泽东甚至说要争论一万年……。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担任了苏共领导后,中国人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把争论中止了很长一段时间。

几年以来中国把同苏联的争论仅限于国家对外政策方面。没有在真正能弄清修正主义的背叛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的范围内争论。

同样，我们认为中国领导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行为也是不能令人理解的。他们不回击流行于世界各地的错误的、机会主义的和反革命的思想。除了六十年代初的文章外，他们对欧洲修正主义者，对铁托主义、对游击中心主义等再没说过什么话。他们让别人说着捍卫中国的话，他们自己却沉默着。他们连我们《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信》也未予以发表，在信中我们正义地捍卫了人民中国。看来，中国还想招徕属于“第三世界”的古巴……。正是为了彻底批判这种立场，我们在“列宁思想的现实性”中写道：“列宁任何时候都没有同马克思主义的阉割者或假革命理论家妥协。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到考茨基以及十月革命头几年左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者统统遭到列宁的激烈抨击。列宁把思想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形式之一的高度。他对流行于工人运动中的，无论是俄国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任何错误论点和见解都予以回击。列宁认为，与无产阶级利益抵触的观点，如不予反驳，任其流传，即使范围很小，也会带来危害，成为很大的障碍。”

中国领导的含糊和虚伪在一九七六年底，阿马索纳斯同志率领的一个中央代表团在中国逗留期间再次暴露了出来。他们谈论着亲切的关系和对兄弟党意见的尊重，赞扬巴西共产党。但是，我代表团在华期间，他们对我不断施加巨大压力，要我支持他们反对称为“四人帮”的斗争支持新上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华国锋。我们说我不愿介入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更何况这次变换领导是在激烈的内部斗争中进行的。不深入了解这次斗争的原因和事实真相，我们的任何支持都将是没有道理的，纯属尾巴主义。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对其最高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的攻击使我们感到诧异。为什么要攻击他们？难道他们的革命立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实在的吗？中国领导除了攻击阿劳，还把他们的仇视集中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拉丁美洲马列主义政党的联合声明上。他们把这份清楚而正确的文件看成是对中共路线的攻击，企图强迫我们放弃这个声明，我们驳斥了这个要求并重申我赞成该文件，保持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友谊以及我们同中共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意愿。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见中，我们系统地阐述了同中国在一系列的政治、理论方面的分歧，但未得到答复。看到我们保持坚定的原则立场，中国人，特别是政治局委员耿飚对阿劳和我党进行放肆的辱骂。我代表团庄严地予以回击。

中国修正主义就在毛的著作里

中国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仅仅是目前中国领导人的创造。以华国锋和邓小平为首的现领导人，都是铁杆的右派，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把自己前任们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发展到了顶点。他们以令人不能相信的速度丢掉了假面具，在他们领导之下，中国完全抛弃了革命理想。这是外国资本争夺的场所，它企图求助于外资使自己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

中国修正主义就存在于毛泽东的著作里边，就在周恩来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活动中。

这种修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只是最近才引起我们的注意。目前，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更加深刻地研究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领导这场革命的力量等等的特点。以对众多事实的分析和毛主义思想的检验为基础，已经得出了一种总的看法，一种建筑在马列主义基础之上的看法。

毛泽东的著作是折衷主义的，当然不是马列主义的。如果说其中存在着一些正确的看法或近似正确的看法，那么还有，而且大量的的是反映其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错误判断。而恰恰这些观念是他的思想的基础。不能否认，毛泽东曾经是一个杰出的革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致力于对世界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革命家，而是一个从根本上说，代表中国农民阶级革命愿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竭力在思想和行动上，把党所依据的观念和他所培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上的杂烩，由于革命在第一阶段中的土地、反帝、民族和民主的性质，而没有被大部分人所察觉。第一阶段过去之后，这种混乱开始趋于明显化。如果说在毛的著作里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在实践中却不懂得这个必要性，也不懂得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他的国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线条。由他创立的“人民民主”，或者“新民主主义”，形式上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类型的国家。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国家的雏形”，在中国，应当“作为各个民主阶级的一种联合政权将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如果说在中国革命之后，国家曾采取经济社会化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某些措施，一切都标明中国的国家没有超越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界限，而且无产阶级既没有直接地，也没有通过党来行使阶级的专政。

毛泽东为使中国革命推向前进而开辟的道路，不会通向社会主义，而只能通向资本主义。谁要是读一读他写的作为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基础的《论十大关系》，就会明白地看到这个实质。

关于新中国的建设道路的十种关系中的每一种关系，都要事先说明不同于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方针，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虽然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形式不同，并采取与自己民族特点和生产力水平有关的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但国家和建设的实质只能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及社会主义

的、无产阶级的、在一切方面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不能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多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剥削者的民主的共处，不能存在共产党受资产阶级党或小资产阶级党的监督，就象最近变表的“十大关系”所说的那样。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在别的文章里去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仅仅想对中国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点参考看法，以便表明我们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和混乱以及它当前的行径的。

很难看出全部错误

巴西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毛主义的党，或“中国路线”的党。当它一九六二年二月重组时，它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接触。我们从未象中国领导所鼓吹的那样，说毛泽东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我们批驳这种思想已有十多年了，具体地说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的。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没有接受中共或毛泽东的不正确的意见。在巴西共产党的文件中，和中国的思想比较接近的是《人民战争——巴西武装斗争的道路》这个文件。在这个文件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总结了中国军事经验的毛的著作为基础制定这个文件的。但是这一条道路和那一条道路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在城市问题上（在巴西有巨大的重要性，在中国在过去却没有这种重要性）；在领导权的问题上（在巴西是城市领导农村，不象与此相反的中国）；在如何进行革命上（城市斗争和农村斗争相结合，而不是农村包围城市）等等。

列举同这个党的分歧，以及发表驳斥这个党的观点的文章，表明了巴西共产党曾经是警惕的，没有接受由此而来的错误观念。

如果说我们曾避免把中共和毛的错误思想机械地搬到我党的路线中来是正确的，在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保持独立是正确的话，在对于毛泽东和中共，我们所采取的公开立场问题上却不能这么说。我们曾多次称颂毛泽东及他的党，我们曾说过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中共是一个革命的、马列主义的党。我们也曾称赞过文化革命，它一方面反对了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敌人，另一方面，它破坏了党的组织，散布了错误看法，引起宗派偏差，后来当修正主义分子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时候，这些便成了欺骗群众的蛊惑人心的论据。而且在毛泽东死了之后，《工人阶级报》出了一期专刊，充满了过分赞扬的文章。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呢？难道我们没有看出毛和中共有无数不能让人接受的思想吗？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反对它的错误看法，另一方面却称赞其制造者呢？

毫无疑问，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我们的作法是矛盾的。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一系列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我们曾经看到了毛和中共的某些错误，但我们看到的这些错误是部分的、孤立的，没有内在联系。我们曾认为这是总路线上的偏差，可以在短时间或在不长不短的时间内纠正的。中国方针的反反复复曾助长了我们的这种看法，例如他们多次断言中国永远不改变咱己的颜色，他们反对走资派，党是领导力量等等。只是在一九七七年，我们才对他的原则性错误及其制定的三个世界理论的修正主义方针的意思。有了一个较好的更深刻的了解。

看待错误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复杂的。苏联背叛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感到有必要突出毛泽东和中共的作用。我们认为，客观上，中国站在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这个运动的领导地位就落到了中共和毛的身上。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最先进最强大的堡垒。（在一定时期内）所有的敌人都反对它，特别是修正主义的苏联和美国。

文化革命，被说成是众反对社会主义敌人的革命运动，表现得很伟大，是社会的变革者。虽然我们对这个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还是相信它作为加强革命运动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手段还是有益的。从那里传出的口号，如“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小的可以蔑视和打倒次的”、“必须进行革命”等，都曾巨大影响，鼓励群众的斗争活动。

除此之外，从文化革命开始，对毛泽东颂扬的大合唱增加了，把他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大家都这样讲，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被中国宣传的浪涛所驱使，而没有更多的批判精神了。部分地讲，我们也相信是这样，而没有作出保留。

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末，看出中国领导的全面和原则性的错误是困难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和以后，我们很少了解中共的活动和方针。中国人习惯于把他们基本文件的大部分保持数年而不发表。直到今天尚没有写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他们闭塞地进行工作，实际上掩盖他们活动的具体实际情况，掩盖指导他们活动的思想发展情况。在文化革命中，他们不允许外国人，甚至也不让各马列主义党的领导人去中国研究正在发生的事件。没有发表过任何一个深刻分析这场斗争的文件，一切都概括在毛泽东的指示里面，而且这些指示，是根据不同情况、每个集团和每个时期的口味去进行解释的。它正确与否变得很混乱，难于作出估价。

这些事实就说明了我们与中共和毛泽东的相矛盾的态度，不管怎么说，是需要继续检查我们的态度，以

便吸取适当的教训，加深我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经历的经验的认识。

无产阶级的党是在自己的革命形成中前进的，而这种革命的形成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在揭露非马列主义思想和行动中、在分析所犯的错误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同中国的方针的斗争中，证明了巴西共产党政治思想的成熟性。它一定将继续作出努力，以便越来越多地、更好地学习工人阶级的伟大理论，使自己能够当之无愧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

第十二次中央全会政治决议：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和进行革命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现领导者所制定和推行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也是一股损害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违反革命和社会主义利益的潮流。

这种理论违反了阶级斗争的原则，提倡国际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与垄断资产阶级、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更危险的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这个抛弃和反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从反霸斗争的观点看是片面的，因为它削弱了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不可回避的斗争，使之降到第二位；而美国与苏联一样，也想称霸世界，即奴役人民，掠夺和统治其它国家。而且，这个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抛弃革命的任务，即抛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中心目标，因为他们的革命斗争恰恰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

（从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列宁的思想和行动的中心，是组织和进行革命，而不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只反对一个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就更糟糕了。反霸斗争尽管重要，然而它只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主要目标的一个补充部分。

列宁具体分析了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斯大林、毛泽东和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确认了这些社会矛盾：

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中劳动与资本，或者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矛盾；以及两种对立的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可见，无论是对现时代下定义还是对主要的社会矛盾进行具体分析，马列主义者都是从无产阶级观点和她的革命目标出发，都是以明确的阶级观点为准则。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与从非阶级观点出发的“三个世界”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后者认为“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这种提法否认了革命的任务，将反霸斗争摆在首位，提倡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与各类压迫者、剥削者，甚至包括美帝国主义实行无原则的联合，以进行仅仅反对苏联社会帝国的霸权主义的片面斗争。

这些矛盾是同等重要、相互联系的，它们组成一整套不可分割的行动路线，每一对矛盾的内在价值都不容缩小或忽略，否则，就会象“三个世界”的理论所主张的，把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归结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只限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这将严重危害为革命积蓄力量的任务的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反殖反帝的革命攻势广泛展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民族解放运动的烈焰迅速燃遍了亚、非、拉。

人民以这些历史性的胜利和斗争几乎完全摧毁了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体系，将帝国主义的“稳固后方”和后院变成了坚决反帝的战场。在这些斗争的直接影响下，帝国主义在其本国的统治动摇并削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更加尖锐起来。

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被消灭，亚、非、拉国家直至今天也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真正的自由。美帝国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经营者，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老手，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则咄咄逼人，急欲扩张。这两家是我们各国和人民最贪婪的剥削者和最凶恶的压迫者，是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所下的关于“美帝国主义处于守势，走下坡路”的别有用心的论断只是为了与美帝国主义联合，反对社会帝国主义，企图取代后者成为新的超级大国。

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老的殖民主义强国，尽管其经济、军事实力不能与超级大国相比，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失去或放弃了其固有的狂妄的侵略本性。他们的掠夺扩张野心，在亚、非、拉国家保持并建立势力范围的欲望仍然存在。

这些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就是“三个世界”理论的制造者和鼓吹者所说的“第二世界”，必然要进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式的竞争，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权益。同样，他们与我们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有矛盾，讨价还价，但在掠夺我们各国和人民、反对我们取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这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这些帝国主义利用其过去的走狗和新培养的代理人推行新殖民主义，输出资本，大量直接投资，签订“合营”合同，开发自然资源，开办他们自己的银行，发放贷款；他们干预我们的工会组织，分化工人运动，支持一些无条件地为他们效劳的工会官僚；他们还开办学堂；传播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有损于民族传统习惯的生活方式；出售价值百万、千万美元的武器，提供军事顾问并直接武装干涉他国内政，正如最近在扎伊尔所干

的那样。

这个“第二世界”以及支配和统治这个世界的垄断资产阶级，难道可以象“三个世界理论”所说的那样，成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老殖民主义残余、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以及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同盟者吗？除非是机会主义者，谁也不会接受这种违反马列主义、违反阶级斗争原则的观点。

同样被称作“第二世界”的、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指挥的东欧修正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苏修侵略扩张的帮凶、同谋或中间人，另一方面是统治其本国的亲苏资产阶级。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以便从参与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掠夺和剥削中捞取好处。这个资产阶级同西方和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一样反对我们的自由和独立，是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敌人。

对马列主义者来说，政治斗争无疑是主要的斗争，她统帅其他斗争。没有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不赶走帝国主义，不打败国内反动派，无产阶级和人民就不能改变敌人在各方面所造成的落后面貌和不合理现象，民族和人民就不能取得物质和文化上的进步。

因此，任何“理论”“路线”或“纲领”只要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或偈离革命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坚决的政治斗争，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反革命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在谈到已经宣布了政治独立的国家时宣称：“过去，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内进行”，而现在这些国家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经济问题成了“中心任务”、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环节”。

众所周知，在这些国家里，比如在我们这样一个独立了一百五十年的国家里，国家权力主要掌握在大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买办阶级手里。也就是说，那些大进出口商，与外国银行和经纪人密切合作的银行家和金融家，那些占有大片土地而又不耕耘土地、死抱住封建残余不放的大地主掌握着国家权力。这两个阶级一方面借帝国主义的巨大支持赖以生存，另一方面本身又是后者统治的基础和支柱。它们是最反动的阶级，是民族独立、自由和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因此，我们党的“总路线”指出：“这两个阶级是我们民族和人民的主要敌人，厄瓜多尔革命必须组织所有力量与它们斗争，直至把它们彻底消灭”。

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无论是文人掌权还是军人掌权，是“合法”政府还是事实上的政府，是“代议制”还是法西斯，是发展主义的还是改良主义的，都是封建—资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都代表这些阶级的利益，都行使它们反民族反人民，为外国主子效劳的政策。

由此可见，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心任务”是适应了反动阶级反动政府的需要，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未忽视这个任务，但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人民造福，他们残酷地剥削人民，使人民的生活日益艰难。

这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早就象斯大林指出的“扔掉了民族独立的旗帜”。因此，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和实行反帝的民族民主革命并将之引向社会主义，这是由他们与大地主阶级的联系和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所决定的。

在拉丁美洲，什么“争取进步联盟”，“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计划，什么象“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安第斯条约”之类的一体化条约、协定，以及最近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协定都是美帝国主义与本大陆反民族反人民的阶级和政府共同商定的。这些组织和条约的目的始终是“发展”资本主义，欺骗群众，利用这个反动政策作为遏制我们各国人民革命进程的武器。

主张“三个世界”划分的修正主义潮流撇开阶级斗争原则，错误地将所谓的“第三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它企图抹煞亚、非、拉国家中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力量以及这些阶级和政治力量的不同利益、不同目标之间的斗争；它有着抹煞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处心积虑地让资产阶级，甚至国王、皇帝、封建亲王掌握反帝反“霸”斗争的领导权。

这个“理论”在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片面地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它力图使压迫阶级、剥削阶级（我国一般称作寡头）及其政党——这些政党在美国或俄国帝国主义的支持掌握政权，同时又是这些帝国主义在我国实行统治的支柱——同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爱国者和真正的进步人士结成联盟，而后者在进行反帝民族民主革命和争取彻底的政治、经济独立、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的正是上述这些敌人。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股新修正主义潮流的一些观点：

首先，这个理论的制造者也把经济问题作为所谓“第三世界”斗争的中心，企图用这种提法转移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进行首要的、刻不容缓的革命的、政治斗争的注意力。更确切地说，他们企图以这个经济任务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与本国的反动阶级和政府撮合起来，而前者反对的正是这些反动政府，而且必须反到底，把它们推翻。

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在其混乱不堪的文章中说：“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多数还没有独立，有的处于半独立状态。”

我们来澄清一下这个问题。当时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早已取得了表面的、不完全的独立，这种状况持续到现在；尔后取得这种表面的、不完全独立的国家以及处在“半独立”状态的国家均属于附属国、新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众所周知和我们天天领教的是：帝国主义与反动阶级、反动政府相勾结，为所欲为。因此，在我们这些国家里，根本没有符合马列主义观点的独立。

他们在文章里接着说：“当时它们的斗争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首要形式是革命武装斗争”。这些话与前而我们节引并揭露过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言论没有区别。

依照上述观点，我们既然已取得了独立，也就意味着人民有了民主，因为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另外，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民族解放运动，革命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就根本用不着了，也无须存在了，或者变成了仅是文学和历史上所用的名词！那么，我们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干吗还要斗争呢？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吗？为了修正主义的改良吗？或许“三个世界论者”已把我们当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吧？

文章的另一部分说道：“第三世界已经独立了的国家运用自己的国家权力，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斗争手段和更广泛的斗争场所，在共同斗争中能够逐步加强合作，采取联合行动。”

但是，在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国家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呢？在前面讲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类似观点时，我们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再者，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在“共同斗争中的合作”当然是为了保护 and 扩大它们自己的利益，而绝不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以国家独立与主权之名行损害独立与主权之实，靠讹诈和讨价还价讨得一些施舍，由他们自己瓜分。通过这种“共同斗争中的合作”他们还试图说服帝国主义认识在发达的富国与走资本主义或改良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穷国间“平分财富”的必要性，认为这是避免“严重的不可预测的社会大动荡”的最“紧迫而可取”的办法。这些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反动观点具体表现在为争取“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的口号中。更有甚者，这个“理论”将反民族反人民的反动阶级和政党看作是“反帝斗争的主要力量”，轻视和贬低我们这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而他们是唯一的英勇顽强、始终如一的反帝战士。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位伟大同志的思想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那些盗用他的名义，厚颜无耻地用他们自己的修正主义黑货迷惑人民的家伙们的脸上！

文章接着说：“它们成立了许多地区性或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联合起来为保卫共同的权益而斗争”，“例如，拉美国家发起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其他。石油输出国维护石油权益的斗争以及其他原料生产国的斗争，使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遭到出乎意料的严重失败。”

关于上述意见，我们认为：

我国人民争取二百哩领海权的斗争是争取我国完整的，真正的主权的斗争的一部分。斗争的目的是不让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霸占我们的岛屿和领海，将之变成侵略我们和别国人民的军事基地，是保护那里的渔业资源和其他资源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造福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智利、厄瓜多尔、秘鲁三国共同签订的捍卫领海的协议首先是这三国人民的反帝觉悟和斗争的结果。这些国家的反动政府在很短一段时间里也以蛊惑人心的方式参加了我们各国人民在我们的海域内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海盗行径的重要斗争，由于它们同帝国主义有牵连并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之后，就向渔业垄断集团妥协，破坏人民的斗争，背叛民族的利益。

这些政府在“捍卫”二百哩领海主权时提出的最高要求只限于——至少在我国——向每艘船只收取数百美元，便允许它们任意地、不合理地掠夺海洋财富。根本没有禁止外国船只捕鱼，也从未没收过一艘海盗船，尽管这是人民长期以来的迫切要求。

帝国主义船只——一部分是得到了允许的，更多是海盗船——垄断了海上捕捞，给国内渔民造成困难和失业，因为这些渔民没有足够的经济技术手段与之竞争。帝国主义的渔船带走了优质的渔获，而同时厄瓜多尔人民却要付二十七个苏克雷换取一磅（半公斤）鱼，十九个苏克雷换一听一百八十四克的劣质金枪鱼罐头！（二十七个苏克雷相当于一美元。根据最近的官方材料，我国一九七三年的国民收入为平均每人七百八十美元。）这个平均收入掩盖了占我国人30%的土著居民的悲惨生活，据官方材料，他们的全年收入几乎不足一百三十美元。这就是那些反民族的政府所吹嘘的“它们”捍卫领海权的真实情况。而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却为之大肆捧场，处心积虑拉拢这些政府，为自己的实用主义政策争取盟友。

石油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地开采和利用，使之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而不是相反去压迫石油产地的人民，使之日益贫穷；更不应用于战争目的，毁灭人类本身。但那些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却在肮脏卑鄙的勾结下这样干了。

确实，“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所采取的禁运政策给帝国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撤销对以色列侵略者的支持，使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了暂时的缓和。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刻不容缓的正义要求和民族权利仍未实现，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很尖锐的。

而且，禁运也被资产阶级用来进行讹诈，以提高石油价格。他们因此捞了一大笔钱，并将这些钱投资到

工业上或变成欧美银行的股票。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人民可能得到一点点好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我国倒不如说使生活更加昂贵，使贫困普遍化。

我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我国人民中的先进阶层都反对卖国政府和阶级把领土租借给外国公司，主要是德士古—海湾石油公司。在一九七二年，当开始开采和销售石油时，我们提出“将石油无偿地收归国有”的有力口号。这个口号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他们今天仍然坚决支持它。只有修正主义者和垄断资本的走狗才反对这个口号。

厄瓜多尔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在与德士古合营的股份公司中拥有百分之六十五的股票，是由于人民的斗争和压力，因为海湾石油公司在离开厄瓜多尔之前以八千多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它的股份。这笔买卖从未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主张无偿的收归国有。

最近六年来，厄瓜多尔通过开采石油所得的收入超过了七十亿美元。这个数字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最高记录，它代表了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然而，我国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程度比一九七二年以前严重得多，人民的生活条件也比一九七二年以前糟糕了好几倍。统治阶级和“革命民族主义政府”“热情的第三世界派的”政府自己也承认，他们的“富裕年景”在过去。更严重的是这一年公布的财政赤字超过了五十亿苏克雷，欠外债十六亿美元（比国家全年预算还多），这实际把国家典当出去了。

我们在这里勿需就这些问题作更广泛的分析，倒不如抄录一些关于我国现实的十分有意义的论断：在最近召开的“七二—七七”五年总结会议上，厄瓜多尔中央银行总经理提出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结论是：“国家的收入没有造福于全体厄瓜多尔人”；“商报”在今年七月十一日的一篇社论中评论上述看法时指出：“这个结论是无可非议的，即‘国家的收入没有造福于全体厄瓜多尔人’。但应补充的是受惠者只是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继续被排斥在外，而同时却在谈什么进步与发展”。

厄瓜多尔军人撕下了“第三世界派”“反帝”的面具，他们通过了碳化氢法修正案，容许在有损民族主权的条件下一如扩大租借地域，免除捐赠甚至所得税——向石油垄断集团提供新的租借地，因而使情况更加恶化。而“三个世界理论”的炮制者们却要我们同这些军人联合。

这里，再一次彻底地暴露中国修正主义者称之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军”的那些人的本质和行径。中国修正主义者不仅极力争取这些人充当其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政策的同盟者，——这个政策抛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地位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为依据——而且要工人阶级、亚、非、拉被压迫被剥削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任务，跟随反民族反人民的阶级和政府推行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以便“为早日摆脱贫穷与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这些公然反对马列主义，反革命的提法和作法实际上是下述观点的发展，即：“发展中国家（包括人民中国）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这一段话以及它前面的一段话均摘自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暴发户代表——一九七四年四月在联合国原料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发言是“三个世界”新修正主义潮流的理论基础。

这股潮流主张无产阶级和人民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及其反动政府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就是要革命力量放松斗争，或放弃与国内敌人的斗争。被我党开除的派别集团也持与中国修正主义者同样的观点，他们现在已被绑在了本国修正主义的战车上。

认为不同时反对外部的帝国主义敌人和国内的敌人就能为革命积蓄力量，这是一个纯粹的谬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无条件的盟友。认为只同遥远的敌人斗争而不同时反对国内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就能积蓄革命力量，这是一个明知故犯的错误，因为国内敌人是人民看得见的甚至认得的，并且人民忍受着他们的欺压。而国际敌人在许多情况下是人民看不见的，因为他们正是通过其走狗和合作者国内敌人来进行压迫和统治的。

已经完成的反帝的民族民主革命和解放斗争证明，其发展和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无疑是对卖国投降的反民族反人民的国内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绝不放下反对这两个敌人的战旗，因为他们在实质上是一个敌人。

“三个世界”理论发明家们的又一个提法是，应该着重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据他们说，社会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是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因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正在走“下坡路”，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第一世界”的一部分，应该让它与“第二”“第三”世界联合，组成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广泛世界统一战线”。

按照这种胡说八道，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就要落入修正主义者手中，比如在拉丁美洲。而人民都知道，修正主义反对的不是帝国主义制度本身，而是企图以苏联帝国主义代替美帝国主义。让我们马列主义的政党放弃在人民反美斗争前线中的位置，变成无害的马列主义学者和宣传者，这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建议，是要我们放弃、背叛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神圣事业。我们断然拒绝这种企图和建议。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正在众目睽睽之下激烈争夺世界霸权，双方正肆无忌惮地进行罪恶的军备和战争竞赛，侵略、欺侮、掠夺别国人民，首先是亚、非、拉人民。如果世界人民不起来斗争，以革命制止它们，它们之间的激烈矛盾就会导致一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以掠夺、征服为内容的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与两个帝国主义斗争，根据它们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压迫的程度侧重打击其中某一个，这是现今一切革命者、爱国者及民主进步人士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最后，断言“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其他反动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是“反帝斗争主要力量”，就是要把反帝斗争的领导权交给这些民族独立、自由和革命的死敌手中，而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尽管反修斗争很重要，我们必须进行这种斗争，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也是如此，但它毕竟从属于组织和开展革命这个中心任务，并与之紧密连系在一起。

谁应掌握反帝斗争的领导权，革命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题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评论中指出：“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这些马列主义论断与中国现今修正主义领导所持观点的区别如同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区别。

从上述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分析中我们认为可以得出结论：当今世界矛盾最尖锐的表现是在亚、非、拉国家，而帝国主义锁链最薄弱的环节也仍然是在这些国家。因此我们认为，革命的主要注意力应放在这些地区，促使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尽快崩溃，无疑，这也将加快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军。

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基本矛盾，或者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决定我们时代性质的矛盾，同时也是社会上最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制定战略策略的基础。

这个矛盾贯穿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发达阶段这样一个漫长过程的始终。

无产阶级反对西欧、东欧、日本、加拿大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急风暴雨式的伟大斗争，不仅针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后果，针对日益加剧的剥削和压迫、限制自由、恶化人民的生活条件，而且在马列主义政党（这些政党正努力在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群众中消除修正主义叛徒路线的影响）的正确领导下，他们的斗争就是要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更加有力地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及其变种“欧洲共产主义”关于阶级合作、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等等的说教和作法，是马列主义兄弟党坚持执行的一次重要任务，同时他们也有责任——实际上他们也正履行着这一责任——去勇敢地揭露和反对那些放弃革命的说教，借口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要无产阶级与“第二世界”的垄断资本联合的说教，如同“三个世界理论”所提倡的那样。使无产阶级摆脱“欧洲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有害影响，使他们不受“三个世界”新修正主义潮流鼓吹者的欺骗，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最高表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而且只有到帝国主义已经消灭，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占据世界历史舞台时才会消失。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它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这就必然使世界分成两个明显的，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到奋斗目标都绝然不同的阵营。

显而易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必然地使之在全世界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正是这个体系的实际扩大。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罪恶背叛迫使这个阵营分裂，给革命进程带来了严重危害。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修正主义分子跑到了“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一边。社会主义体系完好无损，阿尔巴尼亚、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英勇光荣地屹立于世界之林。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战斗声援下，社会主义体系更加巩固和发展了。

因此，象“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那样，借口由于修正主义的背叛，作为反纳粹法西斯的胜利成果而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消失（谁也不会想到那个阵营还存在，也没有人要保它），就说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存在，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不顾活生生的事实真相的提法。我国分裂主义者所持观点如出一辙。他们说随着“他们的被开除，党也完了”！

正如我们已指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两者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所以这对矛盾不能通过合作、联合去解决，因为它并非象中国修正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是次要的矛盾。

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执政党的总路线和基本路线不是，也不可能是不同政治、经济、

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赫鲁晓夫式的阶级共处、阶级合作,更不应象“三个世界理论”所提倡的那样,以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为借口与“第一”“第二”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联合。这样做就是反对马列主义。

这些执政党的总路线、基本路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它的主要内容是: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与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进行顽强的斗争,以此作为在各个领域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措施;不断加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反动残余势力的阴谋破坏;在这个基础上,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将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紧密地团结在马列主义周围,培养他们以便向共产主义的宏伟的新阶段过渡。这是国内政策。

对外,这些国家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坚不可摧的堡垒。它们的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具体表现在对国际无产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决鼓励和毫无保留的支持,而后者的斗争对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完成自己作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旗手的使命也是一个巨大的援助。

“三个世界理论”处心积虑打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将中国变成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为此,他们粗暴地修正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以生产统帅政治,突出物质刺激,以向帝国主义国家要求贷款和“援助”来代耕自力更生的原则。他们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脑后,同时破坏无产阶级和人民为实现其首要目标——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或把这一斗争引入歧途。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将能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在不远的将来打倒修正主义篡权者,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只要还有一个国家里坚定而警觉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就继续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体系,而不管别人高兴还是不高兴。她将和弗·伊·列宁和他忠实亲密的战友约·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成为整个人类解放斗争的灯塔和光辉榜样,赢得所有为“埋葬资本主义”而斗争的战士的尊敬、爱戴和支援。

在资本主义世界,垄断财团之间疯狂竞争,目的是更多地占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占有自然资源和原料,夺取倾销它们工业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实质是争相加重对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主要的是反对革命;而绝不是象“三个世界理论”的卫士们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帮助落后国家的政治解放和经济发展。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所谓“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各国中,执政的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自然,这些资产阶级会同其帝国主义主子,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这个或那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过去的宗主国或现在的依附对象讨取残羹剩饭。但实质上,“第三世界”国家,即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阶级敌人内部的矛盾。主张三个世界理论的修正主义者把上述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说成是帝国主义制度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企图欺骗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

再者,在这个所谓的“第三世界”整体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存在引起争执和危机的根源,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会有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帝国主义国家激化,导致武装冲突,但是,归根结蒂,它们还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敌人内部的矛盾,而绝不是“三个世界”理论发明者所说的可以通过说服和讨论来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

因此,象“三个世界”修正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追随者所企图描述的那样,法国、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成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同盟者,美帝国主义已经突然放弃了侵略掠夺和敌视各国人民的本性而成为人民的盟友,以便打败争夺世界霸权的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这就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各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殊死斗争的存在,就是要无产阶级和人民为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充当炮灰。说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阶级必将成为这个理论创造者所希望建立的反霸、反社会帝国主义战线的主要力量,就是要亚、非、拉地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无产阶级在他们的死敌一统治各国的封建、资产阶级面前屈服,归根结蒂,就是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在革命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放弃革命的目标。

在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了一场对市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的疯狂争夺。每个超级大国都准备通过世界战争来解决它们的分歧。

毛泽东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生活证明了这个论点的正确,我们厄瓜多尔共产党人视之为自己的论点。

面对世界大战的危险,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为这种战争进行的准备,我们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必须加倍努力在自己国家里组织革命,加紧谴责企图使人类流血的战争计划,号召美国和苏联的工人阶级起来抵制本国资产阶级的军事工业,反对他们的战争企图,为在自己的国家里实现革命和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我们有责任组织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广泛战线。

这就是与苏修立场完全不同的马列主义立场。苏修自吹反对战争,空谈缓和,而实际上却进行多方准备,企图通过战争来解决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实现其扩张野心。“三个世界理论”怀着另一些企图,

但同样是虚伪的,这些企图是与革命和世界和平不相干的。这个理论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提出孤立作为“战争主要策源地”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组织一个世界统一阵线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个阵线包括“第一世界”的部分国家——美国,包括“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实质上,这个阵线只能驱使无产阶级和人民抛弃反对美帝、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这个阵线是要革命力量和世界人民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在本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以保卫祖国为借口,投入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对于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来说,现在提出政权问题,组织力量通过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培养国际主义精神,毫无保留地支持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支持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是最重要的任务。

列宁曾指出世界革命只能是各国革命的结果,生活现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派、马列主义政党以战斗的姿态承担起这项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首先需要在革命斗争中建设一个强大的马列主义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人民群众的组织者,革命的英勇善战的领导者,无限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支队;她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这是我们的观点,它与“三个世界理论”赋予党的作用是不同的,后者要党在“第二世界”中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在“第三世界”中成为对统治阶级(俯首听命的政治力量,而留给党的唯一任务是与修正主义斗争。这个斗争无疑是反对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长期任务和必要条件,但绝不是无产阶级存在的唯一和最后目的。

其次,要组织和进行革命就要建立一个革命统一战线,这个阵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进行领导,包括所有革命阶级和革命力量、所有民主人士和爱国者以及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我国的革命统一战线力图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别。

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三个世界理论”信徒们的立场也是不同的,他们主张建立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帝反霸战线,而不是革命战线,把这个战线的领导权交给第三世界的国王、亲王和独裁者。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和自己的主张相反,特别卖力地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和美国来作为盟友。

第三,要革命就要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便打败资产阶级军队、进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主张与“三个世界的理论”也不同,按照这个理论,人民军队的建立已是不需要的了,因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加强这些军队,正如这个理论的信徒所做的那样,借口保卫祖国,保卫遭受到社会帝国主义威胁的“民族独立”,号召自己的党员和无产阶级加入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军队,这种号召表明他们背叛了本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背叛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在国际范围内组织和进行革命意味着什么呢?

主要是锻造、巩固和发展**国际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为真正马列主义政党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团结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帮助在世界各国中建立世界革命的各个支队。

“国际共运(马列)”思想团结的基础只能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无限忠诚,以及在各国组织革命的决心、准备和行动。

政治上的团结必须是为制定世界革命统一的战略策略而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统一的战略策略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列)的总路线,她是对革命问题进行双边、多边以至所有的党讨论的结果。这条总路线应把国际主义的努力指向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指向马上就能获得突破的地方以便尽快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党,无论它多么伟大,无论它有多大的功劳,都无权将它自己的国际路线作为国际共运(马列)的总路线而强加于人,就象“三个世界理论”的发明者们所企图做的和苏联修党长期以来一直做的的那样。

实现组织上的团结是一切真正马列主义政党应着手执行的一项伟大任务,它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第一、二国际在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分子们篡权以前的丰富经验和第三国际对世界革命的特殊贡献都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规定,所有的党,无论大小,是有经验的还是年轻的,是执政党还是正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党,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各党之间的关系都是互相尊重的兄弟党关系,都应独立地解决各国的革命问题。

遵照这些原则办事意味着结束党与党之间关系的那些错误作法,如干涉其他党的内政,把党分成“老子党”和“儿子党”,以及承认在同一个国家里存在不止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以便再次使用赫鲁晓夫式的指挥棒,我们——以毛泽东、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马列主义者将与以上错误作法进行斗争。

我们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高度评价革命力量的团结,更为实现和发展这种团结而努力。我们力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因为今天这三者构成了世界革命的主要

潮流，是革命本身的力量。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人民每天的每一个具体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每一项成就都意味着世界革命进程的前进。而且，我们也力图以这些力量为核心，团结一切民主派，爱国者，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力量。我们努力同他们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促进世界革命与和平的广泛阵线。这个观点主要考虑到以下的原则和目标：反对帝国主义，首先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争取和平；反对人类的主要敌人——美国和苏联为重新划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世界革命的最高目标。

因此，这个战线既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反帝阵线：反对一个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以便由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取代美国的统治。也不是“三个世界”的修正主义理论的拥护者所主张的世界阵线：包括美国的垄断集团，西欧和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依附性的资产阶级和半封建阶层，以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基础，目的是反对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这是一种从卑鄙的实用主义观点出发的政策，它考虑的是其制定者本国的国家利益，其不可告人的企图：使自己成为超级大国，取代苏联修正主义者现在所扮演的角色。这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阵线，其策划者想借此阵线在重新瓜分世界中得到一份帝国主义的赃物。这种战线的内容和实践都是反对革命反对共产主义的。

我们的党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艰苦顽强的斗争中诞生、发展和经受过锻炼。我们党坚决与真正的马列主义兄弟党继续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一切反马列主义潮流——包括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进行共同的斗争。

国际无产阶级敬爱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恩维尔·霍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贡献，正是他们战士般地忠实于卡尔·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天才创始人的基本思想和教导的结果。

相反，中国修正主义现领导、“三个世界理论”的作者歪曲了马列主义，抹煞了它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革命性和战斗性，将她变成对阶级敌人无害的东西；他们要缩小反修斗争，转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继续地、勇敢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思想及其反革命实践的斗争。“三个世界的理论”绝不是马列主义的发展，它的实践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实践证明了它的作者倒是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的不朽事业，在同一国家中支持几个无条件忠于它的组织，企图迷惑和分化无产阶级政党，为它的机会主义说教寻找信徒。

保卫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全力谴责中国修正主义以单方面停止援助协定所施加于她的难以置信的侵害，是我们党应履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荣职责和权利。我们把这种侵害视为对我们党的侵害。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逝世是中国和国际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在此，我们党再一次向他表示敬意。

毛泽东同志在被问到什么是他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时回答说：

“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即毛泽东同志发展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理论，特别是发展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果；他反对党内右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他所进行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旨在揭露“走资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以及他一直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对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声援和支持，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马列主义者有责任把它们接过来，捍卫它们，因为它们都属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宝库。而当我们看到当年被毛泽东同志指责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今天以他的名义来搞阴谋、毁坏他的伟大事业时，履行这种职责就更是刻不容缓的了。

三、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

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

我们非常关注当前国际马列主义运动的形势。我们希望通过此信，就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之间团结的一些问题阐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其中有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内部产生分歧的原因。我们认为，坦率地表明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责任，你们也有责任听取我们的见解并给予答复，这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之间所应有的关系。

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我党重建时期。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重建，是在世界范围正面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我国具体是反对希尔维托·维埃拉为首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的。在那时，我们两党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旨在毫不妥协地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已经获得的丰富经验和成果，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两党之间的这种牢固关系是在共同的原则、共同的斗争和一致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共同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巩固，我们的共同斗争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一直承认并再一次重申，我党得到过中国共产党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援助。在我们同修正主义斗争、聚集马列主义力量 and 为重新建党准备条件的困难时期，我们得到了贵兄弟党的热情支持：你们的忠告、批评和政治上的鼓励，对我们来说都是无价的帮助。毫无疑问，这种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鼓励，是兄弟党之间互相支持的正确政策的体现，为完成我们的使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各个斗争时期，我们都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的无产阶级支持，使我们投身于持久的人民战争。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作法是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因而这也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党的职责，而在履行它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尤为突出。无可置疑，这一作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得到了提高，并加强了马列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方面，它也自觉地做了努力来履行力所能及范围内（对于它的局限性你们是知道的）的国际主义义务。它基本上履行了并正在继续履行它的职责，这主要是因为它把同反动势力的殊死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开展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想强调指出一点，即我们党一直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就是在公开支持社会主义中国会造成危险，被反动派称之为“挑衅分子”、“暴力分子”或“好战分子”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十一年前我们党就指出：“我们的敌人对我们的种种谩骂并没有使我们感到羞愧。我们为保卫中国一今日无产阶级祖国的大部分国土，保卫它的伟大的党和它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而感到自豪。这正是我们的一项伟大任务。”（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第三次中央全会决议）。

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告诉我党，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它的国内外信徒的斗争中遇到了困难，并强调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有百分之十的修正主义分子。尽管在当时我们还不能完全深刻地理解提出来的问题，但是我们毫无保留地表示，我们将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列主义立场的战壕里。

后来，在中共中央推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由于我们两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得到了加强，我们毫不动摇地站在无产阶级力量一边，在反对资产阶级企图否定革命成果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坚决保卫社会主义中国和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立场。一九六七年四月，我党中央委员会在它的决议中指出：

“今天在中国进行的斗争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四个问题上，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可以确定每个人的立场：1、在中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现在能不能和应该不应该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3、能不能和应该不应该同修正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4、从根本上说，应该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上述观点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路线：1、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2、坚持反革命观点并公开无耻地企图推翻人民政权的‘反党黑线’。马列主义路线同‘反党黑线’之间的斗争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斗争。3、虽不公开拥护反革命路线、但在暗地里拥护它并力图使它得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反党黑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自觉程度不同，攻击的程度不同，社会基础和行动方式不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党的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政策，主张苏联式的和平共处。它还‘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主张同修正主义搞调和，攻击同修正主义公开进行无情的殊死斗争——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正确立场。”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质上提出的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是最广泛地支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人民解放的世界运动的……总而言之，他们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迫切需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否定迫切需要支援世界革命。实质上他们否定的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否定的是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提出来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这个立场本身就是反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个险恶阴谋，因而正遭到马列主义者的反对。”（一九六七年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三中全会）

我们党积极响应了毛泽东同志向它发出的号召，严格履行了的职责：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以保卫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你们很清楚我们的这个立场。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随意采取的立场，而是在履行无产阶级原则的职责，我们党将永远忠实地履行这个职责。

我们两党之间存在过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牢固团结。但是，好久以来就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当时占次要地位，没有影响我们两党之间牢固的团结，因为我们两党之间存在着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基本团结，因此那些矛盾是次要的。如果现在我们谈及这些矛盾，那是为了更明确地阐明我们对以下问题的主张。这些矛盾就是：

(1)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我们党就批评中国共产党同变节分子、革命的叛徒或反党分子里卡多、桑佩尔、埃克托尔·波哥大以及后来的卡洛斯、阿里亚斯、福斯托、卡夫雷拉保持政治关系。同样我们党也批评中国共产党打着革命幌子的明显的机会主义组织，如独立革命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联盟保持关系。关于上述组织和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你们没有考虑我们的意见。从马列主义观点来看你们给予我们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建议进行坦率的讨论以便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正确结论，可是你们从不接受。今天，我们依据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认为你们这一政策现在和过去都是错误的，并且将继续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和革命都没有什么益处。

(2) 上面提到的那些组织，在你们的国际宣传品（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稿）中，享有优先的待遇，对它们的这种公开支持同对我们的组织——党、人民解放军、以及西努、圣豪尔赫和考卡地方爱国委员会的革命行动和群众的革命斗争不予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党中央委员会曾多次表示不同意这一政策和这样的做法，但得到的只是这样的回答：“国际宣传并不是主要的”，而同时你们仍然坚持错误的做法。我们目睹了那些机会主义组织是如何利用这些政治上的不公正的优先权的。此外，今天我们还要象过去那样表明，我们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对无产阶级和哥伦比亚共产党人没有益处，而只是有利于对其进行恶毒诽谤的人。我们还必须指出，《北京周报》虽极少报道我党，但却把“叛徒三家村”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份材料当作我党材料于一九六八年登了出来（几乎是全文），其实这个材料是很容易识别的，因为它的立场完全违背我党十大制定的政治路线。

(3) 在捍卫中国革命、宣传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一路线指导下，我们总希望新华分社和哥中友协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能为哥伦比亚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斗争服务。关于新华分社，我们曾建议中共中央让一位诚实的革命者来接替腐化堕落分子埃克托尔·波哥大先生的工作，因为一九六六年波哥大在我国领导着新华分社工作。但是，给我们的唯一回答是，这位先生“技术好”，这样就把技术放在无产阶级政治之上了。在这个问题上，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意见是对的。新华分社在我国所起的作用实在可怜得很，看不到它的工作，以至群众甚至革命者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关于哥中友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痛心地看着，它是怎样被交给那些为美帝效劳的、公开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在友协的领导人中，有全国财政机构协会主席、冶金工人联合会主席、全国咖啡业王联合会经理和哥伦比亚农业主协会经理。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人是哥伦比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话，而我们党则认为他们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朋友，只有在屈从他们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他们的友谊。卖国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哥中友协能为我国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和中国革命服务吗？退一步说，由这样的阶级成份组成的哥中友协，既使可以成为在我国宣传中国文化、艺术、文学以及科学技术成就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要问，他们会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这种宣传和为谁服务呢？事实已充分证明，肯定不可能为我们社会的基本群众，即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下层服务，而只能为社会的上层和高级官僚（哥中友协某些现领导人属于这一阶层）服务。因此，友协的活动同推行“三个世界的理论”相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

(4) 我们两党之间另外一个老矛盾是我党一些党员在中国上学习班的问题。在这些学习班上，教员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以致学习班的大多数人回国后公开反对党的政治路线，蜕变成了派别分子。

其中有的人，则夸口大谈自己得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支持。你们是了解这个情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消了这些学习班，原因恰恰在于通过这些学习班助长了错误立场，在一九七五年你们对我党的政治书记就是这么说的。这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也是正确的，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

(5) 我们谈及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年的经验表明，革命的批评有着无产阶级意义和政治上重要性。我们切身体会到，批评既使来自一个人数少的小党，也应该加以重视，而不能忽视。总的来说，你们拒绝我们给你们提出的批评，以致达到你们对一切与你们不一致的意见都很反感。这就是过去存在于我们两党之间的一些主要矛盾。我们认为你们处理问题的作法是有欠缺的，因为你们对问题不给予应有的讨论，而总是习惯于用“解释”回答一切问题，以为这样问题就算解决了。也许你们自己也明白，这不是一种正确的作法，因为实际上扼杀了讨论。

目前中共和哥共（马列）两党之间最尖锐的矛盾是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问题，这一问题且已成为当前马列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矛盾的焦点。我们在哥共（马列）中央执委会一九七七年十月的声明中，已就上述“理论”表明了我们的基本观点。

现在我们就这一立场做一些补充，把我们的分歧明确地摆出来。

1、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列宁下的定义，这个定义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并得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采纳，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列宁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做出了如下结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寄生和腐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通过达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找出了概括当今世界问题的四个基本矛盾。这些矛盾是开展革命运动的客观基础，它们辩证地联系在一起，不承认或缩小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错误的。但是列宁并不是单单地确定了时代，而且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强调了必须进行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要积蓄和准备力量以推翻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和进行民族解放革命。按照他的革命思想，列宁提出必须在思想和政治上加强无产阶级政党，使它能够切实地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列宁给现时代下过定义之后的革命斗争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定义。因此，在我们看来，列宁的思想并没有过时，不象机会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地我们认为，列宁给我们现时代下的定义仍然有着它的战略意义。

斯大林说：“列宁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当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胜利，打碎了资产阶级民主后，开创了无产阶级民主时代，苏维埃时代”。他还指出：“列宁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它的思想放射出光辉，……”“列宁主义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加强，同机会主义做斗争过去是，现在还仍然是战胜资本主义必要的先决条件”。

虽然世界形势发生了明显和深刻的变化，但时代的特征没有变，因此，按照列宁给时代所下的定义，我们认为，到目前一直在指导马列主义党的战略路线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有效。只有从这一基点出发，才能正确处理和解决存在于当今世界的矛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蜕变成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我们时代的基本内容，因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苏联发生的情况向我们表明：前面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使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把人类引向光辉灿烂的未来，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和蜕变。另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这也只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的一个挫折罢了。不管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力量对比的变化都未能越出列宁科学地描述的历史社会范畴。

2、革命的前景是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政党的作用紧密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一条件将确保革命在各个国家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我们坚持这一点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忘记了马列主义的这一准则，把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看得比把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更为重要。对我们来说，事情很清楚，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它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才能确保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和巩固，确。保革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曾经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指出：必须使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结论是：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党，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

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在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方面它曾指出：“我们坚信，如果没有马列主义共产党，就不能确保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对于夺取政权、领导人民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必需的。（哥共（马列）十大政治决议）

3、“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一九七四年邓小平在联大第二十九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论断是“三个世界理论”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党所采取的虚伪立场的一个例子。我们则认为，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体系和它的经验，在忠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依然生效。

我们认为，在国际范围的革命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特殊的义务和使命。确实，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联合其他为共同革命目标而斗争的力量，但这决不是说为了实现这种联合可以放弃其最高义务。相反，只有当它们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榜样，作为无产阶级祖国采取了正确、彻底的立场，才能真正完成它们的使命。如果为了扩大国家关系而放弃同社会主义体系的关系，拒绝社会主义体系赋予的对国际无产阶级承担的政治责任，那就错了。

斯大林的下列观点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无疑，我们革命的国际性迫使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对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的群众承担起一定的职责。列宁根据这个思想，他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它意味着要尽一切可能开展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争取革命的胜利。但是，这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至少，从中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础和工具。（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至十二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举行的全会）

以前，中国共产党就此曾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党和没有执政的党，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持把社会主义中国混同在社会制度非常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集团中，这只能说明它轻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反对它的最凶恶的敌人，将革命向更高的目标发展的整个斗争中所应该起的作用。这种在理论和实践上抛弃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同无产阶级导师的教导和无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最高使命背道而驰的。力图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杂乱的阵营中找到相似的东西是错误的，相反，会在革命队伍中造成混乱和危害。“发展中”国家这个“范畴”，实际上是国际资产阶级所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那些国家的财富被掠夺的具体现实掩盖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存在，这不是一个科学的词语，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指出：“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实现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一九六一年莫斯科出版的列宁选集第三卷中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一文）

依据科学技术不发达就把一些国家等同起来，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最根本的东西是由社会制度和指导每个国家体制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方向，也就是说是由阶级的性质决定的。在片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情况同受压迫，的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反动阶级掌权，他们执行的是违背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政策。以经济情况相似为由而把社会主义中国放在“第三世界”中，这是违背明确的马列主义原则的无稽之谈。这个错误立场只能用抛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义务和使命加以解释。

4、轻视无产阶级使命，这在各党之间的关系中也表现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的傲慢行为，使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多次出现紧张局面。你们企图把“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战略路线”强加给所有的马列主义党，这就暴露了你们“老子党”的立场，这一立场已遭到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唾弃。当你们拒绝讨论问题，对兄弟党发号施令，不承认一些马列主义兄弟党，拒绝通过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时，团结、独立和平等的原则以及协商一致的原则已被你们抛到九霄云外了。这些就是危害兄弟党之间团结的虚伪立场的例子。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在过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今天，历史又在重演，如人们通过划分当今世界所看到的那样。

这种低估无产阶级使命的立场自然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各党搞多边会议，否定共产国际为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所起的非常积极的作用有关。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多边会议的理由，你们在一九七六年对我党代表团说：“过去的经验表明：巴黎公社不是在第一国际的领导下产生的；十月革命正是在第二国际变修以后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是在第三国际解散以后成功的。还有其他一些这样的例子……，

近年来，在没有国际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革命取得了胜利……”。

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这种说法不但脱离了历史事实，而且无视了出现的矛盾——承认马列主义党之间团结的重要性的人同不承认它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回避了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都没有把本国革命的胜利依附于各党的国际组织。然而回顾一下国际的历史就可以得出无可争辩的结论：它对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间的“共产主义者联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学校。我们没有权力忘记《共产党宣言》在教育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众所周知，《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联盟”委托写的。为了评价第一国际或国际工人协会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只要回顾和注意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价便一清二楚了，马克思称第一国际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教育家”，恩格斯说：“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自觉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使第二国际完全陷入机会主义，因此这些人统治第二国际时，对无产阶级起了反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说“十月革命正是在第二国际变修以后取得胜利的”，这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认为，随着列宁主义战胜了国内的孟什维克主义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才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斯大林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是“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加强”。伟大的十月革命前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举行的国际会议，向我们十分清楚地说明，列宁的国际政策有着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十月革命最杰出的领导人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推动者，这是人们所不能忘记的。还有令人不能忘记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当时为建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组织而进行斗争具有深远意义。

我们知道，自从第三国际建立以后，在医治机会主义疾病上和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进行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第三国际的任务是按照列宁和斯大林不可战胜的思想和不朽的著作制定出来的，这是我们不能否定的。为了证明这一真理，除了回顾一下他们同机会主义面对面的斗争外，还应回顾，马列主义的如下论点：划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如何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改良主义，反对企图把共产党变成不搞阶级斗争的和平工具；宣传苏维埃的经验以及捍卫它的义务；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支持落后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的路线；支持被剥削的附属国的人民起来造反，反对他们的压迫者；提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支援下，“落后国家”可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并通过一定发展阶段，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共产主义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权来指导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带头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树立了鲜明的榜样）。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第三国际即令人难以忘怀的共产国际为统一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而起的突出作用了永远不能忘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所起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我们很清楚，共产国际在有效地完成它按照列宁主义原则来推动和保证建立各国共产党这一使命之后就不存在了，这并不是因为它放弃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从列宁非常正确的教导中认识到它的正确价值，列宁是这样明确地阐明国际的重要性：

“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

“第二国际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国际本身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力量，为取得政权和社会主义胜利，进行革命的进攻反对所有的资本主义政府，发动内战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列宁）

我们知道你们为反对多边会议所进行辩解的每一条论据。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论据同多边会议对加强马列主义所具有的深远政治意义相比是次要的。我们还认为，多边会议的消极面只有通过各党之间的接近才能克服，而不能助长它们的分散状况。但是，当有人轻视无产阶级和贵党在革命中的作用时，这条思想路线会导致反对马列主义运动必要的团结。另外，如果重新出现“老子党”的作法的话，那么多边会议就非常不合适了，最好是反对各党之间交流经验和讨论问题，不是这样吗？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所走的特殊道路是违背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和反对马列主义党的最崇高使命的。

5、正象以前所讲的那样，按照“三个世界的理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存在了。另一方面，这个理论认为帝国主义阵营已经瓦解，转为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其中“最危险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两种不可调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象变戏法一样不见了。按照这样的道理，现在要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最危险的超级大国”。这就是“三个世界理论”的关键所在，在它的后面隐藏着否定阶级斗争，调和主义和放弃革命。上述“理论”认为：美帝国主义处于“守势”，放弃了扩张，以便致力于维护它的既得利益，就是说，“它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这岂不是说美帝国主

义已从老虎变成了鸽子吗？马克思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越临近最后的灭亡，越要加紧掠夺和压迫人民。历史经验已千百次地表明了这一真理，这就无需说了。

关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上述“理论”认为它处于“攻势”，在发展中，“苏联想扩张”，是“最危险”的超级大国，因为它是瓜分世界的后起之秀。如此强调社会帝国主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为了不落入社会帝国主义的魔爪，唯一的出路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那些最坏的敌人。难道社会帝国主义同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敌人不一样，本质上不是虚弱的吗？应该注意的是，一方面夸大社会帝国主义的危险性，同时又提出存在“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条件，这二者之间是前后矛盾的。

“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这样的问题：把无产阶级和人民面临的危险归结为两个超级大国，主要是社会帝国主义，这样就忘记了作为反动制度的帝国主义的危险性，抹杀了划分阶级。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不要忘记，“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黑体是我们加的。）

我们还看到，目前，“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提出，各国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以便“推迟战争”，这就一笔抹杀了革命的目标。这个战略很象赫鲁晓夫宣扬的“和平”政策。赫鲁晓夫把放弃革命作为免受“核危险”的手段。列宁教导我们说：“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

6、根据这种对目前世界现实的“分析”，“第二世界”正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次要的帝国主义组成的。按照“三个世界”的解释，革命力量可以信赖“第二世界”，因为它“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特别是反对社会帝国主义。于是就应该支持国际资产阶级的机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反动势力和欧洲共同市场的掠夺集团，因为，按照“三个世界”的价值表，它们有“积极性”，这是忘记了它们的反动本质。这就是说，哪里真正有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死敌，就故意到那里去寻找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过去说过：“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列主义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实际上，“第二世界”的定义符合于一项妥协的政策，它除了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同这种利益毫不相干。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在开展殊死斗争以解决两种制度的尖锐矛盾时，把帝国主义者中的一部分当作可靠的同盟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党认为，各国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它们自己要牢固地团结起来，同敌人进行面对面斗争，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我们这方面来说，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要坚定地支持欧洲无产阶级，但是，绝不能支持欧洲垄断资产阶级，尽管一些人看来它是最“反对霸权主义的”。

我们曾同意和坚决支持过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执行的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国际政策。现在我们认为，你们为结交新“朋友”和同所有的人搞好关系，把窗门都敞开，引虎狼入室……。

7、按照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中的说法，“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我们忠于马克思主义导师的思想，反对这种谬论，因为我们深信，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人民、劳动群众创造世界历史。在“第三世界国家”概念中看不到阶级差别，这对资产阶级有利。我们提出下面一个问题就足以证实这个看法了：“第三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

似乎上述的谬论还嫌不够，又把那些只有靠使用“不结盟国家”，“中立国”或“发展中国家”之类的含糊术语才能放在一起的所有各国都包括在所谓“第三世界”之中。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术语是机会主义的，是反对阶级准则的，总之，是反革命的。

但是，“第三世界”的理论家们甚至厚颜无耻地说，上述观点来自于列宁。确实，你们在引用列宁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关于“世界轮廓”的几段语录之后，兴奋地说：“列宁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在世界政治力量划分的问题上，简直象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说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九七七年十一月九日第四十五期北京周报）

这种高兴是同歪曲列宁的思想相适应的。因为列宁从来没有准备把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抹煞掉，也没有忘记世界上阶级的差别。列宁提到的“十二亿五千万人”，“他们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指的是“我们要维护其利益的群众”，或者说指的是“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不是指统治阶级，剥削者和反动派。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这些话和前边提到的语录是在同一篇著作中。我们愿意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象“第三世界”的理论家们那样忘记阶级差别。因此，请你们最好重温一下列宁在讲了你们称之为“多么好”的那段话一年之后所讲的另一段话。列宁极为明确地指出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区分了“国际资产阶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和“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

你们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引用了“多么好”的话，列宁在报告中谈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和现实的“世界轮廓”时指出：“由于上述种种事实，完全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条件，产生了两种基本情况，一方面，人民群众，首先是十二亿五千万人，即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贫困、破产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就是在任何一个债权国内，工人的处境也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风潮的根源。这种风潮正在增长，……”。为不使人们产生疑问，他下面接着说：“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恶化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在极少数操纵一切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列宁还指出：“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小市民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不加区别地支持解放运动：“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捍卫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原理，并且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应当包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而不问这些力量的阶级成分和政治观点如何。”我们坚决反对这样歪曲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让我们看一下列宁是怎样说的：“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的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是在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讲的这些话，即在上述被企图用以支持“三个世界理论”的报告发表七天之后。

列宁还说：“在民族问题上也应当把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而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持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三卷，一九六一年莫斯科出版）。接着，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所以，很清楚，“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歪曲了列宁的思想。

让我们看一下斯大林是怎样说的：“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下面又接着说：“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论列宁主义基础——民族问题一章）

事实上，不管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一直是坚持无产阶级观点，没有忘记“阶级成分”和“政治观点”。“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对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搞虚假的解释，这样做是由他们虚伪的政治立场所造成的。

“三个世界”的理论企图改变解放斗争的内容。一九七六年，你们在同我们代表团进行会谈时说：“第三世界的目标不是世界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第三世界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利于革命。”实际上是你们过于重视各国的经济斗争和改良主义斗争，而轻视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只要回顾一下被你们称之为“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的例子就会一目了然：“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气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一九七四年，邓小平在联大第二十九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人们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革命前景中占次要地位的各国政府或“各个国家”的活动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混淆在一起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永远把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放在首位，因为它在当代有着深远的意义。作为带领哥伦比亚人民参加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的力量，我们同你们有着根本对立的立场。我们不能接受的是，把我们进行的带有社会主义前景的革命斗争同我国政府的代表在联合国做出的（资产阶级内容的）“民族主义”姿态混同在一起。我国的代表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利益和政策的应声虫。

8、“三个世界理论”突出点之一是，反对服从于革命基本利益的列宁主义共处原则，复活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我们清楚地知道，按照列宁的教导，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建立关系；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同它们建立关系不能危害革命。我们已经看到，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观点是如何使人在政治上迷失方向，例如，同皮诺切特法西斯政府、伊朗国王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保持关系，同时却忘记了支持上述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或否定他们的斗争。所以对革命行动默不作声，对非革命活动则热情欢迎。例如，欢迎拉丁美洲的法西斯独裁者们进行会晤，强调这些会晤对“反帝”斗争来说是重要的；称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首脑会议，说：“去年八月，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墨西哥和牙买加的总统在波哥大举行了会议，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斗争，谴责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行径，许多国家的舆论都赞扬这次反帝会议”。（北京周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把完全是为我国的卖国寡头和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哥伦比亚咖啡业主联合会的活动说成是“进步”的。（见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新华社通讯稿）。把哥中友协交给了卖国的资产阶级分子。

我们懂得，列宁主义的共处原则是有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其发展是有利于革命的；它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并促进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修正主义的共处原则有助于资产阶级，其发展则是有益于反革命的，因为它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国内鼓动各阶级合作，在国际鼓动对国际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并执行这些政策。它忘记了下列原则：“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乐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列宁）

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的政策时说：“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当时强调说）“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随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马列主义立场在中共中央签署的文件《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你们现在还同意这些主张吗？你们现在的政策和实践是否与上述主张一致呢？

9、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问题，你们一开始就认为，战争迫在眉睫，甚至你们向我们当时的政治书记彼德罗·莱昂·阿沃莱达同志建议，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为夺取政权作好准备；他在一九七四年底访问中国时，你们是这样讲的。我们一直认为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因为，我们体会到，只有通过艰苦、浴血和长期的斗争，而不是通过一个偶然的机，才能在我国取得真正革命的胜利。你们这样建议我们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来自你们信赖“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

后来你们又说：“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推迟”，指出唯一的战争挑动者是两个超级大国，而主要是社会帝国主义，它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从而忘记了扩张和侵略不单是两个超级大国、也是帝国主义的本性。

另外，为了“对付战争”，你们只满足于号召人们进行“反霸”斗争，来“推迟战争”，理由是“人民可以推迟战争的爆发”，因此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将战争变成革命的号召。你们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广泛的世界反帝阵线来推动革命的号召，而用建立“非常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以“推迟战争”的建议来代替这一号召。按照“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了扩大这个“反霸阵线”，你们抛弃了革命，所有想参加这个阵线的人都可以参加，但唯一的条件是忘掉革命斗争

以前，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不是这样的：“我们决心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团结世界上一切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人。我们坚决同世界上所有的马列主义者站到一起，将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推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在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的声明中表明过类似的立场，在这个声明中，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建立世界反帝阵线的伟大号召。

10、你们国际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你们满口赞扬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并欢迎铁托的“不结盟”政策，企

图为他恢复名誉。我们在一九七七年第三十六期《北京周报》上看到：“铁托总统访问中国是中南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有机会接待铁托总统…。战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响应铁托总统的号召，积极地投入了国家建设的新的斗争，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年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这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总统的健康长寿干杯”。（在铁托访问中国时华国锋的几段讲话）。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了你们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热烈的祝贺”。（一九七七年第四十九期《北京周报》）。

我们不同意你们对叛徒铁托和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所持的立场。根据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上铁托和他的集团被谴责为马列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代理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和破坏者。上述声明发表后的事实充分证实了这种谴责的正确性。因为，铁托确实是个屡教不改的修正主义分子。国际马列主义运动一直反对叛徒铁托的政治立场，把这些立场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组成部分。

在六十年代国际论战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公开谴责了铁托集团。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重申了这一正式立场。

我们认为，铁托的思想和政治立场没有改变。相反，他继续坚持和深化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倾向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不结盟”政策。因此，我们反对你们单方面给地道的叛徒铁托和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全面恢复名誉的企图。

11、我们的上述立场的根据，不仅是你们的文件、声明、会议等，而且还有你们的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你们的实践清楚地显示了你们的“新”观念和“新”理论。

由此可见，当前我们两党之间围绕“三个世界理论”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因为选关系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理论”的深远影响就在于它的根据和实践给革命力量造成混乱和严重的危害，造成了马列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在于有人企图把上述“理论”变成“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说，把它变成“革命的战略路线”，来代替指导真正的马列主义党行动的马列主义路线。你们已经忘记了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中国共产党曾经建议：“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在认真地研究了“三个世界理论”的思想根源和政治依据以后，我们深信，这个理论根本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教导，并企图重新举起中国共产党和其它马列主义党曾毫不妥协地反对过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那些旗帜。

我们不但要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而且我们还要揭露它违背了世界马列主义运动最崇高的利益，违背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最崇高的利益。不管你们如何来修饰上述“理论”，把它说成是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我们也反对它，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毛泽东的思想。你们越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来美化它，越暴露它的原形，因为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访华的我党中央代表团之间所进行的会谈中，出现了一些矛盾我们必须坦率地把它提出来，这是我们的习惯。很有必要把对我们代表团在物质上以及其它方面的接待问题同政治问题明确地区别开来，因为我们认为，政治问题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问题。因此，把它们放到适当的位置上，我们指出下列几个问题：

1、我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支持一九七六年中央访华代表团所持的立场，即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使用不公正的评价、阴谋和谎言企图损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形象，这些不公正的评价，阴谋和谎言暴露了与我们事业相违背的利益和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作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是根据这种观念，向我代表团通报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甚至指出，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我们代表团反对这一错误做法点出它有可能给马列主义运动团结造成严重的危害时，你们回答我们说，你们在对处理现在存在着的矛盾是有经验的一。如今当重申我们代表团所持的立场是正确时，我们就应反对这一做法？因为，它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违犯马列主义党的关系准则。尤其是，当这个问题涉及到象曾经兄弟般地在一起反对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两党的时候更需要反对这种做法。

你们告诉了我们代表团，到目前为止中阿两党的矛盾在两党之间尚未处理，因为据你们讲，毛泽东同志曾反对处理这些问题，“以避免矛盾激化”。老实说，你们的解释同我们所了解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不一致。因为，他教导我们说，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人内部）矛盾的唯一正确做法是讨论、讲道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相信，正是你们，而不是毛泽东同志，才不欢迎批评和讨论，而喜欢其它的做法。

我们记得，你们曾对我们许诺要以正确的办法处理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矛盾。我们说清楚，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最初的错误会变得更严重，而你们要负最大的责任。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代表团曾提出过这样的正确建议：不要把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问题通报给其它党。后来我们知道——当然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意外——没有理会我们的建议。这件事情应该说清楚。

2、我们党代表团负责把一九七六在地拉那举行的拉丁美洲各党代表团会议情况及其结果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必须说明，我们代表团之所以把这次会议的情况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因为这个会议的决议规定，在会议闭幕以后，到中国去的第一个代表团要把这个会议的情况通报给兄弟（的中国）党，而这并不是参加会议的兄弟党专门委托我们代表团的义务。

在得知上述会议的情况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上告诉我们说，地拉那会议是“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战略路线的阴谋会议”。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说，这个会议可以和布加勒斯特修正主义会议相提并论，因为这个会议是一个没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阴谋会议”。我们坚决反对这一指责，并认为，这个看法违反马列党之间关系上所应贯彻的互相尊重和无产阶级兄弟情谊原则。我们认为，地拉那会议，对真正的马列主义党的原则团结来说，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马列主义大事件。我们将继续捍卫这个会议的政治内容。

自然，根据向我们正式通报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断然反对地拉那会议联合声明的马列主义内容，并指出它的内容是“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授意的”。现在，我们如同我们代表团当时的做法一样，反对这个虚伪、无礼和诽谤性的结论。你们下这个结论就把这个结论和上述联合声明中的政治内容所引起的我们各党之间的矛盾置于健康的、兄弟般的讨论之外。我们认为，你们的看法严重地侮辱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签署联合声明的党，说明你们没有能力从无产阶级科学观点出发来分析问题，也表明你们的目的是要把现存的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不顾具体实际情况而评价地拉那会议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态度对谁有利？你们对联合声明所持的立场的根据是什么？你们这样下结论。目的何在？

借此机会，我们谈一下关于联合声明的两个矛盾：

第一：联合声明的第二段指出：“解放斗争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确实，在世界不同的地区，主要的敌人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忽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联合它们中的一个去反对另一个，这样就会铸成大错。”

你们说，这个说法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授意的”。我们代表团坚决反对了这一意见，指出没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哪一个文件中提出过“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认为联合声明的说法是对你们的影射，是不对的，是毫无根据的。从无产阶级观点出发，你们根据什么理由感到这一正确主张是对你们的影射？你们根据什么断定和肯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自己的观点引入了反映签名各党观点的文件中？你们必须向我们党，向在联合声明上签名的其他党，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向国际马列主义运动说清楚这个问题。

第二：联合声明的第三段指出：“拉丁美洲各马列主义党代表团在交换情况时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大陆大多数国家人民处于独裁政权、军人政权和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之下”。

你们批评这个主张的所谓“狭隘性”并且为了说明你们的立场，提出如下问题：“在统治阶级内部，根据它们的本质、政治地位和策略，难道没有部分阶层能够同反帝力量团结在一起吗？”现在，在你们进一步发展了你们的观点之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了你们观点的阶级根源。这使我们更加坚信，声明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对拉美各国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并指明了符合这一形势的革命政策。我们身临其境并从马列主义观点来观察现实。而你们则不顾现实，企图使它适应你们既定的见解。

按照你们的意图，你们曾向我们代表团施加压力，要它撤销在联合声明上的签字并说服其他兄弟党以便使联合声明不能发表。你们这种态度难道能说明你们是遵循尊重其他党的尊严、独立和自主的原则吗？；我们代表团反对了你们让我们反对兄弟党意见的要求，这次确实是你们这样授意了。我们代表团遵守了中共中央过去曾捍卫过的无产阶级原则，而你们却坚持了错误态度。后来，我们代表团有条件地同意把中共中央的意见通报给声明的其他签字者，我们曾表明，根据共产党人之间的做法，会议的决议只能由通过这些决议的人修改；根据签字者的办定，中共中央关于推迟发表联合声明的建议，需要签字者一致同意才能实施。这种做法才符合马列主义党独立自主行事的原则。但你们这些建反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曾经有人坚持要我们代表团违背已通过了的决议，威胁说，如果对声明不进行修改而把它发表，那将是“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联合声明的发表“将有损于马列主义运动的团结”，等等。我们认为，这种固执的态度反映了一些人的绝望情绪，他们不以证据的正确性为依谓，而搞赤裸裸或变相的威胁，施加压力，违反原则，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们代表团的办法光明正大，遵守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指导各党关系的原则。

你们已经知道，声明已发表，我们党理所当然、正确地重申了在声明上的签字。我们要讲清楚，作为一

个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决的党，我们的做法是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和我们的见解的。我们没有屈服过、将来也不屈服于任何威胁和别人的发号施令。我们完全相信，世界马列主义运动的团结只有建立在尊重和坚决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才能维持下去和加强。应该回忆一下，在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最紧张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大声宣布：“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现在你们还坚持你们过去的正确立场吗？

至于我们，我们严格履行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许下的诺言，即把你们对地拉那会议和述次会议联合声明的意见通报给拉丁美洲其他马列主义党。虽然我们不同意这一做法，但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戒心，我们还是这样做了。我们要向国际马列主义运动承担这一行动的责任。从那时起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充分说明，我们坚持了联合声明中的内容是有道理的。

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我党代表团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立场。我们代表团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委托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巩固对正确立场的认识、对过去就存在于两党之间的矛盾进行坦率的讨论，来加强我们两党之间的团结关系。我们代表团重申了我党继续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实践的立场，指出马列主义党之间存在矛盾并不是坏事，坏事是没有正确地处理矛盾，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之间显然存在着旧的和新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在共产党人之间应该恰如其分地得到处理。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我们代表团的上述意见反映了我党的立场。正象我们代表团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之所以在当时没有对新矛盾进行深入的讨论，是因为它有另外的使命。它当时的任务是：通报国际问题，同兄弟党交流经验，搜集对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是人们现在争论的尖锐矛盾）的看法，恢复、建立和改善同兄弟党的关系。必须提醒一下，由于我们的政治书记彼德罗·莱昂·阿尔沃莱达同志在斗争中牺牲了，使我们一时同国际马列主义运动失去了联系。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才表明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这些问题（当时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些新的问题）的集体意见。

我们在仔细地分析了你们所持的各种立场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们公开地采取了过去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反对的“老子党”的立场。我们一如既往地反对这些观点和作法并象以前反对赫鲁晓夫使用的修正主义做法一样继续反对这些作法。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对马列主义运动团结、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关系、对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等极其重要问题，表明了我们的观点。不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就不能胜利地将反帝和反对其他的反动势力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毫不犹豫地将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其它反动派的斗争，以便把我国的民族和社会革命进行到底，把这一革命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党继续坚定地开展反对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党懂得，这是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继续。我们要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知道，世界马列主义工人运动的活力和无产阶级光辉灿烂的未来取决于这一斗争。

我们保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波折，我们将继续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是勇敢无畏的无产者，不会被困难所吓倒，因为我们所捍卫的事业甚至需要我们做出最大的牺牲。

我们将不懈地为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我们认识到，这一团结要求坚决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我们永远不会向机会主义立场妥协。我们懂得，反对机会主义立场的斗争，对真正的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来说，对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党真正的马列主义性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面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非马列主义立场，我们党有责任象以前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那样起来斗争。我们将反对一切错误立场，不管它来自何方，因为，这是我们马列主义党的特点，是我们党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哥伦比亚革命与世界革命所承担的义务之一。

我们最坚决地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复活了的“老子党”立场，因为这一立场是反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

我们坚持要倾听我们的呼声，坚持发表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正直的无产者所应该履行的义务。

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上述意见作出明确的及时的答复。

不朽的马列主义万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

马列主义运动团结万岁！

怀念难忘的无产阶级导师们！

怀念在战斗中牺牲的哥伦比亚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卓越领导人、令人难以忘怀的彼德罗·瓦斯盖斯同志和

彼德罗·莱昂·阿尔沃莱达同志！
团结战斗，我们必胜！

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于哥伦比亚

四、智利革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

早在十三年前，当智利革命共产党还只是一个叫做“斯巴达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的时候，它同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政治联系。在一九六四年，这个政治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由“斯巴达克”的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本人举行了第一次会晤，毛泽东同志鼓励和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计划，并为此提供了宝贵意见，其中他说：“不要机械地照抄中国或另一个国家的经验；同任何尾巴主义倾向展开斗争并要动脑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一贯竭力忠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这封公开信就是一种表示。一九六六年初，在所有的拉丁美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参加的成立大会上，创建了智利革命共产党，那次大会的组织核心是“斯巴达克”小组。智利革命共产党继续保持和发展了同中国共产党，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只要我们在每个国家认识它们的代表——的政治联系。

一九六三年组成“斯巴达克”小组的和之后一九六六年组成智利革命共产党的那些人，在老的智利“共产党”内部，在中国共产党同苏联领导人及其一伙之间展开公开论战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反对赫鲁晓夫强加给苏共二十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至于“斯巴达克”小组，在它作为独立于老的智利“共产党”的小组诞生将近一年之后，它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政治联系。

光是“斯巴达克”，后来是智利革命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政治联系产生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一致理解和共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了回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和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通常称为二十五点信件），起草了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的复信的九篇评论，我们完全同意公开信和九评的主要观点。这种一致看法是我们两党关系的基础。

此外，在六十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最高潮之际——我们之间建立了政治联系。以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一贯奉行反对修正主义者的国际革命政策。正是在那个时期，在中国，人们组织了支持全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群众大会；观看了反映这些斗争的许多文艺演出和从你们中国的电台、杂志和期刊中看到了同这些斗争相应的宣传。正是在那个时期，中国的刊物转载了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关于它们自己国家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帝国主义的傀儡，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象奈温、蒙博托和其他反动派受到了应有的谴责，象铁托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叛徒遭到揭露。

后来，在七十年代，在“恢复”象邓小平这样的人和其他受到文化革命批判的人的名誉的同时，中国的国际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导致我们两党之间产生了许多分歧和矛盾。随后，在一九七四年四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表了一次有名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阐述了一条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反对赫鲁晓夫及其门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完全针锋相对的一条国际路线，实质上，这条路线同赫鲁晓夫和其门徒的路线是一样的。在一九七四年八月邓小平的讲话之后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谈时，我们对他的机会主义的国际路线作了严肃的批评。对方没有回答我们的论点，他们作为唯一的答复仅仅厚颜无耻地对我们说：“这是毛主席的国际路线”。一九七五年初，在中国共产党通知我们党的领导拒绝讨论它的国际路线的变化之后，我们再次坚决地批评了邓小平的国际路线；我们特别指出，这条路线导致产生一种反动的政策，首先是中国官方人士对智利法西斯军人集团采取的态度。这是我们两党之间的最后一次接触。

在那一次接触中，我们没有提到（正象一些兄弟党误传的那样）中国和在智利执政的法西斯分子的外交关系。相反地，面对我们的人民在法西斯政变之后所经历的使全世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和进步人士阶层感到震惊和愤慨的悲剧，我们表示了我们与那些决定中国的国际政策的人的漠不关心和缺乏同情的严重分歧。实际上，中国对在智利发生的事件所持的立场——如果可以。说立场的话——的唯一声明，就是前总理周恩来致前总统阿连德的遗孀的唁电，他在唁电中说：对阿连德的逝世“至深悲愤”，而对阿连德的凶手则没有提出任何看法，也没提到遭到法西斯军人的屠杀、拷打和逮捕的几万劳动者。只是在政变的那个月期间，才发表了，并且不加任何评论和评价地转载了关于在智利的镇压的某些表面现象的消息。更有甚者，仿佛为了表明对法西斯军人集团的暴行不表态的决定，人们转载了对法西斯军人集团的一些谴责，但是这些谴责都是别人的谴责。后来，甚至不报道有关镇压的消息，中国的刊物只满足于迟迟地刊登智利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指出这一切，是为了同在世界所有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谴责智利法西斯主义的残酷行径的消息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我们还指出，驻联合国的和驻其它国际组织的中国代表，当提出谴责皮诺切特及其一伙的决议时，他们不投票而退出会场。我们指出了中国官方的这种态度受到智利法西斯政权官员的多么热烈的欢迎，正象外交部副部长一九七五年一月所说的那样：“在世界会议上，人民中国支持智利”，这一点在言行上都无人否

认。

当前,我们可以就你们同残忍的智利法西斯政权的关系提出更严厉的指责:你们向军人集团提供了信贷;中国大使本人让人们拍了他正向独裁者皮诺切特赠送礼物的照片,今年(一九七七年)八月,他发表讲话说:“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高水平的”,并且中国打算加强和扩大这种关系。最后,这位大使圆满地结束了他的亲法西斯活动,在十月中旬离别智利时说他是“带着对智利和国家元首的极其良好的印象”离开的。赞扬把智利人民置于残杀、酷刑和超度剥削之下的那位屠夫难道不是对智利人民的侮辱吗?难道不是对中国曾为世界人民起过的革命作用的破坏吗?

一九七五年初,我们最后一次会谈时,那时同智利法西斯军人集团的合作还没有变得象后来那样可耻,我们就已经指出在中国奉行邓小平路线的那些人们的政策给我国人民反法西斯和反帝斗争造成的极大危害。我们指出这种政策伤害了智利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兄弟友谊,以及中国革命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威望。最后,我们指出了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给我们党为动员群众反对独裁、揭露为法西斯主义开路 and 为法西斯主义当政效劳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叛徒政策而进行的斗争带来的困难。了解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政治关系的智利人民群众当然要求我们对你们同他们的刽子手所持的友好合作态度作出解释,我们无法用革命的观点解释这种态度,我们也不打算这样作,因为这种态度与我们的坚决反法西斯主义和马列主义国际主义的政策原则从根本上是相对立的。

作为我们希望得到的中国的支持的榜样,我们指出了我们从大多数马列主义党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那里得到的支持,这种支持是通过发表文章、举行集会或其他声援形式来支持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和谴责独裁的罪行,并揭露诸如“和平道路”和其它使得能够在智利建立起法西斯主义并在今天阻挠着推翻法西斯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

最后,我们要求切实讨论我们同邓小平国际路线的分歧,因为在上次访问时,对我们的任何批评都没有给予答复。我们仅仅听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重申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而剥夺了我们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甚至对我们刚刚听到的发言提问题的权利。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下次会谈时再谈”。

那时,我们党就面临着选择,即是否要公开谴责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特别不利于我们人民反法西斯和反帝斗争的邓小平及其一伙的路线和国际政策。我们党的党员、我们的盟友和广大群众日益强烈要求对此采取立场。一九七五年初,我们最后一次同中国共产党会晤时之所以没有那样作,正是因为,从那年起人们注意到在中国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事实,这些事实使我们看到了有实行认真纠偏的希望。一九七五年初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号召,以及他的警告,即只要资产阶级法权继续存在“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是很容易的。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并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他逝世时”广泛展开了群众对邓小平为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煽起的人们称之为“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另外,一九七六年四月,由于邓小平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中共中央一致通过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项决议,正如你们的报刊所说的那样,受到了参加集会的“几亿人”的支持。当时完全有理由希望毛泽东同志的国际路线将得到恢复,这条路线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和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中国的斗争的这些有利条件,以及必须加倍努力使所有马列主义组织都懂得这个问题——邓小平在这些组织中的几个代理人竭力制造混乱——促使我们在公开批判和断绝关系之前逐步展开反对这股新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我们就是通过革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通过与兄弟党在共同声明中表明立场、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和双边会谈而这样作的。

最后。毛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悲剧事件:关押在文化革命中表现突出和在毛同志身边一起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头子的那些人无耻地“恢复”受到文化革命批判的人和诸如邓小平这样屡教不改的一些人的职务;残酷地镇压决心维护文化革命成果的群众组织和干部,这一切使人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发生了一次反革命政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对那些篡了权的人公开进行揭露和斗争。我们这样做是响应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发出的号召。他当时说:“如果将来中国发生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的情况,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应当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政策和国际路线,我们有权利和义务发表意见。任何一个党,不管它对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把它的国际路线强加给别的党,更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变为修正主义的路线,并要求大家在这种机会主义转变中都跟它走。确定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确定对付主要敌人的统一战线的特性;制定对付战争危险的路线;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以及先锋队作用的标准,等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写的《二十五点的信件》说:“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至于我们的党,暂时控制了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所施加的压力,如拒绝讨论和甚至拒绝接待不同意它的观点的党,对这些党进行诬蔑;竭力分裂它们并扶植一些机会

主义组织来取代它们，等等，将不能使我们改变自己的观点，也将不能阻挡我们揭露我们认为是反动的国际路线。这些压力也将不能阻挡我们——在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时候，不管会有什么后果——揭露那些竭力把这条路线强加于人、并把它说成是他们的行动方针的人的反动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及其一伙的修正主义的国际路线是什么货色？他们骗人地把这条路线作为“毛主席的国际路线”。这条路线不是别的，恰恰是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的修正主义国际路线的翻版——几乎一模一样。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推行这条路线是为了不让各国人民起来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从而为取代传统的帝国主义、充当各国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创造条件。苏联推行这条路线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这条路线被毛泽东同志、霍查同志、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彻底打倒了。关于中国，我们在这封公开信开头引用的文件即《二十五点的信件》和毛泽东领导下就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发表的九评，都是为了揭露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的这种反动的国际政策。这些文件如同体现在他的著名的著作中的观点一样，是“毛泽东的国际路线”，并不是邓小平及其一伙用来取代这条路线的捏造的东西。

正如我们指出的，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四月在联合国所作的发言中和其它一些文章中集中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首先否认新殖民主义的殖民政治压迫，就象赫鲁晓夫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而且说的也是一样。他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他在另一个问题上说：“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在刘少奇和赫鲁晓夫的这个忠实门徒看来，所谓“发展中”（它掩盖着阻碍或歪曲它们的发展的政治上的依赖）国家是“过去”遭受压迫。现在，这些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且它们还必须结束殖民主义的“残余”形式。他认为，问题就是要“保卫”和“巩固”这一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或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另外必须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以便已获得的政治独立“完善”和“巩固”。

相反，毛同志和那些同他一起编写批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的名叫《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评论的人是怎么说的呢？那篇文章说：“（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接下去又说：“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当他们不能利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养辣的殖民主义”。这就是对根据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论点所说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获得的“政治独立”的真实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回答。

邓小平在他在联合国发言的另外一部分中指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关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赫鲁晓夫的这一忠实信徒认为，问题不是为了砸碎新老殖民主义锁链，获得真正的政治独立而进行斗争。只需改善“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因此也就是要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这种说法就等于向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和人民群众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你们是‘自由的’，想要解决你们的问题，只需你们向你们的老板要更多的工资就行了”。显然，上面引述的邓小平的说法不是针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新老殖民主义压迫的世界人民讲的，而是旨在使超级大国的走狗同其主子之间的某些矛盾趋于尖锐，以便在他们中间争取到几个盟国和建立自己的霸权。关于邓小平的“对付”帝国主义的这一“别出心裁”的体制，已经援引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这篇评论文章怎么说的呢？评论说：“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这一点上不是毛泽东影响了邓小平，而是邓的苏联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主子影响了他，这在他来说是正常的。评论文章在批判

这些观念时继续说：“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象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这篇评论最后说：“按照苏共领导（还应该加上他们的信徒邓小平）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邓小平这个赫鲁晓夫及继承者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的学舌者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邓小平为取消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努力不只局限于他作为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办法而提出的经济主义。他在中国用来作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的这些经济主义的说法来源于他用来说明新殖民主义本性的同样是经济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是否认为新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通过它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象智利的皮诺切特这样的代理人进行政治统治的一种形式呢？绝对不是的。他在联合国的发言中说：“帝国主义、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建立‘国中之国’，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因此，邓小平认为，新殖民主义不是殖民主义的“更阴险和更毒辣的”形式，不是帝国主义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的一种形式，而只是进行剥削和掠夺的简单“办法”以及仅仅是一种政治“干涉”。他认为，这同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通过其代理人（比如几乎遍布整个拉丁美洲的法西斯军人和在东欧的假社会主义的官僚阶层）实行国家统治的形式无关，而是一种“国中之国”，是“跨国公司”伦出资本的结果。因此，（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上独立的真正的国家可以通过采取反对“跨国公司”的经济措施来摆脱这样的新殖民主义的“作法”，从而消除其“政治上干涉”和“经济掠夺”。

邓小平这一论据的实质，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这种论据是；出于他这样的愿望：把资产阶级阶层这个超级大国的走狗与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分离开来以便同他们联合起来和发展他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这一切是反对人民在进行具有社会主义前景的真正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基础上，赶走帝国主义和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不要忘记，早在五九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象邓小平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时就指出，他们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后来，在反击邓小平刮起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也就是在逝世前不久，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同一个问题时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和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继续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既然他们在中国打算使革命倒退到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那么，他们要勾结他们所说的“第三世界”或“第二世界”中的资产阶级势力，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前景的真正的民族解放，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他们的国际政策，只不过是毛泽东同志已经揭露和批判过的“大官们的利益”在国际上的反映。

为了反对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为了同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包括充当超级大国走狗的资产阶级各阶层）联合，邓小平编造的最大谎言之一就是企图把“第三世界国家”说成是推动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经常谈到被压迫“民族”。这个名词指的是一个国家里有同一个起源，有共同语言和传统的居民，从根本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然而，国家这个概念指的仅仅是地理和领土的界限，在这个界限内生活着一个民族。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人，他们的代表是控制着国家机器的统治阶层，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人的真正代表是人民，而人民的真正代表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党——马列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人民看作是历史的动力，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因此，在这种社会里，无产阶级就是人民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然而邓小平却向我们讲这样的新鲜事：“第三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动力。须知这并不是因为汉语复杂翻译上的错误。邓小平及其追随者，或使他产生机会主义思想的人们，是有意选择了“国家”这个提法的。这样讲，模棱两可，留有余地，好使人们相信，他们是关心这些国家人民的命运的，但实际上，他们要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同资产阶级统治阶层合作。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言时宣称；“发展中”国家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在联合国（邓小平选择在联合国发表他的修正主义演说），所有国家都由其政府来“代表”，一般地说，这些政府都是和人民对立的，都几乎

没有什么例外地不是为这个超级大国效劳，就是为那个超级大国服务。毫无疑问，邓小平讲的“国家”，指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决不指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说在邓小平看来，“国家”指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根据就是他在联合国的整个发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后来的许多讲话，以及中国出版物根据他的思想所做的宣传。比如，他在联大的发言中，例举了一些会议来证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斗争，如“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显然，出席所有这些“首脑”会议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更多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半封建阶层，而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这个发言的另一处，邓小平也提到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斗争，他说：“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在另一段，他说：“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为了说明他上面所说的话和证明为什么在他看来“国家”就是“政体”的同义词，他紧接说到：“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工。霸权和势力范围”。在招待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宴会上，邓小平这样说道：“在我们两国建交三周年的时候，施密特总理来到我国”。毫无疑问，象这样的“国家间”的关系是和西德反动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和西德人民之间的关系。

中国出版物发表的所有赞助邓小平路线的文章也毫不含糊地认为“国家”就是“政体”的同义词。例如，《北京周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份第四十四期这样写道：“超级大国已不能继续控制联合国。在联合国，第三世界国家已占压倒多数，从而改变了这个国际组织的成分”。所以，对于邓小平集团来说，“国家”就是皮诺切特，班塞尔，魏地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其他法西斯军人，他们都向联合国派驻他们政府的代表。《北京周报》一九七七年十月份第四十三期有一篇文章写道：“一般性辩论（在联合国）事实上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对超级大国的揭露和批判”。另一篇文章写道：“中国同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并向这些国家提供她力所能及的援助”。肯定地说，给皮诺切特政府的“援助”和同它“合作”是和智利人民的利益毫不相干的。

更有甚者，邓小平不但认为他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它们的政府，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而且他还认为，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而是由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组成的这些政府，这些政府多是法西斯的，不是这个超级大国就是那个超级大国的走狗。的确，邓小平在同一个招待施密特的宴会上说道：

“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斗争，把世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原文如此）。就连赫鲁晓夫也还没有敢提出如此荒唐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这句载入史册……修正主义史册的论断，对“国家”和“人民”做了明确的区别，但目的只是为了把人民置于他们政府的“专政”之下，并把这说成是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更高阶段”的过渡。这样我们才知道，皮诺切特这个美国佬通过屠杀才扶植起来的独裁者，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忠实走狗，也把智利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邓小平时的确说得好：“他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原文如此）。而毛泽东同志恰恰提出了和邓小平相反的理论，他说“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干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

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人民是历史的动力，他总是向他们发出呼吁。一九五八年，他指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一九六四年，在支持刚果人民的声明中，他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僵鬼统统都会被消灭。”在谈到美国对多米尼加的侵略时，毛泽东同志指出：“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新的反美浪潮……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为组成这个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原文如此）：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力量，坚持长期艰苦奋斗，打败美帝国主义”（原文如此）。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三年反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声明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南方的声明，一九六四年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声明，一九六八年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都有类似的提法。一九六九年，他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也是纸老虎……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原文如此）。

在“二十五点建议”中，这样写道：“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其结果只能同它的愿望相反，只能得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

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此文件已预见到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接着就指出:“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

关于殖民地国家或受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为求得解放所应遵循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同志有许多著作,完全否定了邓小平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民族的解放,是一个被征服国家革命的结果,这个革命就是要推翻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势力,这些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支柱,是残酷地剥削人民,因而是反帝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对象。民族的耀放同样意味着下定决心用人民解放战争来对付帝国主义用武力来维护其统治的企图。在目前,这个解放斗争不可能在资产阶级,即便是反帝的资产阶级阶层的领导下达到目的。在亲帝国主义阶层、帝国主义的合作者或走狗的领导下,更达不到目的。我们在所谓“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里都能找到这些人,而在邓小平看来,这些阶层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能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的人民民主革命不能导致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独立,因为在殖民地或新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它不可避免地要同帝国主义联合和屈服于帝国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屈服于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

早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主革命作了广泛的论述,他说:“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国革命的两大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关于无产阶级在任何阶段都要领导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同志说:“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一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在他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他写到:“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一九六四年,在他领导下起草的“二十五点信”中,他谴责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宣扬(邓小平也如此)“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在这个文件的另一处,写到:“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又写道:“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写到:“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这本小册子中写到:“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象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然而邓小平却认为他的那个“第三世界”里的国家,已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这就否定了在每个国家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剩下要做的,只不过是在采取措施巩固经济独立的基础上,铲除帝国主义干涉的残余而已。在他看来,这一过程的“动力”是他的那个“第三世界”里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者半封建政府,这种政府里面有法西斯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走狗。实际上,邓小平集团想要干的,是阻止具有社会主义前景的真正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以便在最纯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行列里寻找他们这些修正主义贵族的资产阶级(甚至是半封建的)盟友,他们这些修正主义贵族要控制中国,要复辟资本主义,并把中国变成超级大国。在社会帝国主义或美国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国家里,仅仅希望把屈服于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资产阶级阶层从他们的主子那里拉出来,和他们结成盟友以代替两个超级大国,这种努力是为了在世界上建立他们的势力范围和霸权范围。因此,他们鼓动这些资产阶级阶层提出某些经济要求。这种战略,遇到的敌手和主要障碍,除了两个争夺着的超级大国,还有全世界的人民及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先锋。他们要从一切压迫、剥削和霸权之下

解放出来，奔向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却企图在中国扼杀掉社会主义。为了防止这种危险，邓小平否认殖民地人民或在新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是取得自身解放的动力这个角色，并要统治阶层扮演这个角色。通过外交关系，他和这些统治阶层鼻息相通，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与他们接触会晤。

为了在殖民地、新殖民地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寻找资产阶级盟友并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邓小平及其同伙精心炮制出来的这些反革命理论，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外交路线究竟有什么关系？企图把二者混为一谈，就是妄想大家都不分黑猫白猫。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出，邓小平和他所代表的“拥护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提出来一些尚未详尽说明的反革命的理论作为他们的国际路线。他首先就暴露了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顽固地要抹煞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性和作用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他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谈到中国和他的“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时，他说“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在出了一些经济方面的主意以后，他做结论说他们这样就能“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这样我们就看到，邓小平为了开脱自己，在肯定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又把中国和受超级大国不同程度控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他后来的一些提法，完全抹煞了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因为他否认在社会主义中国和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之间有任何区别，他认为这些国家，不用通过革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并象在中国那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发展”，就能够摆脱“贫穷”和“落后”状态。结论：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他把中国包括在内）不必经过革命也能获得同样的结果。他除了否定在中国进行的所有革命的意义以外，还向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国家推销“发展”计划，即“资产阶级发展”理论。这个理论，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长期以来玩弄的臭名昭著的老把戏。他企图说服人民，不要革命，只要老老实实地干活，也就是说忍受更大的剥削，就能摆脱“贫穷和落后”。

邓小平可耻地拒绝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企图以经济发展的程度为依据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表现出他蔑视和反对社会主义。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在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不是政权问题，不是国家的性质，不是生产关系，而单单是经济发展的水平。这样看来，如果中国继续高速度发展，按照邓小平的经济逻辑，既然经济发展的水平是区分国家的标准，那么，中国很快就能进入“第二世界”，很快就又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进入“第一世界”了。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并不是被压迫民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典范。这个典范与被压迫民族所遭受的殖民或新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根本不同。因为邓小平只想同政府中的统治阶层联合而不想同无产阶级和亚、非、拉的人民联合，所以他顽固地想使人忘掉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典范，忘掉社会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基本差别。这样，他除了诽谤社会主义，放弃执政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贬低无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以外没有别的。总之，他顽固地坚持干他过去在中国所干的同样勾当，用经济主义的词藻，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点，也就是“二十五点信”在揭露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时所说的一段话：“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矛盾。”邓小平走得更远了，他不但企图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内容”，他还企图抹掉社会主义阵营本身。他在联大的发言中说：“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当世界上只存在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列宁在讲到社会主义时指出：“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资本主义的旧世界，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它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怎么说的呢？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里，谈到唯一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修未背叛前的苏联时，他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的时代。”“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期，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一九三九年，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他说：“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已对社会主义有如此伟大的远见，难道这同邓小平把中国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同等起来和不再承认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的卑劣企图有共同之处吗？难道邓小平的态度，不就是他想在中国干什么的先兆吗？他要干的是：取消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此他曾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批判。顽固地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倒退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否认殖民地和新兴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所起的作用吗？毛泽东同志在对诸如邓小平此类立场作了英明的剖析以后，指出：“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我们以上所分析的邓小平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策略概括为“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理论是邓小平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路线的核心。在这个理论中，社会主义世界正好在默默中消失，正象我们刚刚所指出的那样，对邓小平及其一伙来说，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不重要的词。实际上，“三个世界”的理论只承认一个“第一世界”即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包含一系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世界”，和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后者的基本特点不是由被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国家，而是由“发展中”国家所组成。根据“三个世界”的理论，应当，而且需要团结“第二”和“第三”世界的一切力量，反对“第一”世界，也就是说反对超级大国。正如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早已提出的那样，这个理论是片面的、机会主义的、经济主义的、取消了一切阶级分析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它不是别的，仅仅是符合资产阶级口味的旧理论的翻版，这种理论只谈“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它使人们产生一种幻想，即认为既然是“发展中”的，就有可能得到“发展”而不必进行摆脱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枷锁的革命。“三个世界”的理论与它所反映的资产阶级理论相比较，唯一“新鲜的东西”是它承认存在着两个称为“第一世界”的“超级发达”国家。

“三个世界”的理论仅仅是从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划分和重新组成各国，而不考虑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性质和忽略适用于各国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方法是最重要的。用那种机械的、片面的、错误的划分方法，人们视而不见在殖民地国家，甚至于在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内有为超级大国的统治效劳的力量。一般地说，在所谓的“第三世界”里，这些力量掌握政权和统治着这些国家。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方法使人们不了解和美帝国主义结盟和有联系的垄断资产阶级阶层的反动作用。这些垄断资产阶级阶层往往就是帝国主义，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死敌。

邓小平鼓吹这一条荒谬的机会主义理论是与超级大国（实际上是其中的一个超级大国）作“斗争”的国际策略，根据这一理论，这些垄断资产阶级阶层被看成是“同盟者”。

至于那些统治着大多数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超级大国的走狗，邓小平认为他们不仅是同盟者，而且恰恰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

过去已多次证明“三个世界”理论（发明这个理论的骗子们竟胆敢说这是毛泽东的理论）的修正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因此，这儿不必多谈此点。必需讲明的是邓小平及其反革命一伙想通过这个机会主义的理论，来扼杀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扼杀“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以中国提供某些经济上和其它方面的保证为代价，建立它势力范围和霸权主义。

由此，他注意联合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资产阶级势力，促使它们逐步地断绝与超级大国的经济联系。

一些时候以来，中国出版物的一切宣传实际上是为突出和支持这些资产阶级阶层通过政府和所控制的其他机构而采取的所谓“独立的”经济措施。当这些资产阶级阶层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时更是这样。而对人民的斗争则几乎一字不提。

更有甚者，邓小平及其一伙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说成是“最危险的”、“最好战的”超级大国，其理由是它在瓜分世界中迟了一步，所以它“不得不争夺美国的地盘”，实际上，他们接受了美国的统治，在许多观点上，是支持和加强这种统治的。

这些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他们说：因为存在着苏联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和扩大统治的“燃眉之急”的危险，所以需要支持反对苏联人的政府和反动阶层，尽管他们是最大的剥削者和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这种统治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相当实际的和现实的）。

所以，应当加强经济和军事条约组织，如做为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垄断资本的统治工具的共同市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要这些组织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威胁。总之，要我们才接受和加强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对我们人民的现实的剥削和统治。为了避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可能的统治危险，而要我们放弃解放和革命。为了不让狼从窗户进来，就要我们同意老虎把我们的家毁掉。

邓小平及其集团感到受到了攻击，因而对拉美马列主义党的联合声明表示愤慨。因为《声明》在谈到超

级大国时说到，联合其中的一个去反对另一个，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这个提法能够成立，那又为什么要如此愤慨和花费如此多的力量来阻止这个声明的发表呢？

这个对立的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加强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削弱美国势力范围内的革命解放斗争的政策，就是在客观上借口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支持一个超级大国。

有人提出为同美帝国主义这种合作辩解的论据，认为这是正确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

然而，“二十五点建议”明确指出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与敌人联盟的界线：“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

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邓小平及其一伙支持拉美亲美政权（仅因为它们反对苏联）的殷勤态度是为了“更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吗”？当然不是！

或许拉丁美洲人民的根本任务不是确指推翻那些由美帝执持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和从这个超级大国具体而现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至于欧洲，当中国的邓派领导人支持和隆重接待那些号召加强资产阶级军队、联合垄断资产阶级，那些同法西斯组织（因为它们“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共同召开群众集会和支持北约组织及欧洲共同市场的“领导人”，诸如法国的儒尔盖、葡萄牙的维拉尔及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时候，难道他们是在加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吗？为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未来可能的统治而放弃革命、联合垄断资本集团、联合剥削其人民的超级大国，难道可以设想比这更为可笑的对无产阶级政策的伪造吗？

最为可耻和卑鄙的，是邓小平及其一伙硬要把他们作为中国的国际政策来推行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实用主义政策提到马列主义的“战略”高度；是他们力图收买和拉拢一些马列主义组织来支持这项根本违背人民利益的政策。这就难怪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西德总理在他访华期间，为使邓小平高兴和做成交易，要对邓小平说，北美同欧洲的大西洋联盟仍然是联邦德国的不变基础，欧洲共同体将一直发展到成为一支世界政治力量。他还说：“我们对贵国政府就欧洲共同体这种努力所做的积极的评价感到满意”。最为可笑的，是那些自称马列主义者的人们完全放弃了他们本国的利益和革命任务，变成了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人们所推行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中国政策的代言人。

“二十五点建议”指出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者的作用，“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它反动势力”。

这封信还说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有人宣称，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世界”的战略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主要敌人的统一战线的思想。然而，建立于阶级现实矛盾基础之上和永远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不能同邓小平想向我们兜售的荒谬而反动的观念混为一谈。

在邓小平主张的统一战线中，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应该听任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宰割，第二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应该同垄断资本集团和美帝控制的经济、军事机构站在一起，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带来的危险。

怎么可能在阻挠殖民地和新兴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来发展这样一个战线呢？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一文指出：“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对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做同样的分析。民族解放革命的对象必然是半封建的阶级或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这里不可能有一个既不是建立在各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基础上，也不同各国的基本革命任务相对立的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

邓小平及其一伙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词藻也同样完全篡改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战争、和平、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等等思想。

他们利用稍加装璜和具有欺骗性的提法，追求着同苏共领导相同的目标。后者曾竭力用核战争来吓唬人

民，阻碍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和新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以便自己渗透进去，实施霸权，而又不必同无产阶级和执政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相冲突。

既然同各国内部资产阶级反动力量相勾结的美帝国主义还统治着世界的大部分，那么邓小平破坏革命和民族解放、加强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各国的压迫工具，声称苏联侵略“迫在眉睫”的政策，同赫鲁晓夫用世界核大战的危险来反对革命的态度又有什么两样呢？

唯一的区别，就是社会帝国主义在（称霸）途中碰上了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它在扩展和加强其霸权的同时，鼓吹“和平共处”和散布核战恐怖。而邓小平及其一伙却碰上了二个超级大国，所以他们在欺骗人民的同时，支持帝国主义老虎去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狼。

实际上，邓小平及其一伙，竭力散布一场战争“迫在眉睫”的恐怖，根本不是要各国人民起来制止这个战争，而是要激励帝国主义及其盟国加强军备和各种军事条约。

但是，大家知道，加强帝国主义以及同其相连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主要地并且首先是针对被其压迫和剥削的各国人民。

邓小平及其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一伙鼓励一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继续加强军备，挑动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赞同这类措施，结果就是加强压迫和剥削的锁链。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的无产阶级的责任，从来就不是鼓动相竞争的帝国主义集团中的一个去加强军备，而是为捆住侵略者的手脚而动员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是推动革命、制止战争的危险。

无论是为了阻止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会永远存在的战争威胁或是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投身于战争和使战争转利于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考虑的中心问题，是使革命向前发展。在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责任不是使人民在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一边，而是象列宁那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政权的国内革命战争。

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这个问题说到：“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二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二十五点建议”同样包括了毛的这些思想。信中说：“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争取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而只是助长帝国主义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邓小平所采用的利用“不可避免”的“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的威胁政策，在中国并不是新东西。

蒋介石就曾为了相似的目的而采用过这种政策。

题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评论一评苏共中央致中共的公开信的评论之指出：“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在批判苏共领导战争讹作的这篇评论中，还揭露了同邓小平的论点完全相同的论点：“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 and 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这难道不是一幅中国修正主义分子

搞讹诈以及他们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准确而先见的画像吗？

邓小平既是赫鲁晓夫战争讹诈政策的忠实继承者，也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政策的忠实继承者。

在他要建立霸权和同超级大国争夺和资产阶级联系的地方，他就突出“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它国内政”作为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核心。

只要一个国家断绝同台湾的联系，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那就足以使该国政府可以对其人民犯下种种暴行而不必担心遭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人的揭瞳和批评，也不必担心其人民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得到爽快的支持。

对执行邓小平对外政策的人来说，他们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政府是否是由帝国主义通过最粗暴的干涉而强加给人民并由帝国主义操纵的法西斯政府这一点，是无足轻重的。

只要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一些政府在中国对外政策决策者的眼里，就可以不受谴责。

如对蒙博托这样的领导人，中国的刊物在邓小平政策之前，曾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刚果民族的“叛徒”，“人民的敌人”，“杀害卢蒙巴的凶手”，“美帝国主义的仆从”，等等，而他们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值得赞扬、超然于批评之外的人物。

然而，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同它有外交关系的政府所犯的罪行加以颂扬或保持沉默，而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群众组织也保持沉默。

而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否同中国有关系）的各种政治力量、新闻机构和其它一切部门，则都随心所欲地谈论中国的国内问题和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事情。

总之，邓小平及其集团至少是在对待美帝控制的阵营的问题上，把“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内政）”作为中国的对外政策，而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难道这是毛同志主张的对外政策吗？难道这是列宁在苏联所遵循的政策吗？毛同志本人在由他直接指导下写成的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评苏共给中共的公开信）一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文章说：“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

而邓小平及其一伙借“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内政）”为名，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是从其祖师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这种做法在他那里是习以为常的。

上述这篇文章说：“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要求’。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

文章在分析赫鲁晓夫的这一政策时又说：“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及其集团在鼓动加强美帝国主义和同其结盟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条约、经济条约和其它统治形式的时候，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在他默然接受美帝国主义为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方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而进行的粗暴干涉，对此既不揭露，也不谴责，也不支持各国人民反对这类独裁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做的吗？相反，这些由卑鄙的干涉而产生的独裁政府却获得了这种支持，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赫鲁晓夫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假和平共处不就是这样的吗？

文章还指出：“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及其集团所执行的，难道不正是赫鲁晓夫的国际政策中受到以毛同志为首的中共马列主义者所谴责的那些东西吗？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国家关系的唯一形式。他说：“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他不仅不提作为中国国际政策基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且也不执行上述这段话，因为他默许并往往赞同美国或其盟国的干涉。他最近对法国运武器给扎伊尔的态度就是这样。在关于智利的军事政变问题上，他对美国中央常报局的卑鄙干涉完全保持沉默，而后者自己已承认了这种干涉，并且在遭到世界民主舆论的广泛谴责之后，美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也审理了这件事。

此外，他把所谓“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升格为“历史的动力”、并优先同他们联合，这样，他难道不是在反对各国人民起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反对解放斗争的革命领导权吗？他在被称为“第二世界”国家中不也是这样干的吗？他号召加强美帝和各国垄断者用来实行其统治的军队和军事、经济条约。这不正是把“共处”和外交关系置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之上，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吗？

前面提到的中共评苏共公开信的文章还说：“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应包括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列宁说过：

“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邓小平似乎在国内不分白猫、黑猫，把反革命分子扶上台，而在超级大国问题上，却明确地加以区别，而这种区别则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他一心想同他们和平共处，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上面根据中国国际政策的文章和实践所作的全部分析，都明确表明邓小平及其一伙的国际路线同毛泽东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路线毫无共同之处，而是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反动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国际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几乎原原本本的翻版。

邓小平以及那些违背毛同志和中国人民群众的意志给他翻案的人会争辩说，这一国际政策在毛同志生前就已经开始执行，所以这是“他的政策”。但是，对于了解中国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了解修正主义力量曾是强大的、了解这个国家所经历的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人来说，这种论调毫无价值。

中国的人口占全人类的近四分之一，仅中国共产党就有三千多万党员。在中国，无产阶级路线同资产阶级路线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复杂过程的特点之一，曾经是人们所说的“独立王国”的存在，即那些长时期内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堡垒和活动领域。“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这个文化革命的口号正是针对这些堡垒和领域的。

以毛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能同时在文化、党、生产、教育、军队和对外政策等各条战线战胜由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支持的十分强大的敌人。但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在所有这些战线同这些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第：四十五期《北京周报》登载了题为《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文章。文章竭力粉饰邓小平修正主义的荒谬理论，尤其是力图把它当作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来贩卖。文章承认邓小平路线（当然被说成为毛泽东的路线）曾遭到反对。文章说：“在我国国内，也有人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那就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他们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反对我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反对我国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联合，反对我们对最危险的敌人的打击。他们妄图破坏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干扰我国的反霸斗争，以适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这段引语对其中提到的领导人的观点进行了不足为奇的篡改（他们今天已不能出来纠正了）。它表明，他们也反对过邓小平及其追随者的国际路线。这些领导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妻子）在文化革命以及在反对邓小平企图抹杀文化革命成果的斗争中同毛泽东在思想上完全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这封公开信中，我们阐明了什么才是毛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政策的原则一同邓小平在这个方面（以及在其它方面）所鼓吹的修正主义原则完全对立的原则。我们在阐述中，有的是直接引用毛同志生前出版的著作，有的是引用一致公认是在他亲自主持和领导下编写的公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献。

在他的著作和战斗文献中，毛同志认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治统治，通过帝国主义的走狗，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继续着；民族解放是置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结果，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工具的国内力量的革命的结果；民族解放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由无产阶级而不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通过资产阶级推动的经济解放的简单尝试来获得解放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在当代就是以无产阶级及其先锋政党为首的世界人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以及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就必须反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不能容许抹杀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矛盾的阶级内容，不容许在上述矛盾中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改变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前途，这个运动正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而不是向着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前进；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对外政策，其实质应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不是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服从和平共处，更不是服从沙文主义或霸权主义；通过各国人民的斗争，使革命向前发展，有可能避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必须坚决地既反对美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又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全世界人民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它们。

邓小平则相反，他提出，殖民政治统治已经基本消灭，现仅存殖民主义的“残余”形式；通过改变“国际经济关系”就能够“维护”并“巩固”独立；民族解放将是“第三世界”“国家”行动的结果，从根本上

来说就是指那些一般都是帝国主义走狗和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府。他提出，这些控制着“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资产阶级势力，不仅是民族解放的领导力量，而且是“世界历史的动力”；所谓“第二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同本国垄断资产阶级联合，加强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军事条约和其它统治工具，以对付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迫在眉睫”的进攻威胁。他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中国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属于“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基本是由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通过新殖民主义控制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和中国“同等”的“第三世界”国家能够以经济上的发展来结束“贫穷落后状况”，而不必进行民族解放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和平共处”政策，而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政策；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迫在眉睫的，这实际上就是推动美帝国主义的盟国加强军备、军队和军事条约，以抗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从而阻挠阶级斗争。所有这些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念，都是直接地由邓小平或由他的支持者们所阐述的，或者正如我们所阐述的那样，是从支持这条路线的宣传中、从中国对外政策所导致的具体行动中清楚流露出来的。

于是现在人们不禁要问，那些认为邓小平及其主子或门徒忠实执行了毛同志国际路线的人，是不是硬要我们相信毛同志朝三暮四，把自己的国际政策原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却又不留下书面的东西，而仅仅是向邓小平或和他的同伙们悄悄秘密地道出了这个转变？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是否硬要我们相信，毛同志公开反对赫鲁晓夫以及诸如邓小平这样的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国际路线，自己却秘密地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呢？他们永远也不会使我党相信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由于毛同志的政治指示曾享有巨大威望，由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他的热爱和推崇，他的敌人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和反对他的思想，就不得不“披上”他的思想的“红旗”，让人把自己当作是这些思想的忠实解释家。当毛同志同林彪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分歧（前已指出）的时候，林彪在人民解放军里搞的那个“独立王国”中不就是这样干的吗？过去，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它老牌修正主义分子，直到他们被文化革命打倒以前，他们在党内、在国家机器中以及在文化等战线搞的各“独立王国”中不也是这样干的吗？当时进行了持久的斗争（由于这些修正主义分子靠政变而重新掌握主动权，斗争仍将是长期的），在文革初期揭露和打倒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大量时间错过了，这些难道就意味着毛同志当时同意他们吗？难道意味着毛同志没有同他们斗争过吗？肯定不是。毛同志就多次揭露过他的敌人曾利用和滥用过他的名义，甚至摘引他的著作中的支言片语来反对他或反对他的。思想实质，毛同志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他的夫人江青同志的信中，就表示了他对林彪利用他著作的方法深为不满，他说：“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右派会利用我的这种讲话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后来他又对埃德加·斯诺说：“所有这些高呼万岁的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第三种人是伪君子”。从我们来说，我们相信，邓小平及其门徒就是这第三种人，是些伪君子。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邓小平就“官复原职”，每当他成功地混入政权时就在中国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背离在国际反修论战和文革这些最重大时刻所执行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都清楚表明，虽经过斗争，但是毛泽东同志及中共的马列主义者没能对这个对外政策的“独立王国”进行彻底的斗争并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及中共的马列主义者，不会给这个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毛同志逝世前不久因搞阴谋和反对文革成果而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以解释和完全修正他们的国际。政治路线的使命。

在了解了邓小平及邓小平集团的根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动的国际政策以后，我们党也不能接受毛同志逝世后出现的这样一种说法，即你邓小平以及那些因狼狈为奸或因心怀恐惧而支持你的人，在此时此刻的中国代表了毛的思想和人民的利益。对于我们，这是很清楚的。毛同志昔日的预见不幸变成了现实。他逝世后，“右派当权之时”，举起了反革命的“黑旗”。你们所干的，就是右派政变：你们提升了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首脑，在最近的代表大会上清除了中共上届中委的一半多，粗暴地镇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的马列主义领导人以及反对你们篡权的群众。

毛同志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时曾强调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邓小平就曾是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最重要的头子之一，因而在文化革命中被打倒。毛泽东在谈到邓小平一类人物时进一步指出：“他们是些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我们同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后来，邓小平装出一付要转变其修正主义立场的样子，做了个自我批评，信誓旦旦地说：“永不翻案”，尊重文化革命的原则和成果。这样，他和他的那帮门徒就被看作是“已经改悔的人”而重新一步一步地混进了党和政府、军队的重要岗位上去。一九七三年四月，邓小平首次在一个公开宴会上露面；不久，他就重获

原先的副部长（原文如此）职位；同年八月，他又被恢复了中央委员的职位；一九七四年，他已混入政治局，负责整顿军、队的工作，同时，又恢复了他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职务；同年四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发表了他关于国际政策的修正主义论点。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月，在毛主席没有出席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并在周恩来总理生病后，他实际上担任了总理的职务。居于这样的高位，他自认为已强大到足以可能攻击文革的成果了，虽然他虚假地许诺过要尊重文革的成果。他起草了下列文件来反对这些成果：《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所有这些文件以及他进行的其它坚决反对文化革命的修正主义活动都遭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及人民群众的反对。邓小平的攻击目标，就是反对中国无产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竟敢篡改毛泽东的指示，宣称：“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就必须抓住这个纲”。毛同志很快揭露了这个修正主义方针，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直接针对邓小平的态度指出：“他发誓一千次要改正错误，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他还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还指出：“他这个人（邓小平）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他代表资产阶级”。

毛同志坚定地站在反对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刮起的新的“右倾风”的斗争前列，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一九七五年初，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运动。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同志的这些指示及其它指示，掀起了一场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的深入的群众性学习运动和在中国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群众斗争运动。正是针对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加强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阶级斗争的这一号召，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子邓小平开始了疯狂的活动。

他们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陷于绝望，终于策划和挑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这次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毛同志的要求，“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公报指出：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转变为对抗性矛盾”。中国报刊指出，“成千上万的群众和军人”庆祝和支持这项决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另一方面，华国锋在毛泽东同志的追悼会上指出：“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前进。”

毛同志逝世后几个月，他们就破坏了他们伪称尊重的毛泽东的一切决定。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他们改变了上届中央委员会一致撤除邓小平职务的决定，而恢复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和正式职责。与此同时，毛同志在反对邓小平及其追随者斗争中的那些亲密战友，却遭到了卑鄙地诽谤、镇压并被“永远开除出党”。

之后，他们在中共十一大的公报中硬要人相信大会强制做出的那些决议，特别是对毛同志的最亲密的战友的镇压，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以及永远结束文化大革命，都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决定”做出的。更有甚者，他们说：这些镇压措施“宣布了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呼犁结束”。确实，你们的厚颜无耻和你们的卑鄙行为是有限度的！在毛同志逝世后，你们就污辱他，你们就嘲弄他和他的思想，嘲弄他过去和后期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反对邓小平的决定。事实上，你们以为我们这些已经知道毛同志生前的指示和决定，特别是撤除邓小平职务的决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些蠢人，你们以为我们会奴颜

卑肿地跟着你们被动地接受这样一个如此前所未闻的骗局。这样，那些毛同志称之为的“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那些反对“马列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那些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垂死斗争”的人，例如邓小平和那些不管是出于懦弱还是出于内在的反动信念而支持他的人，就都是“毛同志的路线和决定的执行者”了，还有那些在毛同志逝世后，把他们一直拼命反对的文化革命引向“胜利结束”的人，都是“毛同志的路线和决定的执行者”了。确实，你们正在超过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他们也自称是列宁的接班人。那些资产阶级报刊的评论员都没有相信这种谎言，他们毫不迟疑地把你们的行动说成“毛泽东的思想的失败”，是“背叛文化革命”，你们可以相信，他们对此是感到兴高采烈的。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进行的斗争和所取得的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并由于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而进行的所有这些斗争，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财富。我们绝不容许暂时篡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分子沾污它、歪曲它和毁坏它。

特别在目前，当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得知由于象你们这一类的修正主义分子复辟了资本主义在那些假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而处于混乱之中的时候，当那些反动力量利用这一背叛来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把这类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保卫毛同志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率领群众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斗争。要在占人类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中巩固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切实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在上层建筑中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习惯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使广大群众掌握国家大事，推翻修正主义官僚所建立的“独立王国”，这是要做出巨大努力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发生的悲惨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文化革命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党认为，文化革命所要孤立和打倒的那些敌人的凶恶的、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今天已经可以看清楚了。今后随着他们的行动对他们的揭露，将会使人们看得更加清楚。

我们党，智利革命共产党决心在为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朽成果、保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暂时控制中国政权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是微小的。

我们相信，当前反对中国修正主义者及其门徒的斗争构成过去已经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操纵者的斗争的一个新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列主义者在下述文件中曾告诫我们：“苏共领导人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一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斗争。坚持原则同坚持团结是不可分割的事情。”他们还提出了如下三条结论：

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同坚持原则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列宁也说过：“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把情况弄清楚，不把情况弄清楚，就不能顺利前进，就不可能有巩固的统一。目前正在进行斗争的人决不会破坏统一。因为统一已经没有了，被全面地破坏了……公开的、直接的斗争是恢复统一的一个必要条件。”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这场斗争能真正使问题得以澄清，能使我们更好地弄清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并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同它进行斗争。

面对这一新的修正主义潮流，我们中央委员会根据全体党员的意见，一致决定，断绝它同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通过政变而篡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集团的党的关系并决定公开同它进行斗争。

我们不是同中国人民、也不是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而是同违背他们的意愿并违背毛同志的愿望、使用暴力和反革命阴谋暂时篡夺了中国政权的人们断绝关系。

我们坚信，你们的高兴是不会长久的。我们完全相信毛同志。在一九六六年给他夫人江青同志的信中所说的话，这些话指出了你们的前途将是什么：“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智利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于智利圣地亚岛

五、秘鲁马列主义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声明：三个世界的反革命理论和实践

（一九七八年六月）

秘鲁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面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新翻版，即所谓“三个世界”理论的出现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因为这种修正主义通过强大的宣传手段，一直在整个革命运动的内部，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肆扩大其反革命活动。我党曾经屡次谴责“三个世界”理论，尤其是一九七六年签署的拉美各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共同声明”和我党政治局的声明，都强调指出阿尔巴尼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并谴责了这个“三个世界”理论，认为必须对这个十分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分析，揭露其修正主义实质。

首先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虽然我党基层组织普遍反对“三个世界”理论，但却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全国领导机构还不应正式表态，要正式表态需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我们认为如果是在某些方面改变党的政治路线，或修改有关秘鲁革命命运与党的本身结构的决议的话，那么当然就要进行全国协商。至于“三个世界”理论，党从没把它作为党的政治路线的一部分在秘鲁予以贯彻，更没有将它视为马列主义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因此当这个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出现和散布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党的全国领导机构对已在国际共运中引起的大论战表示自己的意见。

二、秘鲁马列主义共产党遵循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并将它运用到秘鲁革命的具体实际。我党在一九六五年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发展了马利亚特吉的革命遗训，目前正是这条政治路线引导我们斗争。

党的全国领导的职责之一是不妥协地反对各种错误观点，反对损害马列主义科学的修正主义倾向，同样，也反对党内其他种种错误倾向。正因为这样，党一直坚定不移地在各个领域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托派，总之反对所有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同样，在党内，从一九六五年制定我们的革命政治路线以来，已展开过同何赛·索托马约·佩雷斯集团为代表的本国修正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同伪装“左”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机会主义堕落到产生“红色祖国”集团；同声称继承“马利亚特吉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所谓“光辉道路”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同“红星”无政府托洛茨基主义思潮的斗争。从基层到全国领导，都一直在进行这种富有成效的斗争。在上述种种错误倾向被所有基层组织批判后，就没有必要再召开一次全国协商会议了。

三、我党一直在广泛散发关于国际共运大论战的文件，因此不能责怪全国领导机构仅仅散发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文章。马列主义不惧怕争论，因为她是由科学真理武装起来的，并且得到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的支持。党的基层通过阅读和自己的分析，有机会对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不过应当提醒一下：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结合革命实践进行阅读和分析。

“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

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逐步形成的，当时人民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享有国际威望，因此这个理论最初的表述（近乎于简单的提法）没有马上引起反对，只是在某些马列主义兄弟党内有分歧。尽管如此，没有引起公开争论，以为在双边会谈的基础上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反对这样的会谈，而且相反越来越加紧宣传“三个世界”理论，同时还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主要是这种活动触发了论战并使中共自我暴露。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的总理周恩来同志向中共十大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就说：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九七四年邓小平在向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演说中系统地阐述了这种理论；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下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

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继续说：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他还说：“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北京周报，1975年1月29日第五期）

有人认为所谓“四人帮”是反对“三个世界”理论的，然而应当记得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四月设宴欢迎突尼斯总理时曾说：

“在国际事务中，突尼斯政府反对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为阿拉伯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反霸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当前世界形势越来越有利于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人民，而不利干争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北京周报1975年4月16日第十五期）

华国锋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

“毛主席一九七四年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毛主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改组，以及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对当代世界的战略态势作出科学的概括。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最深，反抗最烈，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社论，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世界”的机令主义和反革命理论。。

这篇文章说：

“当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积极准备新的战争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和它们的战争政策，推动世界革命前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这篇文章还说毛泽东一九七四年二月向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讲了下面这些话、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系统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人，认为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五卷）中对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动事件的评论，是这个理论的前导。上述文章说：

“毛主席当时指出：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一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

又说：

“不难看出，毛主席在这里关于三种力量的分析，正是后来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前导。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由于当时还勉强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而到了后来，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彻底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苏联复辟了资不主义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还存在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过去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历史条件也没有使重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必要。”

总之，在系统地阐述了极为有害的“三个世界”理论之后，这个理论的辩护士们就散布关于革命、及战争与和平的机会主义观点。他们在结尾时说，这个理论得到“一切反对超级大国的力量的重视”。这是因为：一、它给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以巨大的信心；二、这个理论给第三世界广大的人民和众多的国家以巨大的信心，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巨大力量；三、给第二世界国家一切力图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威胁下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的政治力量指明了出路。“归根结底，这个理论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符合于世界政治的客观现实，而且照亮了人类美好的未来。”

“三个世界”理论否定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企图解除劳动者的武装

坚持“第三世界”各国“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力量，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的谬论的那些人，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他们曾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

其实，贩卖这种谬论的人只讲“第三世界”或“第二世界”或“第一世界”的国家，根本不提冲突中的社会各阶级，也不提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众所周知，在所谓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各国中，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结构占统治地位，其政治和经济权力掌握在剥削者手中，他们不仅剥削和压迫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阶层，而且同时也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和人民，使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同时，所谓“第三世界”的各国，一般说来，处于双重压迫之下：一方面受到“第一”和“第二世界”各国的压迫，另一方面受到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的、半封建的统治阶级的压迫，由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依附关系，这些统治阶级同所谓“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有密切的联系。这个理论的某些辩护者认为，“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这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上述国家的大多数政府是由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分子组成的寡头势力统治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占优势，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也是屈从于帝国主义的。

由于认为“第三世界”各国是历史的动力，中国机会主义者及其在国际共运内部的追随者，就否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这些修正主义者来讲，残暴的法西斯独裁的代表、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工具皮诺切特、魏地拉或是伊朗国王谁执政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谬论，即把掌握政权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的统治阶级同被剥削的人民一起说成是“革命的动力”。我们记得我国无论是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还是莫拉莱斯·贝穆德斯一向都暗示秘鲁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甚至还认为是“第三世界”的“领袖”。否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会导向何处？

将会导致：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在他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书中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矛盾只有两个对立面，没有“第三面”。毛泽东自己也在《矛盾论》一书中摘引了列宁以下一段话：

“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摘引自《谈谈辩证法问题》）

列宁在这篇著作中，还指出这样一些矛盾：

- “在数学中，十和一，微分和积分。
-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毛泽东就摘引到此，但是接着引文读下去（见著名的《哲学笔记》）我们就看到了以下这段话：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在这里并不太重要。在一定的意义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在世界的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发展和蓬勃生活中认识这些过程，就要把它们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

唯物主义辩证法不仅用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且也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社会本身也是一种受矛盾和对立统一法则支配的现象。要是同意世界或者社会一分为三是科学的话，那么就无法运用辩证逻辑了。因此从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看，“三个世界”的理论是荒谬的。

2、否定当代的基本矛盾，把这些矛盾仅仅归结为一个矛盾：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一方同“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各国为另一方的矛盾。这是由三个世界的机会主义公式得出的实际结果。按照主张这个理论的人的实用主义观点，这一矛盾最终将归结为以社会帝国主义为一方同以世界其余各国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为另一方的矛盾。

按照马列主义的看法，当代世界有下列矛盾：

- (1) 两种对立的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 (2)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

(3) 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4) 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

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一文中曾正确地指出：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九六五年北京外语版第七页）

人们可以看出，一九六三年中国共产党坚持了一种正确的观点，包括对上述矛盾的排列顺序。然而，现在中国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劳动同资本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连提也不愿提了。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3、否定现时代的性质和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作用。列宁明确地指出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国际范围的阶级分析，得出了这个结论。这就是说，他考虑到了：“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中国修正主义者为什么不考虑资本与劳动，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呢？十分清楚，因为他们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当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历史上最深刻危机的时刻、正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作为斗争的领导力量起主导作用的时候，把这种矛盾抛弃在一边，就是使劳动人民放弃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讲得非常好。他说：“世界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事业不单单是一种愿望和前景，而且是一个已经提出来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列宁总是把无产阶级作为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动力和领导力量，正如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的：

“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但是进一步加强这种联合，完全要靠我们今后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小市民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4、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其他进步力量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其实，三个世界理论的发明家们的所作所为，即无耻地支持以亲帝的法西斯政府如皮诺切特、魏地拉和伊朗国王的政府以及其它由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们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并用最华丽的辞藻加以赞扬，表明他们寻求的仅仅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尽管他们在口头上也讲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支持同美帝国主义结盟的政府并把这些国家的人民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这一事实表明，如此反霸斗争只不过是一种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斗争。这就是说，“三个世界”理论的维护者实际上是依靠一个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来反对或摆脱另一个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及为了谋取他们自己的私利而严重损害世界革命。

中国修正主义者歪曲列宁的思想来为其“三个世界”的反动理论辩解

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这篇文章中说：

“列宁不是把世界上的国家简单地分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类。相反，他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国家分别划分到三类国家里：一类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战败国，一类是保持冻来地位的国家，一类是享受瓜分世界利益的战胜国；同时，他把社会主义的俄国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放在一类里。”文章接着说：

“从列宁这里应当学会些什么呢？我们至少可以学会：应当象列宁那样，热烈欢呼和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把它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国际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把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新的三类，并且从国际无产阶级和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第三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看到世界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完全和绝对的保证。”

让我们看一看，列宁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我们分析一下这篇文章所引的那段不完整的语录。那是列宁在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所作的共产国际形势的报告。实际上，列宁说：

“这就是帝国主义大战后世界状况的轮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十二亿五千万，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因战败而沦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二亿五千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陷于依赖美国的地位，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是居民不到二亿五千万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瓜分世界的利益。全世界的人口总数是十七亿五千万。我提醒你们注意全世界的这种情况，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了对第二国际作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主席同志讲到了这一点）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在这段话中，首先列宁只讲了一个世界，而不是三个世界。他讲的是“全世界的状况”。他明明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世界，因为在他的报告中研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其实他在同一报告中说：一九一四年大战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总共有十亿人口，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增加了二亿五千万，战争把二亿五千万人口“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把俄国约一亿三千万的人口，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不下一亿二千万的人口置于这样的境地”。列宁所指的十二亿五千万人是前面的十亿人加上后面所说的二亿五千万人。按照中国修正主义的看法，所有这些组成列宁所说的三种类型中的一类的国家构成了“第三世界”。但是在这十二亿五千万的人口中，包柄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十亿人，也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的二亿五千万人口，可是，目前这些国家被称之为“第二世界”。列宁还谈到了保持原来状况的拥有二亿五千万人口的各国，然而所有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依附于美国。按照“三个世界”理论，这些国家应属于哪一个世界？可能，‘’要把其中几个国家抽出来，放在“第三世界”中，而把另一些国家放在“第二世界”中。最后，列宁讲到的二亿五千万人口的那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瓜分世界的利益，这就是美国（被称为“第一世界”）、日本、英国和其他被认为是“第二世界”的国家。可见，“三个世界”理论同列宁的话是对不上号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他们为了支撑其“三个世界”的理论，完全歪曲了列宁的话，因为列宁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国际形势。也就是说，他们除了歪曲列宁的话外，还不顾时间和地点加以引用，不考虑在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中国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分析列宁在共产国际的报告全文。在这个报告中，列宁继续阐述了自己的提纲，他说：

“第一、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各种现象出发。”

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选集》第四卷）

列宁的这番话同他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内容是一致的，这篇文件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四日，在该《初稿》中他写道：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斗争的自觉的代表者，它根据自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揭露其虚假和伪善的基本任务，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而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谈到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者是前者的附属国。由此有人也想找到三分世界的所谓依据。但是列宁的整篇文章告诉我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一部分。在这本着作中，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这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实行统治时，通过直接的方式（如在殖民地国家），或间接地利用为它效劳的当地执政的统治阶级（在半殖民地国家）强行实施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政治统治。

由此可见，列宁并不想把世界分成三个，而是在考虑到各阶级和它们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些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对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进行了基本的划分。一九二〇年，他

在讲到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时，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把当时世界局势描绘为几类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这种描绘被“三个世界论者歪曲得不成样子”。）接着，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在其中说：“但遗憾的是，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日世界，它虽已混乱不堪，却永远不肯退让；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它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

在我们所批驳的这篇文章中，“三个世界”的信徒自己在第六页中也引用了列宁这段话，但是引的不全，同时他们又引用了斯大林的言论：“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他们玩弄文字游戏以“证明”列宁和斯大林已经暗示世界分为三个。他们为什么要歪曲列宁在一九二〇年讲的那段话？他们为什么不以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底讲的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说法为依据呢？恰恰是因为他们蓄意歪曲列宁和斯大林的论点。

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属于“第三世界”的谬论

这本小册子在第五十三页指出毛主席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之后说：

“中国宣布自己属于第三世界，这正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正是中国坚持列宁主义原则的表现。当列宁把俄国同殖民地被迫民族列为同一类国家的时候，难道可以说，列宁这样做，就动摇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吗？恰恰相反。”

这里应该提到一个含糊不清的地方，这就是：“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谈话”对谁讲的？在什么场合？毛主席把这些话写出来了吗？这个含糊不清使人发生怀疑和混乱。毛主席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唯一可供判断的材料是：在毛主席生前的好几年内，就提出了有关“第三世界”的这些论点，从来未见他反对过“三个世界”的理论，也未见他反对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说法。

列宁从没把俄国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列为一类。为什么他们连一句话也引不出来呢？恰恰是因为列宁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相反，他依据阶级的经济分析，指出社会主义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先锋。在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曾说：

“愈往后，我们愈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被压迫劳动者的利益了。……到处都有了无产阶级的部队，虽然有时组织得不好，还需要改组。既然各国的同志们现在都支持我们组织一支统一的大军，那末任何缺点都阻碍不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往后又写道：

“我们提纲中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个问题谈的是世界上某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俄国处于维护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与这些国家同属一类，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同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修正主义者为了证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也歪曲了列宁的思想。这表明，为了搞这种荒唐的分类，他们不进行阶级分析，不具体地研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而是苦心撰写文章，借口组成一个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广泛统一战线，归根结底是放弃为世界革命而斗争。

把人民中国列入“第三世界”也是另一论断的结果，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存在过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已不复存在了。”这样，他们不费力气地把社会主义从他们的图表中抹掉了。对他们来说，好象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列主义旗帜的，坚持一贯反对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其它反动派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已不存在了。

说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不单单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即使只存在于一两个国家，如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也好，而且是由于社会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普遍愿望。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反对社会主义，他们不仅想摧毁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阻止在人们向往和要求社会主义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社会主义阵营是客观存在的。

“三个世界”的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是一种沙文主义的观点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一种极端的机会主义，它竟然美化美帝国主义，伪造马列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它认为，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处于守势（后者则处于“攻势”，最富有侵略性和危险性），而且甚至处于“被动”状态。

尽管“三个世界”理论的拥护者们认为“苏美两家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但

“苏联是世界大战最危险的策源地”。他们断言，“我们如果仍然把两个超级大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仍然不指明苏联是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动者，那就会麻痹世界人民的革命警惕性，淆乱反霸斗争中的首要目标”。

正确地指出主要敌人是正确地制定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基础。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

“事实，具体的行动和客观现实向我们表明，当今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历史上最大和最危险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强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不管是分开还是在一起，在同样的分寸和同等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主要敌人，是维护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最大力量，是把人类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危险。”

说两个超级大国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已经不够，接着又说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反霸斗争的主要目标”，这就更加糟糕了，因为这样就开脱了美帝国主义，把它排除在革命斗争的主要目标之外。如果不把两个超级大国，无论从整体或者把两者分开，都看做是主要敌人的话，那么就会借口反对苏联这个唯一的主要目标，而保护美帝国主义。

认为美帝国主义处于守势，这就等于否认美帝国主义依然是世界反动派的头号宪兵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堡垒，因此它已改变了霸权主义的侵略的本性。“三个世界”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

“现在，美国仍然竭力在世界各大洲保护它的既得利益。它要保护的东西太多，因而战线太长，正如毛主席所说，‘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在战略上陷于被动”。

美帝国主义在战略上陷于被动，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呢？这只能意味着它已经改变本性，已经不再是剥削者和侵略者了，因此，不要去注意它，只要去同“主要目标”苏联做斗争就可以了。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这就是在美帝国主义面前解除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武装，尽管美帝国主义依然是头号的剥削者，头号宪兵和战争的经常的策源地。

具体的现实表明，美帝国主义远没有改变本性，它仍然是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它为了征服世界人民和民族，有时利用政治欺骗，有时使用暴力。他们为了掩饰其统治而使用的新殖民主义手法是人所共知的。仅就一九六八年军事独裁政权上台以来秘鲁的具体情况，我们就可看到，美帝国主义加强了它的剥削和统治地位。秘鲁欠外债近一百亿美元大部分是从美帝国主义那儿借来的，有的是以美国政府直接贷款的形式借来的，有的是以美国所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贷款的形式借来的，有的是向美国私人银行借的。最近几年，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露骨地左右着军政府目前的政治经济政策。这是非常明显的。美国通过一系列由它泡制的国际条约把秘鲁同它拴在一起并使秘鲁在军事上也从属于美帝全球战略的需要，这点更不必去说了。秘鲁劳动人民一直遭到美帝国主义者接连不断的经济侵略，怎么能相信美帝国主义陷于被动呢？

关于战争问题，“三个世界”理论的拥护者坚持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沙文主义、机会主义观点，并想把中国变成第三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他们利用两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搞讹诈，然而，世界大战的主要危险又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要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最终也要把美帝国主义包括进去。这就是说，中国修正主义者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联合，而实际上正是美国对大多数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大多数是反人民的，反动的，它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同美帝国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要弄清战争问题必须依据列宁的论断。列宁指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研究每一次具体的战争”。所以，他把封建时期的战争同揭开伟大的法国革命序幕的“进步战争”区分开来。这些揭开法国革命序幕的战争有着进步的特点，因为它们把人民和民族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是，列宁说，当资本主义到达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就变成了各民族的最大的压迫者。在研究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时候，列宁写道：

“社会党人应当利用这些强盗间的斗争，以便把他们一齐打倒”。他指出：“这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正是垂死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府为压迫其他民族而进行的战争特点”。（引自列宁著作“社会主义与战争”）。

中国修正主义者企图把当今的世界形势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处的形势相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研究过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在欧洲进行的各种进步战争。“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本小册子说：

“一八九一年，当德国受到俄国侵略的直接威胁时。恩格斯写道：“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在战争威胁加剧的时刻，我们可以向政府表示，我们准备支持它反对外敌——如果给我们以应有的对待，使我们有这样的可能，其条件是，政府要用一切手段，包括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进行战争。一那时，将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保持我们已经赢得

的阵地和未来发展的可能的问题。”

他们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语录，是文不对题，其目的是要搞乱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思想，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在当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我们引用了列宁的原话，再来看看列宁是怎样解剖沙文主义者的：

“谁现在援引马克思对进步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恰恰针对反动的垂死的资产阶级时代、针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

中国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策完全可以用列宁的这些话加以概括：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思想内容是一个，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本国”政府渡过难关，而不利用它的困难进行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社会主义与战争》）

目前，中国的整个对外政策都是要说明“不可避免”的未来世界大战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而没有考虑到未来的战争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即互相争夺的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它们各自奴役着一些所谓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条件，来谋求世界霸权。比如，美国和苏联各自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作为它们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军事工具。另外，美国和苏联利用同这些军事组织相类似的欧洲共同市场和经互会，对在它们各自势力范围内的人民进行经济搜刮。这就是说，无论美国还是苏联在所谓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中都有着各自的后方。例如秘鲁，按照中国修正主义的格式可能属“第三世界”，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继续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在美洲大陆也有着自己的军事防御体系。正是这些关系把秘鲁同帝国主义拴在了一起，秘鲁海军每年都在美国舰队的指挥下同美国舰队一起搞联合演习。至于美帝国主义者负责训练秘鲁反游击战的特种部队，这就不必说了。和秘鲁一样，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也被同一条锁链拴在一起。请想一想，“三个世界”理论的拥护者早在毛主席生前就谈论着这些由美帝的嗜杀成性的走狗们领导的国家所开展的反霸斗争。

任何诡辩也掩饰不了中国修正主义同美国以及追随它的反动政府之间实际联盟和勾结。他们说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沙皇制度和现代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相似，无非是要为自己的变节行为进行辩护，因为他们对霸权主义大国的立场是片面的，即只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看成是“主要危险”和“主要目标”，而说美帝国主义陷于被动。他们否认美苏之间将发生的战争是反动的，并掩饰这一战争，说它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

关于这一点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他说“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他还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样战争一旦爆发，全世界人民就要用革命的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应该有所准备”！

这些论断同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论断有多么大的区别！当谈到战争时，邓小平和华国锋利用战争进行讹诈，使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更紧地套上帝国主义的枷锁，但是他们从其沙文主义的实用主义出发，也想捞到好处以便使他们变成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来破坏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他们向全世界人民说，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已迫近”，主要是为了阻止世界革命。这同上面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答复苏联修正主义者的信，即“二十五条”是相违背的，那封信说：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现在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这个观点同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断是相吻合的，同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阐明的具体思想也是一致的。但是，“三个世界”理论的维护者背叛了这些正确的观点。现在他们认为“世界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们还说世界战争已迫在眉睫。”他们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并号召搞无原则的联盟，忘记了世界革命。

列宁教导说，首先要确定每个历史条件下战争的性质。可是，中国修正主义者却利用托辞，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进行类比，根本不管当时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而这也是列宁谴责过的作法。比如，他们把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前，对富有侵略性的沙皇帝国所采取的态度作为托辞来用，现在他们又拿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策略，拿组成反法西斯阵线，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国这一情况作类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此其间所执行的策略，我们的看法如下：

1、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尖锐的危机，但同时出现了几个帝国主义强国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两种制度的矛盾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因此，美国、英国

和法国帮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的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东山再起。当一九三三年纳粹分子上台时，他们出于对威胁其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并为希特勒的反苏宣传而兴高采烈，就鼓励德国的重新武装。他们把德国当作了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击队。与此同时，它们还庇护日本、意大利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于是满州里，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实际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战胜国的赞许和支持下，落入了法西斯魔爪之中。

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并指出危险正在降临到欧洲和全世界人民头上；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根本不管苏联政府的警告，相反地继续唆使纳粹德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九三五年，苏联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定了一项条约，尽管法国给条约加上了局限性，最后它还是把这个条约废除了。一九三七年，在一次同希特勒会见时，英国吹捧希特勒反共有功并答应把格但斯克，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他。这样，希特勒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赞许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占领了奥地利。英国，法国和美国还继续鼓励希特勒向苏联扩张。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总理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满足了纳粹分子的要求。在这同一天，英德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声明，因为英国确信法西斯侵略会指向苏联，而对英国的威胁已减轻”于是他们就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制定了如下的策略：继续争取和平，制止战争挑拨者的行为，加强本身的武装力量和加强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革命的友谊关系。

与此同时，希特勒继续东进，威胁波兰，索要立陶宛。一九三九年四月，意大利法西斯部队侵入阿尔巴尼亚，遭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的抵抗。

斯大林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曾试图同英国和法国签定政治和军事条约；但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耍两面派。甚至波兰，它尽管受知德国的威胁，还是破坏（苏联）同英法缔约，因为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是反苏的。这样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侵占了波兰。这就迫使英国和法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对德宣战。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采取了行动，派红军占领了被波兰在一九二〇年无理吞并过去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还采取了旨在保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一带和芬兰一带社会主义边境安全的行动。

一九四〇年四月初，纳粹分子进攻丹麦和挪威，准备侵占英国然后再进攻苏联。同年五月，希特勒占领了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侵略苏联。

2、由于苏联的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发生了变化。由此战争就具有了进步和保卫祖国的性质，其目的是维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因为当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坚持了马列主义立场。尽管应纳粹分子自己的要求，希特勒同苏联在一九三九年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他还是对苏联发动了进攻。有人大批斯大林这一策略，但历史证明这项条约是正确的，因为它使苏联争得了一年半多的时间来准备战争。关于这项条约斯大林本人在战争期间就说过：

“我们同德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获得了什么？我们保障了我国一年半时间的和平环境，赢得了准备力量来击退德国法西斯的时机，因为尽管有这个条约，也有进攻我国的危险。这对我们显然有利而对法西斯德国不利”。（斯大林：《关于苏联的卫国战争》）

后来的事情我们大家都一清二楚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进步的民族的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所采取的组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但，这一策略丝毫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正相反，按照列宁的观点，利用战争这一时机开展革命的斗争，结果，许多国家在打败法西斯之后甚至就在战争期间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另外一些国家则摆脱德、日、意法西斯的统治，宣告独立。

3、目前的情况则不相同，因为，昔日的社会主义苏联，由于现代修正主义使它复辟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新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大国。斯大林逝世后的这一迅速的演变过程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参加了瓜分世界的争夺，把世界分为各种剥削和新殖民统治的范围，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截然不同的新局面。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尖锐的矛盾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矛盾，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两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在发展和激化。这两个帝国主义都把各自的卫星国集团纠集在自己的影响和统治之下，并把它们（那些叫“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绑在各自的战车上。所有这些国家的政权都掌握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性质将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掠夺的全面破坏社会发展和民主的战争，其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做为制度根除掉，并消灭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及社会解放运动。因此，所要采取的策略不能同伟大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对付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形式—法西斯主义所采用的策略一模一样。

4、“三个世界”理论的辩护士们歪曲了战争与和平问题，他们辩护说，未来的世界大战（他们认为已迫在眉睫）会引起许多民族战争，即民族独立的战争。但是，从他们的论断中可以得出：这些民族战争将都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他们歪曲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所说的话：在当时仍然可能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

战争。确实，列宁说过：“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

他们在引用了列宁的另一些语录，如“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之后，又引用了毛主席（一九七三年九月）对西欧国家的政治活动家说过的话：“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但是，为什么这段话只提苏联呢？西欧各国人民程度不同地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它们当中的好些国家甚至还有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和部队，为什么忘记了这一事实？为什么说民族战争将仅仅是针对苏联帝国主义的？难道说受美帝国主义奴役的二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民族不应该反对美帝国主义以便获得自身解放？为什么只告诫他们去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似乎他们已经自由了。美国人在西班牙甚至有原子基地，这又该怎么说呢？事实是，你们只想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而维持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的现状，不能触动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来看，从这一战争具有进步性、具有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自由与进步的性质来看，斯大林所采取的策略，不能作为修正主义者的遁辞，不能替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和二等或者说“第二世界”的帝国主义者相勾结来辩护。目前的历史环境不适宜同美国以及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资本主义成员国组成阵线，因为他们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指挥的集团一样，也是一个侵略性的集团。不管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集团，它们的战争目标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所开展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所以，两个超级大国准备的战争是极反动的战争，因为两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有着反动的国际政策。

“三个世界”理论的辩护士们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公开信，列宁在这封信中写道：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每个个别情况下，特别是对于每一次战争，都应当确定它的政治内容”。

“但是，怎样确定战争的政治内容呢？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策的继续。现在这场战争是哪种政策的继续呢？它是不是从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唯一代表法英德三国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无产阶级的政策的继续呢？或者说是不是帝国主义政策，即日趋衰落和死亡的反动资产阶级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弱小民族的政策继续呢？”

“只有肯定而正确地提出问题，才能得到十分清楚的答案：

现在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奴隶主的战争，这些奴隶主是为了自己的耕畜而争吵，他们想巩固奴隶制，使它流传万世”。（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97页。）

在确定上述战争的反动性之后，列宁在这封信中还写道：

“社会主义者应当在这次战争中极力把它变成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列宁给了我们一个值得敬佩的教益：确定每一个个别战争的性质，要剖析它的政治内容。泛泛地谈论战争而不提它的政治内容是不对的。

当然，列宁也指出了正确的策略，即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寻找机会争取群众性的同盟者。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同列宁和斯大林所执行的策略是不同的。中国修正主义者的策略是煽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组成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统一战线来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尽管未来可能发生的世界战争是具有反动的性质，中国修正主义者却不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管怎么说，他们维护“三个世界”理论的论据是不可能从列宁和斯大林的策略的经验中找到庇护所的。

那么什么是对付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策略呢？列宁给我们做了回答：“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本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促进它的复亡。”“谁希望取得持久的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列宁《论战争与和平》的三篇文章第30页，北京外文出版社）列宁还说：

“无产阶级对战争的回答应当是：宣传、准备和实现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各国工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现在正空前迅速的加强起来”。

对两个超级大国间发生战争时应采取什么策略，恩维尔·霍查同志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告诉我们：

“马列主义教导说，对帝国主义和好战分子应该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解放斗争加以削弱；如果帝国

主义战争未能制止，那么革命者和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把这一战争变为解放战争”。

“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者把其影响所及的每一个国家中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作为它们的亲密盟友。这些盟友又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者所豢养和武装的工具和打手，以便在世界大战中充当突击力量，并用来对付奋起革命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各国人民。国内外压迫者是两种不能分开的力量。不反其一也就不能反其二，不反对国内的压迫势力直至打倒它，就不能反对外部的敌人，就不能避免战争”。

我们在战争问题上多费了一点笔墨，因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支持者们利用未来的世界大战进行讹诈，使各国人民面临唯一的选择：不得不参加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时维持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的现状。列宁下面这些话对中国修正主义者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不结盟国家”理论的翻版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谓的“不结盟政策”得到中国同伙极高度的赞扬，把它看成是所谓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超级大国的政策。这是因为这两个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不结盟”理论）就象二滴水，一模一样；但是，从形成的时间看“不结盟”理论更早。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其愤怒地看到，中国修正主义者越来越靠拢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恢复了名誉，把它称之为“马列主义党”并承认其“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中国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铁托访问北京，并发表了声明和一致的看法，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修正主义者密切了同铁托集团的关系，而他们过去曾正式地谴责过铁托集团。这也表明，中国修正主义者正向美帝国主义靠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美帝国主义无耻的代理人，所谓的自治社会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的题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中国共产党讲得很正确：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结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 （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 （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 （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 （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 （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 （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的修正主义曾遭到斯大林的谴责，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九六〇年的联合声明（中国也参加了）中也谴责了它。中国修正主义者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加强同南斯拉夫的联系并大肆颂扬叛徒铁托及其

“自治”制度，这难道对吗？这难道不是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吗？

“三个世界”理论支持者们的反革命实践

如果说“三个世界”的理论家们还能用一些“革命”的辞藻来掩饰其反动观点的话，那么他们在国际上的实践则彻底地戳穿和暴露了他们自己。确实他们也笼统地提到要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但实际上他们只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开火，把它看成是主要的危险和目标。相反，对帝国主义则借口说它陷于“被动”，想维持现状。这在实际中有何表现呢？

(1) 公开支持许多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法西斯独裁政府，这些政府是美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例如，谁不知道中国修正主义厚颜无耻地支持世界上最残忍的暴君之一、美帝在亚洲的一个广大地区的代理人——伊朗国王呢？撤销对同国王的法西斯政权做斗争的佐法尔游击队的国际主义支持，这难道是什么秘密吗？

还有，众所周知，支持智利皮诺切特法西斯独裁政权，毛泽东在世时就提供了这种支持，兄弟的智利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此感到惊愕和气愤，中国修正主义者却置之不理。这类证据不少，智利的马列主义同志，在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末尾上，发表了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圣地亚哥“信使”报上刊登的一张照片和一条消息，报道了中国大使徐中夫的如下讲话：智利及其国家元首(皮诺切特)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怎么能够否认中国修正主义者给安哥拉的亲美势力提供武器这一事实呢？谁能否认中国修正主义对在非洲的扎伊尔的帝国主义军事力量的支持呢？同时，这难道不是对蒙博托的血腥独裁政权的支持吗？今年六月，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同国务卿万斯在纽约进行了会谈，随后访问扎伊尔为蒙博托血腥的独裁政权撑腰打气，提供各种援助，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并予以谴责。更糟的是，尽管黄华知道蒙博托是美帝国主义和所谓的“第二世界”帝国主义的无耻的驯服的代理人，仍然表示他对扎伊尔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看法同蒙博托完全一致。

在所谓“非洲之角”，在由两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挑起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中，中国修正主义者的态度也是这样，即支持那些为建立美帝国主义在两国中的统治地位而斗争的力量。这一切表明，中国修正主义者以推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的发展为借口，支持美帝国主义加强对亚非拉人民和民族的新殖民主义统治。

秘鲁共产党(马列)和秘鲁劳动人民曾领教过中国修正主义者对非法执政的反民族利益的亲帝的法西斯军政府的态度。中国修正主义者对这个政权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给予支持。马列主义者带领劳动人民进行搏斗，反对执行美帝国主义意图的军政府，而中国修正主义者多年来都一直支持这个政府。他们称贝拉斯科政府甚至也称莫拉莱斯政府是“民族主义”的政府；赞扬这两个政府的所谓争取民族主权和保卫自然资源的政策，把所谓维护“二百哩领海权”吹到了可笑的地步，对渔业和鱼产品工业的所谓“成就”也极力吹捧，似乎这是贝拉斯科政府的业绩，尽管这个政府使渔业破产，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业；他们赞扬由美国人自己推动的假国有化，因为众所周知，正是美帝国主义者提议出售他们在塞罗德帕斯科和马科纳矿区的设备和资产，而且目前这些矿区靠美帝国主义的财政“援助”开工，基本上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修正主义者把从国际石油公司手中收回塔拉拉油田吹上了天，而我们党揭露了这场闹剧，因为一方面，这一事件的发生是美国各石油垄断集团之间矛盾的结果，它表现为：秘鲁政府收回塔拉拉油田后，马上又同其它的美公司签定：了合同。同时这场闹剧也为如下事实所揭穿：后来又向国际石油公司付款，以购买在法律上并不属于这个公司的一些矿床和设备；还购买了大陆银行，这是国际石油公司所属石油财团的资产，购买每份股票要付四倍多的价钱。这也是给国际石油公司的，间接的补偿。

同样，当我们党和革命群众揭露政府搞的土改的反对内容的时候，还是毛主席在世时，中国修正主义者在访问我国的一些合作化的制糖联合企业时，却赞扬这种假土改，而进行土改的结果使农村更加贫困化，使我国的粮食危机更加严重。

中国修正主义者也赞扬所谓的“联合经营和自治”的经济政策，我们党认为这个政策是旨在对我国的工人阶级进行超额剥削的政治骗局，是人民资本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自治的大杂烩。甚至在现政府的第二个时期，中国大使也拜访了“社会所有制”——“自治形式之一”——部部长，表示中国政府对这个制度的全力支持。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所谓社会所有制企业实行“自治”的年代里，它不仅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资本和企业进一步渗透帮了大忙。为什么中国修正主义者赞扬这个“自治”制度呢？正是由于在实质上他们本来就是赞成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几年前他们曾谴责过这条复辟资本主义道路，而现在他们却同铁托集团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这就清楚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我们秘鲁共产党人则一直是谴责这种立场的。

我们党正确地认为，军政府是代表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大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寡头集团利益的法西斯政权；我们党谴责军政权假的“反帝”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说教，它用这种假“反帝”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说教来掩盖它把国家出卖给美国垄断集团。跨国公司的发展，带有附加条件的新殖民主义的外

债的激增，和新殖民主义的假“国有化”都证明了这一点。说它是假“国有化”，这是因为收归国有的美国企业或经营单位，只有靠美国的贷款才能开工，这些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和—资金来源都由美帝国主义掌握，就连巴鲁阿部长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几乎从我国法西斯政府一上台，中国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它，如果我们一一列举事实的话，那就太多了。我们秘鲁共产党人不反对依据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正当的国际关系；但是，这同一个国家支持另一个国家亲帝的资产阶级反对本国的劳动人民，是根本不同的。只要拿秘鲁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正当贸易和外交关系作个比较就够了，这种关系建立在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主要是为了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并帮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秘鲁和人民中国之间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它包含对日益遭到我国劳动人民憎恨的政府提供露骨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2) 另外一个表现是，中国修正主义者支持美帝国主义控制的经济和军事组织。比如，他们鼓吹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这个组织是为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服务的。他们还支持欧洲共同市场，这是西欧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的联盟，它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起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基地和有组织的后方，用来剥削和压迫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和这些垄断集团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所有这些组织都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用来解决它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至于拉丁美洲，“三个世界”理论的拥护者们赞扬所谓安第斯山小地区条约，称它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经济控制的工具。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四期《北京周报》上说：“安第斯条约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对促进这个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都一直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第斯山条约成员国正在利用一体化发展所造成的有利条件，积极规划发展本地区的民族工业，优先发展五金机械、汽车、钢铁、石油化工、电信、造纸业等等。”

我们多次揭露安第斯条约是在美帝国主义卵翼下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一体化的一种形式。美帝国主义是这个条约的真正发起者，因为条约的成员都处于它的经济和政治统治之下。不论是在生产，贸易和金融领域，安第斯条约都只不过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形式。我们秘鲁的马列主义者看得很清楚：从这种分工中获取最大好处的是美帝国主义。例如秘鲁负责生产轮胎供国内消费和出口；但是，谁制造这些轮胎呢？正是两家美国垄断企业：固特异公司和古德里奇公司。秘鲁的汽车和卡车装配工厂是谁办的呢？是美帝国主义的公司或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后果是成为美国金融资本的仆役。其它的外资企业，如摩托车及家用电器装配的企业情况也是这样，它们不仅享有低税收方面的便利，而且得到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大得好处。从这些情况来看，作为一体化和发展主义进程的安第斯条约组织，据该组织的一些官员们供认，其执行的结果是失败的。因为那些可以称之为“民族的”工业，要么是假“工业”，要么是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工业，主要是进口原材料，基本上依附于美国的金融资本。也就是说，帝国主义跨国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剥削和渗透。奇怪的是，多年以来，这一切都受到了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赞扬。

当毛泽东主席健在时，我们党就以友好的方式向中国共产党提过善意的批评，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党就要求他们至少要停止吹捧法西斯政府，因为他们是很了解这个政府的真面目的。但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停止过对秘鲁现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秘鲁革命者在法西斯政府的统治之下进行解放斗争则没有得到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其结果是，我们的敌人，秘鲁革命的敌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修正主义者的朋友。我们所说的政治支持，是赞同和吹捧现政府搞的假改革。我们反对的不是单纯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对违背国家主权和秘鲁劳动人民经济利益的措施所给与的政治上的支持。

(3) 在实践中，中国修正主义者篡改了列宁所创导的对立的制度间和平相处的内容，把它变成了同美帝国主义、其他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真正阶级合作，唯一的条件就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他们背叛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在致苏联共产党的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公开信中的主张。这封信针对赫鲁晓夫所说的话，现在可以用到以华国锋和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身上：“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对于美帝国主义在各地的侵略行径，中国修正主义者有时默认，有时甚至支持，例：他们对中央情报局干涉智利，扶植皮诺切特上台一事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在安哥拉和扎伊尔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同时他们还说什么被压迫民族“已经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剩下的任务是“清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应该“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一九七四年四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话）企图麻痹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这也背叛了一九六三年十月致苏联共产党的题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公开信中的主张。这封信中说的好：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

中国修正主义者执行国际阶级合作政策，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他们实际上放弃了对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所开展的社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支持。

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马列主义共产党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因为中共一直采取“老子”党的作法，想控制其它党或者把它们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不尊重兄弟党之间应有的独立和平等，是中国修正主义的通常作法。哪一个党不听凭它摆布，就马上遭到歧视。相反，对那些盲目接受它的主张的党则给予推崇和鼓励。据他们说，按照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国家建立两个或三个“马列主义的党”也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在一个国家可以有几个“马列党”的论点很可能是从毛主席的如下讲话中引伸出来的。毛主席在他的《党内团结的辩证法》一文中说：“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选集第五卷第562页）

按照马列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

“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在每个国家里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的党”。他在谈到党的统一时指出，“其条件是党应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保证意志和行动的统—，这是早已被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所证明了的事情”。（法西斯主义和统一战线，第126页——127页，第三世界出版社）

回顾一下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述是有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就是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做斗争以便达到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的结果。党内不能容纳打了折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根据他读了多少马克思的书而定，而是根据他的世界观和对工农开展的阶级斗争所持的态度。做为共产党员要毫不动摇地完整地而不是部分地接受党的政治路线，因为在党内不允许倾向的存在，在一个国家里也不允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革命领导中心。按照列宁的观点，要做一个党员，就要承认党的纲领，交纳党费或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在政治思想上不允许有百分比。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史中说：“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进觉悟的部队，而且同时又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有为党员所必须遵。守的纪律。”

“党只有当它所有的党员都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地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把它引向一个目标”。列宁指出：

“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出现的大悲剧，部分原因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允许各种不同的倾向共处和两条路线的并存。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某一马列党内反对本党路线的派别分子被开除或脱离本党，组成另外一个“党”，马上就会被邀请去中国并受到良好的接待。这类事件不少，他们同好几个“马列主义”小组建立联系，而对那些不屈从于他们控制的真正马列党，则加以歧视和讹诈。

(4)在国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世界”理论表现为复辟资本主义，抬高资产阶级官僚阶层，为邓小平之类的叛徒，以及根据毛主席本人的指示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职或开除的其他许多人恢复名誉。甚至连文化大革命前的反革命分子也赦免和恢复名誉。在毛主席逝世时受到批判的邓小平现已得到彻底平反，现在实际上是他在制定党和政府的路线。那么，很自然得出下列结论：他在中国执行的是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这些东西都包括在他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或者叫做《工业条例》这些受过批判的文件中。这些文件多次受到批判，甚至在毛泽东去世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的第三十五期北京周报上还对上述文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为什么中国修正主义者夺取了全部政权？

我们认为，目前人民中国发生的变化有以下原因：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活中一直允许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共存，没有适时地镇压反革命分子，而是妄图对他们实行再教育。对刘少奇是这样，现在的邓小平也是这样，他已被彻底平反，并是个一直在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险计划的当权派。

第二，在中国，人民民主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允许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制度共存，比如有些资本家参加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投资和利润分配，也就是说，一种类似美帝国主义今天正大肆宣扬的合营。访问过中国的许多马列主义者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残存着这些资本家感到吃惊。

第三，没有实行铁的无产阶级专政，允许共产党以外的几个党存在。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国以

外的马列主义者当时不知道这篇著作，他逝世以后，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这篇著作中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象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象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列宁教导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允许其它政党存在，这种做法同允许党内（不同派别）的共处一样，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马列主义者应该按照马列主义，这一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正确估价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我们应该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的正确的东西和贡献以及他们的错误和所走的弯路，从中国修正主义——它表现为“三个世界”的反革命观点的理论与实践——当中吸取教训。

鉴于上述的一切，秘鲁共产党（马列）谴责“三个世界”的理论，因为其反革命实质是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重申，它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秘鲁共产党（马列）宣布，在反对世界革命的这些敌人的斗争中，将同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科学思想，坚持革命的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站在一起。

秘鲁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一九七八年六月于秘鲁

注：秘鲁马列主义共产党就是以帕雷德斯为首的秘鲁共产党（红旗）。